

一二九運動史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编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八〇·十一

《一二九运动史》内容提要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它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学习。《一二九运动史》是一本系统记述这一伟大运动全过程的历史专著，曾在一九六一年初版。这次修改再版，增添了丰富的史实，具体生动地写了“一二九”时代爱国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走上与工农群众和革命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道路，献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

一二九运动史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43,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1

书号：11071·140 定价：0.78元

编写者说明

为了纪念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继承和发扬在我党领导下的学生革命运动的优良传统，我们特将《一二九运动史》一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改写出版。

这次的改写，着重在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等方面进行了充实。其他方面也有所补充和订正。本书由原来的七章扩展为十章。

在改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姚依林、蒋南翔、郭明秋、陈翰伯、孙敬文、宋黎、刘杰、牛荫冠、段君毅、李昌、杨述、史立德、高文华、刘导生、丁秀、张震寰、刘尊棋、朱丹、王翰、雷洁琼、陈明、谷锦生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他们在百忙中，或抽出时间接待我们的访问，或应邀和我们一起座谈，亲切地向我们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党的领导作用，回忆斗争的情景和经历。同时，我们还研究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彭真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我们还得到许多单位的大力协助：中央档案馆、共青团中央研

究室、共青团中央团校、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中国青年报社等。他们积极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档案和资料，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当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所有指导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参加本书改写的有：杨树先、唐纪明、王冬琳、许克清四位同志。由于时间仓促和改写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会有些错误和遗漏。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历史召唤我们前进!

——《一二九运动史》代序……………陈翰伯(1)

- 一、祖国危急! 民族危急! ……………(6)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6)
 - 华北——国防的最前线……………(10)
 - 革命运动的时机成熟了……………(14)
 - 在伟大的《八一宣言》号召下……………(20)
- 二、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31)
 -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31)
 - 沸腾的一周间……………(42)
 - “一二·一六”大示威……………(50)
- 三、掀起了全民抗日的大风暴……………(62)
 - 海河在怒吼……………(62)
 - 抗日风暴席卷黄浦江……………(65)
 - 钟山之麓扑不灭的抗日怒火……………(74)
 - 沃土中原撒下了抗日火种……………(78)
 - 海内外的广泛声援……………(82)
- 四、南下扩大宣传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85)

“到农村去!”	(85)
深刻的阶级教育	(91)
战斗在平汉路沿线	(97)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战斗中诞生	(103)
五、英勇的反逮捕斗争和“三·三一”游行	(108)
英勇的反逮捕斗争	(108)
“三·三一”游行——一次失策的行动	(115)
六、爱国学生运动的巩固和壮大	(119)
加强领导 端正思想	(119)
团结群众 共同救亡	(123)
军事训练和夏令野营	(129)
为进一步争取爱国自由而斗争	(132)
七、“六·一三”——“一二·一二”	(135)
“六·一三”大示威	(135)
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	(141)
在战斗中检阅我们的队伍	(148)
八、“西安事变”——“七·七”事变	(152)
国民党分裂学生运动新阴谋的破产	(152)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	(160)
时刻准备迎击敌人	(163)
在芦沟桥的炮声中	(170)
九、奔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74)
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遍全国	(174)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180)
灿烂的花，丰硕的果	(186)
十、结语	(192)

历史召唤我们前进！

——《一二九运动史》代序

陈翰伯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这天和这天以后发生在北平和全国的学生运动，历史上称为“一二·九”运动。我们这些走上北平大街，高喊口号的同学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天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纪念日，然而历史没有忘记这个日子，更没有忘记成为抗日战争前奏的“一二·九”运动。

今年十二月九日，是这个伟大运动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直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一个光辉灿烂、欣欣向荣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但是，我们怎么会忘记四十五年前苦难的日子呢？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河北北部（热河）和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过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已经驻扎上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无阻，耀武扬威，侵我城池，夺我土地，俨然以主人自居，置我人民于奴隶的境地。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下了个无耻透顶的《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取缔一切抗日言论，不许人

民有一丝一毫的抗日意识，最好永远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民，不许反抗，不许挣扎，不许呻吟！

然而，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屈降的。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中，北平大、中学学生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走上了街头，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和水龙，喊出了响震云霄、颤抖大地的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这些口号冲破了千万人胸中多年的积闷，发出了痛快而又愤怒的呼喊，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要抗日！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一二九运动史》是一支抗日战争的序曲，一支歌颂中国青年光荣传统的赞歌。

读者可以在连续演奏的乐章中，时而听到撕裂肝胆的呼号，时而听到无可奈何的低吟，时而听到充满愤懑的控诉，时而听到迎接胜利的欢乐。

当读者阅读（我简直愿意使用“聆听”这两个字了）这本历史专著的时候，我满怀深情地向你推荐乐曲中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似乎是在交替出现，而实际上是前后连贯，一气呵成的。这两个主题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

抓住这两个主题，你便能够深刻掌握“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四十五年前的北平学生并不是一上来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从不怎么认识，不太完全的认识，到比较正确的认识，再往前，一直到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抗日和革命的大道，是

有一个思想激荡的过程的。

读者不会忘记，那时还是一个内战方酣的时代。在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那时，我们的党在白区还不能以公开面目在群众中出现。我们处在地下，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时常有同志遭到逮捕和屠杀。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不怕牺牲地勇敢战斗。我们完全了解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充分了解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然而，迳直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我党的主张有层次地向群众进行宣传。首先我们要顺应绝大多数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我们要抗日！”——这是群众普遍能够接受的要求。其次，国民党政府能不能领导我们抗日？这就要作很多的工作。这个政府只知对日屈膝投降，卖国求荣，是有大量客观事实的。血淋淋的事实是最宝贵的教材。【我们要善于分析，善于揭露，善于引导。最后，我们要使青年学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我们把青年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到这样的水平，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说是“漫长的岁月”，似乎也不太准确。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也不过是一、两年的时间。我国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完全是我党工作的巨大胜利。

“一二·九”运动不只是唤醒群众的运动，而且是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抗日战争骨干的预备学校。

这批非常宝贵的骨干力量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的。当然，我不能说一上来他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实在的，当时他们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青年学生不能构成一个独

立的阶级。按照当时的阶级状况，他们大致上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然而他们自己还没有直接参加剥削。他们爱国，他们不满现状，他们还不会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以及改造世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当时，人们常常说到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努力改造思想，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一二·九”运动又是一次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当时的青年对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争辩，互相探讨，阅读左、中、右各派救国救民的主张、学说。他们一会儿觉得这个有理，一会儿又觉得那个有理，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但是，在反复比较之后，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中，特别是在参与了革命斗争的实践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照耀航程的探海明灯——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救我国家于万劫不复的无边苦海。

那时，我们还看不见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只能在某些进步书刊上，或者在口头的传播中，得到一鳞半爪的革命真理。然而，只要得到了真理，我们便坚信不疑。在往后的实践中，我们更会毫不动摇，勇敢前进。

在历史的长河中，过往的事件是不会重现的。人们不会遇到同样的形势，也不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总会不断提出问题，并且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二十世纪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现在的青年当然也会提出一串串渴望解答的问题，同样，毫无疑问，也必将作出正确的回答。

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坚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四十五年前的艰苦岁月中，党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块带有巨大吸引力的磁铁。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很快地参加了党的行列。我们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们有了这只望远镜，就能够开阔视野。我们有了这只显微镜，就能够明察秋毫。马克思主义曾经引导四十五年前的青年走上革命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同样会引导今天的青年走上革命的大道和光辉的前程。“一二·九”时代的青年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准备献身。今天的青年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们早生五、六十年，你们会不会和我们的先辈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抱负呢？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呢？我这样的提出问题，可能有点“非历史主义”的嫌疑，然而，在本书的这篇《代序》中，我很想亲切地和青年朋友们谈谈心。你们比起先辈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你们会有繁花似锦的前程，你们会有更多的献身机会。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会等待你们展翅飞翔。你们比起先辈来，会有更伟大的理想，更远大的抱负！

你们会在这本《一二九运动史》中吸取无尽的思想力量。当年的青年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在各个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四十五年前，由于革命还是民主主义的性质，暂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两条。今天，我们的历史已经进入新时期。我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深深学习这四个“坚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文化，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历史中大显身手。我们既无愧于先辈，又会为后辈树立起永葆青春的榜样。

一九八〇年五月

一、祖国危急! 民族危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党蒋介石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日寇仅在两三个月内，便囊括了东北三省。祖国的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三千多万人民、四千余公里铁路，丰富的资源，就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下断送了。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一九二七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说：“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①。根据这个侵略计划，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又向中国内地进攻，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继续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又进攻上海，侵逼南京。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仓皇迁都洛阳，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命令他的部队不得“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华北的战略要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失守。三月初，热河省省会承德又遭敌攻占，日军逼临长城各口。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士自动请

求抗日，蒋介石却下令禁止，说“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一年半之间，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又复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遭受着深重的民族灾难。

在这民族垂危的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举抗日义旗，站在抗击日寇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组织起了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日厂十万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以上，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当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如《申报》等都撰文著论，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也从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分裂出来，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起而抗战。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里，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走狗与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走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引起了激烈的暗斗明争。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涨。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②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高擎抗日日

① 《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11月版，第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4页。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积极领导和协助组织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号召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侵略，并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援助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就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援助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和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北抗日同盟军，并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反蒋的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华北时，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一九三四年五月，经中国共产党提出，由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一七九人共同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七月，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于上海。接着，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同时派遣了抗日先遣队，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相反，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坚持其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一方面与日寇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一方面对共产党、红军和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正值国难方殷的时候，蒋介石派了重兵连续五次向中央

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对红色区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在白区则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并大发其“三天亡国”的谬论，声言“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①对一九三四年方志敏、寻淮洲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派大军堵截拦击，寻淮洲同志壮烈牺牲，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非但不派兵增援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而且还命令他的海军与日寇海军“维持友谊”，十九路军的英勇斗争终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归于失败。对在长城抗战的将士，蒋介石则派兵监视。对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出师十万之众和日军夹击之，终陷他们于失败。在白区，蒋介石政府对人民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济南、杭州、汉口等地三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则命令军警宪兵开枪镇压。蒋介石更利用蓝衣社等法西斯组织对爱国进步人士施行法西斯恐怖手段，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杨杏佛、《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相继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左翼作家不断遭到逮捕和杀害。宋庆龄、鲁迅也经常遭到特务的恫吓、监视，被逼得无处安身。整个白区变成了一座黑暗的牢狱，一切抗日分子的生命都朝不保夕。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抗战的中国丛刊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华北——国防的最前线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日寇又占领通州，侵逼平津，华北告急！

蒋介石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与日寇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开门揖盗的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的合法性，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这样，偌大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直取平津。蒋介石反动政府愈是妥协投降，日寇就愈是得寸进尺。“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而蒋介石政府却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①，表示愿意牺牲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独立，接受这种“保护”，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寇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政府排日，一面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日本重要将领也在天津集会，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结果，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屈从了。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派其驻华北的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九日，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全部答应了日寇的要求。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等等。从此，日寇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际控制了华北。接着，六月二十七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又签订了“察哈尔协定”。协定规定从所谓“满洲国”国境附近，撤走宋哲元军队和察哈尔省内的排日机关。这是“何梅协定”在察哈尔省的翻版。

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所谓“广田三原则”的多次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所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活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日本的通讯社“日联社”、“电通社”称：十一月十八日，驻日中国代办丁绍仪到日本外务省访问重光次官，当面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承认广田外相所提出的三原则^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屈膝卖国，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局势十分险恶。除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日寇并收买汉奸，策动了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成立“蒙古国”、“华北国”，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制造一个“满洲第二”。六月二十七日晚，受日寇指挥的汉奸白坚武，自称总司令，纠合一百余人，号称“正义自治军”，占领了丰台车站，夺去一列国民党的铁甲车，开往永定门，炮轰北平市区。

由于日本侵入华北，触犯了英国和美国在华的利益，一九三五年九月，英、美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英国

① 《外交大事记》第3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1935年编印，第57页。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

派李滋·罗斯来中国洽谈有关事宜。日本对此持强硬态度，并立即召开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的五相会议，抵制了英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九月二十四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所谓“声明”，“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威力”，“我军对华北态度有以下三点：（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①。二十五日又表示：“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任何中国人倘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②。不久，日军首脑又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了所谓“中日提携”的方案：“先将华北变为提携之模范，而后扩展至各地。”^③十月二十二日，日寇制造了“香河事变”，指使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县汉奸暴动，占领香河县城，由少数汉奸劣绅组织了“县政临时维持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也分赴北平、济南、保定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威胁地方当局，收买汉奸，策动伪自治运动，将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攫为己有。一个月之后，原为国民党特派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首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粉墨登场，在离北平四十里的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并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这样，冀东二十余县的大片国土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日本的飞机马上为这幕“自治”丑剧，在天津上空散发“庆祝”传单。在天津，日寇在南郊八里台子修建飞机场，在大沽口修筑军用仓库，在市内修建兵营。十一月十一日，天津的日本报纸公然发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鼓吹“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一小撮汉奸、亲日分子就奴颜

婢膝地通电响应。随后，日本特务和汉奸、吗啡鬼、白面客、政治流氓等，坐着汽车，打着“自治”旗帜，出入日本租界，散发侵华传单。日寇又从租界派出佩有“敢死队”徽号的特务、汉奸，进行武装挑衅。这时的华北和平津两市，眼看行将易帜。

蒋介石对日寇是妥协退让，而对抗日运动则是横加镇压。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及武官认为该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和苛刻要求。蒋介石政府取媚日寇，连忙由上海市政府向日皇请罪道歉，撤换了上海公安局长，改组了上海图书检查委员会，封闭了《新生》周刊，并将该刊主编杜重远逮捕判刑。接着，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遗臭万年的《邦交敦睦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反日的团体。并且还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④七月七日，蒋家朝廷和蒋家党部对于“新生事件”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内称：“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⑤从此以后，报纸刊物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而代之以“抗×”和“××帝国主义”了。

在北平，五月间，学生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之后，数月

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6、177页。

②③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页。

④ 《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书店版，第48页。

⑤ 《九一八以来国内形势的演变》，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书店版，第42页。

内有许多青年被捕，有的在狱中被杀害。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东北大学由高崇民、阎宝航等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牌子被摘掉了。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也被迫解散。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横遭迫害。

✓ 日本帝国主义不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整个华北。人民遭受了日寇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这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祖国危急，华北危急！国亡无日的景象笼罩着华北！

革命运动的时机成熟了

华北人民身受主权沦丧的痛苦，痛感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将亡，悲愤和屈辱、不安和苦闷，交织在一起，胸中燃烧着熊熊的抗日怒火。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加上全国各地连年灾荒，黄河大水，陕西酷旱，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早已凋敝的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上毁灭的道路，华北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在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夹攻中，更加陷入穷困、饥饿、疾病与死亡的绝境。”^①平津等大城市里，农民卖儿鬻女，沿街乞讨，到处皆是。学生在“毕业即失业”的威胁下，生活没有出路。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已是不错了，有的甚至以拉洋车谋生。在校学生有的缴不起学费和饭费，挣扎在饥饿线上。

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市，已是危城欲倒。

北平的城门洞口，大街小巷，都布满了日军岗哨。兽蹄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军竟在东安市场鸣枪抢劫。日本浪人随意绑架女学生，拖到中山公园进行百般污辱后，用手帕塞口，缚住手脚，丢到假山后边的池塘里。日本为了刺探情报和毒化腐蚀中国人民，开设了许多烟馆、白面馆、赌场和妓院，唆使大烟鬼、白面客和流氓恶棍，四处捣乱，为非作歹。日本浪人指挥流氓白天持枪抢劫前门大街的一家银号，引起了北平市民的极大愤怒。日本政府还向中国大学派了十几个所谓“留学生”，这些人实际上是日本特务。其中有一个叫内山虎雄的，一直担任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最高翻译。日军经常到处测量，强占民田，并在郊区夜以继日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农田民舍多被焚毁，居民不断遭到伤亡。北平前门车站，熙来攘往，国民党的军政显要携带金银细软和眷属，争相南下。故宫的古物，继续南迁。各大学当局纷纷准备撤退，清华大学要迁长沙，东北大学要迁太原，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一课”。人心惶惶，谣诼纷纭：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占北平城，下午又传说晚上来。真是风声鹤唳，人们不知何时大难临头。

这时，北平城内外的中大学校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目睹险象环生的华北局势，忧心如焚。但是，北平各报纸，只登一些国民党的官方消息，登一些对日妥协退让的言论。所谓“华北特殊化”问题，各报一字不载。人们心怀疑虑地探听着消息：华北“特殊化”到底是那五省？有没有平津？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四个师长怎么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怎样进逼？……一连串的问号，迫使着爱国青年学生们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

① 《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火线》第43期，1935年8月15日出版。

有时是愤慨的控诉，有时是低声的沉吟，有时是渺茫的希望，有时是焦躁的唾骂。国民党不抵抗，而且不许群众抗日。爱国有罪，卖国却有赏。这是何等的天日呵，天若有情，亦当共愤！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这时较多地集中在北平，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华北问题的动向。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其中的一个。斯诺曾于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这时，他专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论坛报》的自由投稿记者。斯诺是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他同情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不抱偏见。他对中国人民友好，同情和支持中国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因此，在他离开燕京大学后，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仍常去拜访他，同他谈论中国时局和天下大事。燕京大学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等同志，都是斯诺家里的常客。他们从斯诺那里听到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了解到时局的一些变化发展，比如华北“特殊化”，宋哲元态度暧昧，土肥原活动频繁，甚至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也是从他那里听到的。

有一天，黄华、陈翰伯等同斯诺商量，能不能给孙夫人宋庆龄捎一封信，斯诺欣然同意。于是，他们立刻用英文起草信稿，陈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时局的苦闷，并请教孙夫人怎么办。为了防止意外，信末没有署名，只写着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他们请斯诺夫人^①将信用打字机打出来。当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正好住在斯诺家，就请她去上海时把这封信转交给孙夫人。十几天后，黄华、陈翰伯从斯诺手中得到了孙夫人亲笔签名的回信。宋庆龄回信称呼他们为 Dear students（亲爱的同学们）。她在信中赞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指

出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她发出了殷切的期望：“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这封信在几个熟识的同学中传阅，引起了一场悄声细语的议论：对！是要有所表示。但怎么表示、怎么行动呢？

险恶的形势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了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问题。青年学生们时刻悬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即使那些素来埋头用功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投入这动荡不安的政治激流，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在教室、在宿舍，青年们时而激昂高亢地歌唱、时而沉痛地低吟着最为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严峻的现实，一再告诉他们：除了反抗，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从内心发出誓言：“甘洒热血献中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中写道：“莫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

① 她的全名是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使用的笔名是尼姆·韦尔斯（Nym Wales）。

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平津十校《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以“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①《宣言》是广大青年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控诉状，也是他们为争取爱国自由，抗日救国的呼吁书。这个《宣言》是由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该校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起草的。《宣言》表达了大家要求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拨动了平津数万学生的心弦。《宣言》虽曾寄交平津各报馆，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敢发表它。

这时，华北的反动统治营垒内部，出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华北的各种反动势力——日寇、蒋介石、宋哲元之间，在镇压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上虽有其一致的一面，但由于他们之间尖锐的利害冲突，也存在着种种矛盾。

“何梅协定”签订后，代替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华北统治的主要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察哈尔省主席。一九三三年日军兵临长城各口，激起了二十九军许多官兵的爱国义愤，宋哲元乃起而抗日。这时，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彻底实现其卖国投降政策，撤去了宋哲元的省主席职务，命令二十九军调离华北。宋哲元则乘国民党军队撤出平津和河北的机会，借口北平“防务空虚”，急率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他为了进一步扩张其统治势力，旋即派密使勾结日寇。当时日寇也感到光靠殷汝耕等公开的汉奸不够，还需要利用宋哲元作为它统治华北的工具。宋哲元就是这样与日寇相互利用，在北平站住了脚跟。宋哲元违反国民党政府指挥的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但蒋介石这时对平

津已是鞭长莫及，面对既成事实，不得不改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委员长。

宋哲元与日寇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宋哲元一方面依附日寇，一方面又慑于人民抗日的压力和二十九军下层军官士兵的抗日要求，还不敢公开投降。同时，宋哲元又要利用日、蒋的矛盾，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的目的。而日寇则向宋哲元步步进逼，要他完全出卖华北。所以，宋哲元和日寇之间，实际上是各有各的盘算。这就造成当时冀察的特殊局面，既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区域，也不同于在日寇卵翼下的冀东地方。

综上所述，华北在日寇控制下的反动势力有各种牌号。既有一贯卖国投降的蒋介石，也有公开认贼作父的汉奸殷汝耕，又有对日寇既屈从又不满的宋哲元。蒋介石则只准自己“批发卖国”，而不许其他地方实力派、汉奸“零售卖国”；其他地方实力派、汉奸则企图依附日寇，占领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自成局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日寇则“凌驾”于这些互相矛盾的势力之上，既要“批发”，也要“零售”，急欲吞噬整个华北以至全中国。

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正是革命者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华北已成了矛盾的焦点，革命如行将爆发的火山。

北平的学生悲愤而准确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国，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和全国人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

民一致的呼声。

革命运动的时机成熟了。

在伟大的《八一宣言》号召下

“九·一八”事变以来，平津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的宪兵第三团调来北平以后，对革命力量摧残更甚。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成员被捕，保存下来的少数党员分散隐蔽在党的一些外围秘密组织中，或在少数的大中学校里坚持斗争，同群众保持着联系。

一九三五年初，北平的地下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①。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同志前来北平，指定共青团北平市委暂时代替市委工作。不久，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成员有王学明、彭涛、冷楚等同志。当时，全北平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十多人，加上共青团员也不过二十余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在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由周小舟同志负责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有七、八十个会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发展了一些党员。在民族武装自卫会活动的有蒋南翔、姚依林、黄诚（清华大学）、董毓华（中国大学）、郭明秋（北平女一中）、孙敬文、刘杰（镜湖中学）等等同志。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左联”、“社联”、“语联”的活动。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在其他地区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跑到北平来找党的关系，他

们也在坚持着革命斗争。黄敬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中共青岛市委成员，被捕出狱后，从山东济南来到北平，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由于时局的急速变化，在一般群众中，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他们面对着“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家将亡”的景象，加上失学失业的痛苦，思想陷于苦闷与彷徨之中。一部分学生感到国家和国家的前途暗淡，个人也没有出路。有的甚至受了国民党散布的逃跑主义谬论的影响，想退到云南、贵州去。有的对日寇烧杀淫掠的罪行和国民党血腥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产生了畏怯和恐惧的情绪，幻想着逃避斗争。针对这些思想，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中国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包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世界语联盟”。简称“八大联”）、赤色互济会等秘密团体，在华北人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教育群众，聚积革命力量。

同时，党也利用某些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活动。一些大、中学生和进步青年被吸引到“左联”、“社联”、“语联”等秘密组织或世界语学会、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公开活动中去。在这些组织里，通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作用，领导群众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如“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如何”、“华北是否名存实亡”等问题，并进而向学生们提出了“国民党不抵抗，步步退让，当前国难重重，能不能安心读书？”“国家这么黑

① 这时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个机构，而用两个名义。北方局主管华北地区，河北省委主管河北地方。

暗，青年人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启发着群众逐步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自己救亡图存的责任。这些组织还引导大家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认识世界人民强大的反帝力量。特别是阿比西尼亚^①以八百万人民的小国，却英勇地抗击了法西斯强盗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事实给予群众以深刻的教育。在这些组织影响下的群众，经过一系列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祛除了怯懦心理，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抗日觉悟。一部分先进分子还开始认识到国土一天天沦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由于反动力量对学校加强控制，多数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会被迫解散。少数学校，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女一中、艺文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尚保存着。地处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美国教会的财产和美国人的住宅，中国的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军警宪特是慑于涉入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黄华、陈翰伯等同志，便利用了这个特殊环境开展活动。一九三五年夏秋，在这里召开过华北各界救亡会。不久，又组织了“东北问题研究会”、“时事座谈会”。这两个团体各有二、三十人，每隔两周的星期五晚上聚会讨论。他们还秘密地编辑了两期壁报，暗暗地张贴在穆楼。不署编辑者姓名的壁报，说出了当时环境下不准公开说的话。它鲜明地提出了反独裁、要民主，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团结抗战。在壁报上，还公开地说出了红军是中国的希望。在第二期上，报道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德国共产党人对纳粹的反抗，以及日本并吞华北的野心；还剪贴了七、八个圆形人象——鲁迅、巴比塞、高尔基、宋庆龄……，横贯全版的大标题是：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壁报图文并茂，课前课后，吸引着大批读者。

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火线》，以及《北方红旗》、《实话报》、《国防》等革命刊物，在党内和在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中传阅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还有《大众哲学》、《读书生活》、《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流行更广。

在一些大学里，少数进步教授如杨秀峰、黄松龄、齐燕铭、李达、张申府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理论。他们冒着解聘和坐牢的危险，利用学校的讲坛向广大学生分析政治形势，指出救亡求存的道路。例如在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杨秀峰同志就曾不顾学校当局的干涉而开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阐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宣传抗日救亡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开讲时，座无虚席，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原北平女一中校长孙荪荃，曾因积极支持“九一八”抗日救国学生运动，遭到学校中国国民党势力的排挤被撤掉校长的职务。但是，她仍坚持要求抗日。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孙荪荃在课堂上公开介绍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继续坚定地支持和热情地赞助北平大中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革命书刊在群众中的秘密流行和进步师长的活动，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武装了群众的思想。经过党的艰苦工作，革命力量逐步积蓄和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形

① 即埃塞俄比亚。

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新领导，从而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党中央率领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历尽千辛万苦，打破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北。同年七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号召下，八月一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首先尖锐地分析了当时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惊心动魄的号召：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发动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集中地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愿望和意志。

伟大的《八一宣言》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透过国民党反动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传到了白区的北平、上海等地。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①以及在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②上，均先后刊登了《八一宣言》。这时，徐冰（邢西萍）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太原、北平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在燕京大学秘密地召开“华北各界救亡会”。八月间，徐冰同志邀集

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在西郊玉泉山聚谈，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一些进步学生从北京饭店的法文图书馆（一个法国人办的）买回刊登有《八一宣言》的《共产国际通讯》后，如获至宝，秘密地传阅着。地下党的组织也秘密地展开了活动。在清华大学的布告栏上，半夜里公开贴出了《八一宣言》；在师范大学，一天清晨学生们到盥洗室洗脸的时候，发现在每一个脸盆里，都放了一张《八一宣言》。学生们争相传阅，私下议论。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迅速地扩大。党的政策化成了群众的革命要求，抗日救国运动迅急地向前发展。

一九三五年夏秋，黄河水灾继续泛滥。华北广大农村，田庐被淹，农民流离失所。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灾民饥贫交困，急需救济。但是，国民党政府视若无睹，这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同情和义愤。党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论黄河灾患与党的任务》、《防止水灾，首先要打倒制造水灾的国民党》、《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号召从水灾问题上将国民党的罪恶腐败和卖国投降与民族危机联系起来；群众自己组织防御水灾自救团体或水灾会，进行广泛的救灾活动。

此时，国民党党部和宪兵第三团已从华北撤走，日寇、宋哲元、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尽管日寇和冀察地方当局力图破坏抗日救国活动，但是，比起“何梅协定”以前，北平的反动统治力量相对地减弱了。党便利用了这种矛盾和空隙，来开展革命活动。河北省委给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下达了一个意见，认为直接

① 巴黎《救国报》第10期，1935年10月1日。《救国报》后被法国政府下令停刊。不久，又改名出版了巴黎《救国时报》。

②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Vol. 15. No. 64. Nov. 1935.

组织抗日革命团体还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去揭露它；在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的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以便掩护党开展革命活动。

于是，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便通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中组织赈济黄河水灾的活动。八月，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西山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同志。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北平临委的一个公开组织，向北平市社会局备了案，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对外公开活动。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将二、三十个被敌人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地集中起来了。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中学校也都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学生们公开在大街小巷开展救济灾民募捐活动，组织义演，为灾民募款、募实物。各校派出代表前往灾区慰问，如临委的彭涛、清华大学的牛荫冠、师范大学的杜润生、东北大学的王振乾、杨旭等。这些同志，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同时，还将一小部分捐款留作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经费备用。随后，各校都公开地展开了救灾宣传活动，办起了壁报，把造成灾荒的原因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联系起来。

这次水灾赈济活动，是成功的。它体现了在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华北危急之时，与劳动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党通过水灾赈济活动，团结了群众，为进一步领导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打下了基础。

十月，在赈灾活动结束后，党不失时机地将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国大学召开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指定

燕京大学的陈絮同志起草宣言。北平学联的主要成员有：主席郭明秋（女一中）、秘书长姚依林（清华大学）、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还有交际股长王其梅。北平学联机关设在女一中。学联的刊物和传单，由北池子一家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印，条件是多收一倍钱，并允为之保密。

北平学联的建立，成为在党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新起点。

这时，华北的形势已非常严重。新的抗日救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华北人民、全国人民，不仅左派，也包括国民党内倾向抗日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若干个呼啸着西北风的黑夜，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在北平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的一个洋车厂里，秘密地举行会议。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同志，事实上已成为新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结合研究了当前紧迫的形势和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一致认为必须有所行动。于是，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以宣传教育更广大的群众，并向反动统治者示威。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这种秘密会议，经常由深夜开到东方发白。

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个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即将兴起。

十二月三日，北平学联在市立女一中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有少数代表不同意合法斗争，不同意请愿，而要求示威。多数代表认为，为了尽量利用合法斗争，请愿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需的。并且认为，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只要有抗日要求、有反对伪自治要求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一运动。在统一思想以后，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平市大中学

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同一天，清华大学成功地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

十二月六日，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朝阳学院、私立华北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私立北平今是中学、私立北平艺文中学、私立北平崇实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通电》在痛陈了自“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连串辱国丧权的事件之后，尖锐地指出了：“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通电》最后写道：“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熬煎，顾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愿对政府作如左之请求，希国人共起督促之：（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二）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四）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①

这时，有消息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十二月九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消息震惊了每一个爱国者：眼看华北各省又将继东北四省之后沦入日寇之手！华北实际上已是名实俱亡了！在这个紧急的关键时刻，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在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决定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为挽救垂危的祖国，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同时决定由姚依林和郭明秋同志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各路请愿游行队伍于九日上午十一点在

新华门前汇合。

十二月八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到会的有二十余人。会上，将经党研究决定的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通知大家，在组织工作上也作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

但是，在这个会上，对是否举行请愿游行的问题，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是燕京大学张兆麟同志的意见。他认为是否请愿游行，取决于人数的多少，需要事先统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另一种是彭涛同志的意见。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正确估计当前形势发展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就可以了，这种形势如同遍地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来；一个号召，群众就会起来响应。彭涛同志提出的办法是，由那些进步势力比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然后再到那些进步势力比较弱的学校去呼口号。比如，清华、燕京进城后，就可以与西城东北大学汇合，然后去志成中学、师大女附中等校，一路高呼口号欢迎他们参加。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彭涛同志的意见，不少学校的代表还自报了人数。最后，彭涛同志进一步提出，这次行动以请愿开始，请愿不成，即转为示威。参加会议的各校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带回各自的学校。

当晚，凡是接到次日请愿游行通知的学校，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富有朝气的青年人，怀着抗日救国的激情，迎接着战斗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6、148页。

的黎明。

女一中是北平学联的所在地，从这里将早在六日已印好的传单，分别送到各校，直至深夜。

负责总交通的孙敬文同志，更为忙碌。他除了跑交通，与各校联系外，还跑到事先未参加会议的精业中学去，找到一位同乡，鼓动他们出来游行……。

燕京大学的黄华、张兆麟同志从城里带回学联决定次日游行的消息。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马上开会，研究了燕京、清华进城的路线；并组织了自行车交通队和为防止坏人破坏的纠察队。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当晚和第二天早晨都分别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参加全市的请愿大游行。

东北大学参加学联会议的两位代表郑法轩、邹素寒同志回到学校后，立即召开秘密会，向宋黎、关山复等十几位同志传达了第二天请愿游行的决定。大家听后，十分兴奋，随即分头发动群众。同学们都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含着热泪忙碌起来。许多积极分子通宵达旦地为游行作准备工作。

在中国大学、师范大学……都以同样的心情，积极地准备着。

在北平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古城里，成千上万敏感而富于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赤诚，为挽救垂危的祖国而奋起抗争。他们的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抗日爱国的巨浪！

二、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国严冬，千里冰封，朔风凛冽。

黎明，北平城里城外，各校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学生们，怀着满腔的热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预定的计划，行动起来了。

北平反动当局已得到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他们在城内外许多学校都布置了岗哨和密探，严加戒备，企图破坏这次行动。但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却以无比的勇敢、团结和战斗的精神，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重重阻挠，参加了爱国请愿大游行。

天还没有亮，中国大学的校门就被军警封锁了。但由董毓华和白乙化等同志组成的学生队伍，却乘代表上前交涉的时候越墙而出。这支队伍经辟才胡同，转西单北大街，按照学联的要求，沿途联系和接应其他学校。师大女附中的部分学生被学校当局阻拦在校门口，由于中国大学学生的接应，也冲出来和大队一起，奔向新华门。

城内的其他一些学校，同样被军警包围了。但是学生们却在校内集结着，当大队经过时，立即冲出汇合。还有些学校的学生避开军警的耳目，走出校园，迂回至路口、胡同，贴标语，散传

单，大队一到，一涌而出，加入了请愿游行队伍。

为了阻止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进城，反动警察当局扣住了通往城里的校车。学生们早已怀着“誓以我们的热血献给危急的祖国”的决心，带着连夜赶制出来的旗帜和标语，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踏着封冻的土地，徒步奔向西直门。清华大学的队伍，由黄诚、吴承明等同志带领，沿着平绥路前进；燕京大学由陈翰伯、朱启平同志带队，从田间小道绕行。这两支队伍甩开了沿途阻拦的军警，在西直门前汇合了。

当清华、燕京请愿游行队伍行进中，“西郊署长林雁宾闻讯，当即用电话向城内报告。当局遂令将西直门关闭，并派警车去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处戒备，将城门关闭，把守拦阻郊外学生进城。”^①这时，西直门城墙上下军队和警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许爱国学生进城。在紧闭着的西直门前，学生代表与军警几经交涉，都无结果。千百个爱国学生激愤了。他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这句话有力地拨动了大家的心弦，激起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新仇旧恨：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就不断侵略中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已吞噬了祖国的半壁锦绣河山，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不许为了挽救祖国危亡而行动起来的中国人的进入自己的城门。广大爱国学生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警告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的武力只能征服国民党卖国贼政府，却征服不了四万万不屈的中国人民！他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积郁心底不能大声呼喊的声音！当喊出第一声的时候，大家眼里都不禁涌

出了热泪。

“争取爱国自由！”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在严寒的朔风中，爱国青年学生们振臂高呼着。党所拟定的宣传口号，已开始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了。

在城里，清晨，东北大学早已沸腾了。大家不顾军警的包围威胁和学校当局的种种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当请愿游行的决定向大家传达时，群情振奋，一致选举宋黎同志为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宋黎沉痛地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后，顷刻之间，千百名学生涌出大礼堂，冲出了校门，准备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汇合游行。这时，燕京大学的交通员飞快地跑来报告：进城的路上有密集的军警堵截，清华和燕京的汽车被扣，游行队伍正徒步赶来，可能要迟一点，请东大同学等一等。紧接着又一位交通员骑着自行车来报告：西直门关了！清华、燕京被阻于城外。消息传来，群情愤懑，一城相隔，却无法汇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大学只好孤军出动，有些教职员也参加了请愿游行的行列。大家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呼喊口号，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向着蒋介石卖国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的办公地点新华门进发。

这时，新街口一带已有军警布置了一条封锁线，挡住队伍的去路。为了避开军警，队伍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这时，迎面传来欢呼声，有二、三十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

将至西四牌楼时，队伍遇到了二、三百名武装军警的拦阻。

① 《国民党监察院档案（八）》，《一二九学生运动史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学生们怒溢心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这时，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刀背向学生砍来，有几个女学生被打伤，有的被打倒在地上。关山复同志发现女学生被抓时，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向军警脸上撒去。军警迷住了眼，才松开了手。临危不惧的青年学生们高喊着：“向前冲啊！”边喊边冲，冲破了封锁线，队伍英勇地从府右街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当东北大学学生迈着雄健步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新华门前广场时，在场的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发出震天撼地的热烈的欢呼：“欢迎东大同学！”“毋忘‘九·一八’！”东北大学学生也激动地呼喊：“我们要打回老家去！”

师范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等校的学生也都先后汇集在新华门前。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各个学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阻拦和封锁。但是，各校学生队伍充分发挥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同军警奋战，终于胜利会师。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在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前几天，曾有一批又一批被日寇雇佣的汉奸、地痞、流氓、政客组成的“华北民众自治会”，来到这里向何应钦请愿，要求“自治”。守门的军警恭恭敬敬地请他们进去，何应钦笑脸相迎，待若上宾。今天，新华门却紧闭着，门前列着警车队，还有内二区的警察、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平津卫戍司令部特务营的士兵数百人。武装的军警手持明晃晃的刀枪，摩托车上架着机枪，面对着满腔热血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更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无比义愤，不可遏止的怒火，燃烧在每个人的心

中。

这时，广大爱国学生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接见，但遭到拒绝。何应钦慑于抗日怒潮，早已躲到小汤山去了。

广场上，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二、三千名学生，高举起的大旗，挥舞着的标语，在寒风中飘荡。救亡歌曲，一角唱起，四处呼应：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雄壮的歌声未停，响亮的口号声又激荡起来：

“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收复东北失地！”

“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武装保卫华北！”

当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冲破了“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禁锢，满腔悲愤地第一次喊出这些抗日爱国的口号时，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悲壮激昂的口号，显示着古城在怒吼，中华民族在觉醒，抗日救国的意志不可摧！这是广大群众在敌人的重压之下，勇敢地发出了对党的《八一宣言》的公开响应，这表明了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已深入人心。

斗争在相持着。爱国学生临时选出代表十二人，前往居仁堂请愿，并拟定了六项要求，向群众宣读，一致通过：

- (一) 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的组织；
- (二) 反对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
- (三) 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 (四)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 (五) 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 (六) 释放被捕学生。

斗争坚持到中午，学生愈集愈多，情绪愈来愈激昂。这时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才派了参谋长侯成出来和学生见面。

原计划是推举燕京大学代表出来讲话，但因该校游行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同志就挺身而出与侯成进行交涉。这个参谋长失魂落魄地说何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兄弟可以代为转达。同时，他却要求学生“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他的话音未落，立即响起了一阵口号：

“开放西直门！”

“释放被捕同学！”

学生们一致要求他下令军警开放西直门，让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队伍进城参加游行。但是他却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支支吾吾地加以拒绝。

顿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中国！”“我们再也不请愿了！卖国贼不是人！”“今天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我们不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一阵阵愤怒的抗议口号和呼喊，激励着广大爱国学生。

请愿不成，为了表达人民的抗日救国的愿望，中国大学董毓华、东北大学宋黎等同志立即与其他学校代表商量，研究对策，当机立断，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由于东北大学参加的人数最

多，整个示威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便由东北大学担任。同时，考虑到许多学校被围阻，特别是为了接应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同时也为了集结队伍，壮大声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指挥部决定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转道沙滩，然后到天安门集合。当宋黎同志招呼整顿好队伍，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时，群众一致高呼：“现在我们要示威！我们要表示中国人民和华北人民的真实心意！”春雷般的怒吼，在新华门上空回荡。

示威游行队伍，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大踏步地向前进。

瞬间，抗日救国的口号声、歌曲声、旗帜标语招展声和示威的步伐声，谱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交响曲。

数千人的抗日救国的洪流，倾泻在西长安街上。

示威游行队伍总指挥部组织了宣传队，不断向沿街商店和住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沿途两侧的群众（包括商店的店主、店员、工人、教师、家庭主妇和小商贩），不断鼓掌喝采表示支持。很多人争相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人力车夫则跟着高呼：“捉拿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上司派来干涉学生游行的警察和保安队员中，也有些人被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打动。当学生塞给他们传单或向他们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时，他们窘迫地苦笑。

当示威队伍走到西单牌楼宋哲元的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士兵们突然以冲锋式的动作包围上来，事先埋伏在胡同里的警察也一齐出动，手拿木棍皮鞭，向学生劈面乱打。赤手空拳的学生们高呼：“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英勇地抗击了一阵之后，有的学生冲了过去，有的转入了胡同，队伍很快地又

在西单商场北边集合起来，精神抖擞地继续前进了。队伍行进中，许多被驱散的学生归队了，爱国市民也纷纷加入了示威的行列。

抗日救国斗争的风暴，冲垮了辅仁大学闭塞的门墙，把学生召唤到街头。由于事先派出交通员与该校取得了联系，当大队呼着口号经过该校时，刘达等同志踊跃地加入了示威队伍。课堂上的神甫正在向学生讲神学，学生们丢开了圣经，也纷纷参加到队伍中来了。下午一点多钟，突然刮起狂风，气温骤然下降，寒冷彻骨，而游行队伍仍继续前进。沿途的市立十七中学、两吉女中、温泉中学等校都有学生参加进来。

示威游行队伍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门外。示威大队的宣传员跑进红楼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红楼外的群众游行队伍齐相呼应：“欢迎北大同学参加！”“发扬‘五四’精神！”此时，北京大学的爱国学生立即敲起钟来召唤大家。顷刻间，黄敬、刘导生、唐守愚、宋劭文、张震寰等同志与许多学生迅速地冲出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集合在红楼前，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示威行列。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校也都赶来参加。

示威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这支队伍已扩展为四、五千人的铁流，浩浩荡荡地经过东华门，直向王府井大街进发。

严重的斗争再一次出现了。

示威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走在队伍前面的纠察队传来消息：东交民巷一带有一批日军出动，沿街已架起了机枪。反动当局此刻已被示威的怒潮吓得晕头转向，以为示威游行队伍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因此，急忙调来大批军警

部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开来的救火消防车，横列在街口，作为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和大街中间，站满了军警，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凶器，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示威大队指挥交通的自行车队，立即沿队通知：检查队伍，整齐步伐，准备斗争！

这时，学生的领队上前与军警交涉。北平内一区警察署长握着手枪凶狠狠地说：“不许通过，宋司令下了命令，谁敢往前冲就开枪。”学生们没有被他吓住，高呼着“冲呀，冲呀！”一齐往前冲去。突然，武装军警用水龙头向着学生队伍冲射过来。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象一把把尖刀似地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示威游行指挥部的学生和纠察队站在大队的最前列，他们全被水浇透了，身上的棉袍顿时变成了“冰袍”，身上、地上，冰渣哗哗地响。这时，寒冷、饥饿、疲乏交相侵袭，但学生们把这些痛苦完全置之度外。大家想到的是，祖国已经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勾当实在无法容忍，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时，军警又挥着皮鞭、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蜂拥而上，纠察队员和数十名学生英勇地抢过水龙头，奋勇地朝向军警反击过去。大家迎着棍击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的革命气概。在搏斗中，一些学生受了伤流着鲜血，但还是激昂地高呼抗日口号；有人被军警追赶着抓了去，另一些学生又冲上去夺回来。军警的嘶杀声、学生的怒吼声，街头市民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经过约二、三十分钟的搏斗，游行队伍终被打散了。一些学生当场被捕，送往医院抢救的受伤学生就有三十多名。东北大学的林铎同志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同志右臂被砍伤，皮开肉绽，

鲜血涌流……。在激烈搏斗过的大街上，结了一层冰，晶莹的冰里渗透着爱国青年学生的斑斑血迹。

战斗进行了一天，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大家已是疲惫不堪。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宋黎同志冷静地振臂高呼：“到北大三院去集合！”除留少数人作抢救工作外，把一时被冲散的群众队伍，很快地撤到了北京大学三院。宋黎同志慷慨激昂地说：汉奸亲日派的大刀、皮鞭、水龙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求严惩肇事者！我们大家回去组织全市学生总罢课！在一阵庄严热烈的掌声中，大家一致通过“从十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爱国学生们充满自豪地怀着高昂的斗志和信心，分别回各自的学校去了。

城内奋战，城外苦斗。

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成达中学、明德学校的游行队伍，从黎明到黄昏，在透骨的寒风中，坚持斗争，力图进城。但是，城门紧闭，军警戒备森严。一千多怀着满腔热血和无比激愤的爱国学生，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进城！”学生们向军警晓以大义，宣传抗日。斗争持续到中午十一时多，学生们又冻又饿。参加游行的燕京大学老师雷洁琼赶回学校，和校内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C. Sailer）一起，坐着学校的大卡车，将馒头等食物送到西直门，分给学生们吃；同时，清华大学也派人送来食物。饭后，有人提出，西直门不开，从西便门进去。于是，一部分队伍奔向阜成门、西便门。但是，一座座城门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折回西直门。清华大学的黄诚同志挥泪演说，向军警讲解华北危亡的形势，宣传救国的道理。同时，大家又向不得入城的赶大车、赶骆驼的劳苦大众和周围的居民群众，诉说国亡无日的危急形势，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抗日救国的真

相。

时近傍晚，大家虽未入城，但伸张了抗日正气。大家知道，此时的北平城，已不是中国人的了，当局已奴颜婢膝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各校游行队伍，在寒风中悲壮地高呼口号，愤然返校。在归途中，大家义愤填膺地说：“我们已看清了统治者的真面目，一定要以更强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下一次我们要举行示威！”回校后，有的学生激情满怀，自豪地写道：“……我们这次请愿，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结。这仅是一个小火花，但是这小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①

十二月九日这一天，有不少的中外新闻记者，随同游行队伍进行了采访。有《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等报社记者，有塔斯社、合众社、美联社的记者。但是，第二天北平各报一律没有登载爱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消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既扣压这类新闻，又不许在报纸上开“天窗”。报社的编辑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在教育版面上杂乱地全部塞满了横七竖八的广告。如十二月十日《北平晨报》的教育界栏中，将“著名历史概要，又到了”、“本报承印部廉价印书”的广告，排在报纸上“开天窗”的地方。这样的处理，既避免了“开天窗”，又把有重大消息被扣压暗示给广大读者。更何况这种消息又怎能禁锁得住呢？

斯诺夫妇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事前燕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将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预先通知了他们。斯诺夫妇在游行队伍中非常活跃。他们同扛大旗的学生在一块，走在队伍的前头。在游行的进程中，斯诺夫人尼姆·

^① 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一期，1935年12月14日出版，第12、13、14页。

韦尔斯显得很激动。她经常背转身来举起手对大家喊：“你们唱歌呀！”在爱国学生与军警搏斗时，他们和其他记者急忙赶前救援。她为了救护中国学生，被水龙喷湿了衣服。十二月九日晚，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长长的电讯，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在北平的外国记者中，只有斯诺最迅速地发了这条独家新闻。

“一二·九”的斗争，仅仅是开始。一场更大的、更英勇的、更深入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酝酿着，准备着。千万个火热的爱国青年学生，满怀壮志，迎接新的考验和战斗！

沸腾的一周间

十二月十日上午，彭涛、姚依林、郭明秋和黄敬等同志在中国大学女学生宿舍见面时，黄敬同志提出：运动已经爆发了，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现在一定有人找学联。于是，他们决定郭明秋同志立即返回女一中，了解情况，加强联系，以便研究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学生去找学联，实际上就是去找党。果然，当郭明秋同志一跨入女一中校门时，早已有许多人要找她。众人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我们没有参加昨日游行的人怎么办？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同志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不知道，没有参加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郭明秋同志将大家的爱国热忱和心愿，向彭涛和黄敬同志汇报，强调了群众提出“再来一次”的要求。彭涛、黄敬回答说：“群众有要求，那就再来一次吧！”根据九日示威游行后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党决定进一步发动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再

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经过“一二·九”整整一天的英勇斗争，各校的政治空气更浓厚了，斗争意志更坚强了。学生们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了，再也不象“一二·九”前夕那样惶惶不安，而是呈现出一个热气腾腾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十日起，各校都按照学联的决定，实行了全市总罢课，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以更强有力的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镇压。“一二·九”以前，北平学联实际上是个秘密的组织，全市总罢课后，它已成为广泛群众性的公开组织了。这时，党通过学联及时地领导和组织各校学生，在“一二·九”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加强抗日宣传活动，更严密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和扩大运动的影响。

十二月十日，北平学联发布了《宣传大纲》。《宣传大纲》在分析了“一二·九”的紧急形势后，在文字上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要求“一致抗日”。它特别强调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正确方针。它写道：“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①

各大中学的学生组织，在斗争中猛烈发展。过去在反动派恐怖统治之下，许多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遭到了摧残破坏，有的还未建立起来。在“一二·九”后，许多学校都召开了紧急大会，公开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或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九日晚，北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页。

京大学党组织立即筹划成立全校性的统一组织。十日，召集了全校学生大会，宣布成立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选举了朱穆之、陈忠经等同志为负责人，并由杨雨民、刘玉柱等同志组织了纠察队。会上通过如下决议：（一）宣布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三）加紧宣传，成立救国宣传委员会^①。在东北大学，成立了在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委员会，选举了委员和执行委员，组成了三、四十名纠察队，并昼夜值班，负责维持学校秩序，防备坏人破坏。各学校的学生会或救国会组织了各种座谈会、讲演会、时事讨论会，吸收全体学生在罢课期间参加救亡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师范大学丁字楼一楼四号，成为救亡活动的据点。

青年学生在革命烈火中所得到的锻炼和教育，是平时几年工夫所难以达到的，思想觉悟和组织才能都大大提高了一步。经过“一二·九”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学生开始从自发走向了自觉。有些学生愤慨地说：“经过了这次请愿，我们认识了统治者简直不是中国人，失去了中国人为人的道德，我们以后将不再请愿。”^②新的战斗要求学生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自己。这时很多学校里开展了“国民党政府是抗战还是不抗战”的辩论。

宿舍里、走廊上，校园的假山旁和校刊上，都成了大家热烈争辩的场所。学生中极少数的国民党分子，企图在群众中制造对国民党的幻想，拉拢和分化爱国学生，但他们的言论立即遭到了驳斥。大家记忆犹新，回想起“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国民党一连串的卖国活动，虚伪的诺言，特别是自己亲身挨到大刀、皮鞭、水龙的镇压，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有的学生说：“当着他们的爪牙象对敌人似的挥着大刀，拿着机关枪和步枪对着我们

的时候，当着他们的爪牙的皮鞭手掌打到我们身上脸上的时候，我们还敢做依赖‘政府’的迷梦么？不，不能了！”^③

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学生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教育。在燕京大学，通过“华北专题研究会”，组织大家讨论“日本侵略华北之方式”和“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又通过“青年问题座谈会”，讨论“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及“如何组织民众”等专题。此外，还组织了“十二九文艺社”、“十二九剧社”、“平民夜校”、救护班、电码训练班、国内外宣传组、翻译组等团体，出版了《十二九特刊》。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出版了《怒吼吧》。在第一期上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大声疾呼：“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为扩大“一二·九”游行示威的影响，十二月十二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接受了斯诺的建议，在学校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两同志主持。除斯诺外，前来参加的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等驻北平记者六人。十四日，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黄诚同志等，邀请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著名爱国教授许德珩来校讲演。在大礼堂的讲坛上，许德珩追述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精神。当他沉痛而激

① 《北大周刊》创刊号，《一二·一六示威专刊》

② 《记一二九》，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③ 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1号第4页。

愤地说道“我是江西人，但是现在我的家乡，中国人还在那里打中国人……”时，遭到了台下极少数右派学生的捣乱破坏，用鸡蛋和碎煤块打他。广大爱国学生立即起来保护许德珩，怒斥右派学生的无耻行径。在由黄诚等同志护送他回城途中，许德珩鄙弃地说：“我是预料到的，一定会有坏人破坏捣乱。”他的爱国精神使学生们深为感动。

通过各种活动，学生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投降之间的关系。有的甚至在几天前还拥护蒋介石的学生，现在也起来反对蒋介石了。有的学生激昂地说：“我们要用英勇不怕死的爱国精神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个死活”。“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阶级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短短几天工夫，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必须坚决斗争，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们的思想开始从“不当亡国奴”提高到“抗日反蒋”的水平，为进行更英勇的自觉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大家的思想收获，及时地化为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在实际行动中，又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觉悟。清华园里，抗日救国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每天有许多学生在寒风里奔跑，担任守卫、交通和巡逻等纠察工作；每天有许多学生夹着宣传品，跑到农村或中小学去宣传；每天有许多学生采访着各种救亡消息，编成刊物，寄往全国各地；学生们还在科学馆里，通过学校实验室的发射台，用英、法、德、日四国语言向国外进行广播。

“一二·九”运动的真实消息虽然被反动派封锁了，学生们却千方百计地扩大着运动的影响。北平爱国学生抗日救国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国内外。

反动派继续千方百计地破坏学生运动，命令武装军警封锁各校，逮捕进步学生。北京大学各院的宿舍、教室，每天经常有数十人的便衣侦探或骑车队，出没在景山东街和沙滩附近。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爱国学生运动的死敌胡适，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的反动文章，赤裸裸地反对“一二·九”运动。胡适无耻地攻击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受了“浅薄的煽动”，是“少数人把持操纵”，充分暴露了他为反动政府残酷镇压学生作辩护的帮凶面貌。同时，胡适又重弹“读书救国”的陈词滥调来麻痹青年学生。他说：“只有拚命的培养个人的知识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他企图把青年从革命的道路上引开，瓦解和取消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生爱国运动，并使青年学生跟着国民党走卖国投降的道路。

但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广大学生很快地就看清了胡适的反动面目，对他的反动言论及时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有的学生写道：“他们是一群卑贱的东西，一方面用武力压迫民众，一方面用甜言蜜语来欺骗群众，我们决不受他们的欺骗！”^①同时，胡适的谬论也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反对。有些反驳文章指出了胡适文章的反动实质，揭露了胡适对学生运动的一贯反动立场。

《大众生活》上的《为胡适先生“进一言”》一文^②，指出他的文章通篇是废话。

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和制定“再来一次”的行动计划。

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董毓华、孙敬文、高惠如等同志，经常开会研究，通宵达旦。他们有时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碰

① 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3期，第3页。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第417页。

头，有时在辟才胡同洋车厂彭涛同志家里讨论。几天之内，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第一、制定了示威游行口号。第二、决定了发动群众的方法，以先进的学校带动比较落后的学校。第三、研究了斗争艺术，不仅要善于安排“发兵”，还要善于胜利“收兵”；划分发动地区，队伍分成若干路，并确定了两个集合点。这样既可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又可以保持自己队伍不被打散。第四、规定了城内外各校队伍的行动路线，选择劳动人民集聚的地方——天桥，作为各路队伍集合点，并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第五、派出代表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把抗日的火种撒向四面八方。第六、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和市民的支持，特别是争取大学教授、中外新闻记者的同情，并尽量利用他们所乘的小汽车来阻挡军警。第七、根据党在白区工作的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不公开出面参加活动；示威游行的指挥部，基本上隐蔽在群众队伍中，只由宋庆龄和邹鲁风同志公开负责总指挥。第八、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学生的告密和反动当局的破坏，示威游行的时间，事先不宣布，要求各校学生天天做好“待命出发”的准备，一俟命令下达，立刻行动。

这时，宋庆龄从上海给北平学联汇来一百多元，作为抗日宣传费用；还有北平的一些爱国的左翼教授也捐了数百元。这些钱，不仅从物质上支持了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精神上给广大爱国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一周之间，形势继续发展着。各校学生自治会利用了两个战斗的间隙，在学生中为进行新的战斗做好了准备。十二月十四日北平报载，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在十六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党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发动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了使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决定要比上一次更

广泛地发动群众，使运动具有更大的规模，以充分显示抗日的民意不可侮，群众的力量不可摧。

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对这次示威游行作了严密的部署。

大示威的计划和路线是：城内各校一律早上七时出发，城外各校相应提早出发，分别到劳动人民聚居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使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然后，进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行经东单，再进到外交大楼——预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

除了确定示威计划和路线外，这次示威指挥部还着重具体研究了斗争的策略，提出要采取多路出动，分散敌人注意；互相接应，冲破敌人封锁包围；严密交通，加强队伍联络等机动灵活的战斗方式。同时，对示威游行队伍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情况做了如下规定：如果大队被冲散，就以中队为单位集合；如果达不到天桥，就到正阳门外集合。

十四日当天，指挥部还组织了中队长以上的学生进行演习。

十五日，各校学生都接到了学联关于十六日举行大示威游行的通知。大家情绪沸腾，斗志昂扬，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吸取了上次被阻在城外的教训，分别组织了先遣队员进城。这些先遣队员，有的以亲友关系，有的以同乡关系，或以其他方式，借住在城内，以便接应第二天大队人马入城。十五日下午二时，在燕京大学的纠察队紧急会议上，总队长在宣布派遣三十人分头预先进城时，想到将会有部分战友可能牺牲，他的双眼便充满了热泪。但是，他的话音未落，在八、九十人的会场上，立即就有六十名热血的青年，以豪迈的气概，报

名参加这一壮举。清华大学的一些先遣队员，在临行之前，都喝点酒，表示告别，以壮行色。杨述和华道一两同志当夜进城，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房间，连夜赶制第二天示威游行用的“国立清华大学”大横幅。

十五日夜幕降临之时，在王府井拐角的长安饭店的一间房里，来了两位声称刚从天津来平的“旅客”。一位是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同志，另一位是北平学联主席郭明秋同志。接着北京大学的黄敬同志，北平临委的彭涛同志和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同志也来了。他们在彼此交谈中夹杂着英语说笑一阵后，就坐下来以打扑克牌作掩护，研究和检查示威游行计划的执行情况，并约定游行结束后，到辟才胡同彭涛同志家碰头。这个秘密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十六日，天刚拂晓，他们便冒着逼人的寒气，踏着冰霜，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六”的大示威游行中去。

“一二·一六”大示威

十二月十六日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继十二月九日之后，举行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古老的北平城，再一次怒吼了！

这天，城内各校共组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包括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平民中学、师范大学、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镜湖中学；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包括弘达中学一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包括求实中学、贝满女子中学、两吉中学、

河北高中、东北中山中学、辅仁大学、华北中学、中法大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温泉中学。城外各校集中为一个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包括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北平各个大中学校几乎都投入了这个救亡图存的新战斗，参加的学生总计约有一万多人。

十二月九日以来，很多学校的学生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

十六日这一天，北京大学各斋、院的门口，都布满了军警，把枪口对着准备出发示威游行的学生。当西斋学生高举“北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突围时，为首的三人被捕了；大家随即发起第二次冲锋，前仆后继地涌上去。这时，战胜了军警包围的东斋、西斋和五斋的学生赶到，内外夹攻，逼退了军警，爱国学生们汇合起来直奔北大三院。

北京大学所率领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先与贝满女中、育英中学集结至北新桥与东北中山中学、求实中学等校会合；再由鼓楼到地安门，河北高中、两吉中学、温泉中学、精业中学……陆续地参加了战斗的行列。

在南长街口，队伍遭到了军警的水龙射击。当即有十几个学生不顾一切地直冲过去，夺下水龙，并用来反射军警。军警们被射得狼狈溃退后，又手执大刀、木棍疯狂地反扑过来。但当军警再次端起水龙行凶时，水龙已是有气无力了。原来聪明的学生早已用小刀将水龙带子割开了几个裂口。军警想再用水龙来驱散学生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大队终于冲过南长街口，到了西长安街。

但是，更严重的斗争来到了。西单牌楼的军警不等学生近前，就举起大刀、端着枪冲杀过来。示威学生向他们呼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反动派的走卒却叫嚣着：“开枪！开枪！”两个

学生头部被砍伤，鲜血直流。但他们并不顾及自己的伤痛和危险，仍然奋勇和军警搏斗。一位十五、六岁的中学女学生被军警野蛮地按在地上殴打，但是，她英勇不屈，大声叫喊着：“你打你打！反正我是中国人！”这种不屈于反动派暴力的顽强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青年一代热爱祖国、勇于斗争的革命气概。这时，大家一面将受伤的战友送回救治，一面很快地散入附近的胡同，接着女一中、华北中学等校学生赶来参加，在西交民巷重整阵容，依然斗志昂扬地向天桥前进。

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和孔德学校组成的城外大队，在黎明时分就擎着墨迹未干的“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旗、标语，浩浩荡荡地奔向西直门。城门仍象七天前那样紧紧地关闭着。广大爱国学生怒火中烧，立即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奔西便门南过火车的铁门，仍遭阻拦。

这时，两千多学生激怒到了顶点，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冲开铁门。压抑着的愤怒立刻化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凝结在每个人的双臂上，千百条臂膀组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在“一、二、三……”的冲喊声中，大家用力撞击着铁门。学生们虽然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却毫不停歇。前面的冲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象千层汹涌的波涛撞击着古老的城门。渐渐地，门上的铁键开始弯曲了，门缝愈来愈大了。这时，城头上的军警慌乱起来，从上面扔下石头砖瓦。学生们奋不顾身一面用砖石反击，一面加紧了冲击。

在一阵震天的欢呼声中，铁门边的墙撞松了，铁键终于脱落了，紧闭的铁门竟被撞开了。

“冲呵！”“冲呵！”学生们立刻蜂拥而进，大家臂挽着臂，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欢呼声，进入西便门，经和平门向天桥进发。

在和平门外的师范大学，清晨起即被二百多军警包围。学生们发起了几次冲锋，都未能突围。正好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示威队伍乘胜赶来，顿时声威大振，学生们内外夹攻，突破了军警的包围，加入了示威的队伍。

在石驸马大街，第一大队的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前一天进城的一部分先遣队学生，也和军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支队伍由北沟沿出发，行至顺承王府门前，为警察所阻；再至锦什坊街，联络北平大学工学院、镜湖中学等校，经闹市口，民国学院参加。当示威大队行至石驸马大街师范大学文学院前，正值师大学生向外冲，警察极力阻止外出。这时，军警又转向前来的大队猛冲，用皮带大刀向爱国学生乱抽乱砍，数名學生被砍伤，血流满地，队伍被冲散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先遣队员，如黄华同志等十余人被抓到前门警察分局。示威队伍退至西南方向，联络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但是，法商学院也被军警包围，当示威大队人马到达进行反击，学生们才冲出了校门。这支示威大队，沿途扩大，达一千多人，虽数次被军警冲散，学生们百折不挠，经过顽强战斗，又集结起来，及时地赶到了集合地点。另外，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这一天采用了前门拒敌、后门突围的办法，出学校后门与东北大学取得了联络；并有少数学生易服改装，出了校门，乘坐电车直接至天桥。

同一个时间里，许多学校的学生都采用了灵活巧妙的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师大女附中的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推着自行车，提着书包，推说要回家，巧妙地越出了学校当局把守着的大门，参加了示威的队伍。有的学校的学生三五成群地分散出发，装做买东西或逛大街的行人，军警们摸不着学生大队究在何处。但忽然间，击掌声四起，从街头、胡

同里，涌出一支又一支的游行队伍，直奔天桥。这些灵活巧妙的战术，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爱国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迸发出来的智慧的光芒。

上午十一时左右，四面八方的示威队伍，一路又一路，胜利地会师在天桥了。

天桥——北平劳动人民群众聚集的地方。除了许多沿途跟随游行队伍前来的市民外，天桥周围的工人、农民、市民、小商贩、东北流亡同胞都参加到斗争中来了。他们和学生们一道散传单、贴标语、喊口号。人力车工人自动组织起来的一支游行队伍也赶来了。

爱国学生们东一处西一堆地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大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残暴和蒋介石政府卖国的罪行。“中国人决不作亡国奴！”这是广大市民和学生一致的心声和意志。许多市民维护着学生，不让军警破坏和阻止宣传的进行。当军警干涉时，市民异口同声说：“学生们是爱国的！”当军警企图逮捕学生时，市民群众层层抵挡；而当军警问学生讲演用的凳子是谁的，想抓走市民时，学生们愤怒地回答：“你们管不着！”

人越聚越多，天桥广场上已经有了两万市民和一万多学生，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情绪高涨。广场上旗帜翻腾，标语成林。这时，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宣布了市民大会的开始。顿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声震云霄，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时黄敬站在一辆破电车上，由宋黎和其他学生支撑着，慷慨激昂地领着广场上的群众高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爱国自由……。

天桥已成了愤怒的海洋，充溢着同仇敌忾、气壮山河之势。

接着，大会当场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

- 一、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 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
- 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

四、反对华北自治，到外交大楼及市政府质问地方当局何以卖国？

大会议决立即到外交大楼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还散发了告民众书，上面说：华北是中国的华北，是中国民众的华北，是我们自己的华北。在这生死关头，我们应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分割中国领土的“防共运动”、“自治运动”，誓死争取救国运动的绝对自由！

市民大会结束后，立即由学生和市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长达二里的游行队伍，示威开始了。

示威队伍共分两列，每列以四人为一排，手挽着手，臂扣着臂向前走。清华大学前导，高举“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一切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和纸旗，两旁各校纠察队及自行车交通队随行。队伍在行进途中高呼：“打倒汉奸！”“反对一切伪组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散发红绿传单，在电线杆上贴标语……。

这次示威游行的人数之众多，和它所具有的广泛性，为北平十年来所未有，群情的激愤和热烈也是空前的。它继十二月九日之后，再一次强有力地打破了笼罩着华北和北平的沉郁气氛，驱散了人们惴惴不安的心情，增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不会亡的坚强信念。沿途又有许多市民陆续加入了队伍。市民知道学生们从上午到下午，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纷纷送来开水、面食，许多贫

苦的市民热情地将自己糊口的窝窝头也送给了学生。

这些，深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它已迅速地传播到各个阶层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开始化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了。

当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到达珠市口时，城外大队的学生也冲破了沿途军警的重重拦阻而赶到。双方会师，声势倍增。行进至正阳门时，守城军警连鸣数枪，武力阻拦进城。后队听见枪声，不明真相，秩序稍乱。指挥部当即以退为进，将队伍带至前门西车站广场。纠察队用自行车搭成主席台，再次召开市民大会，并议决下列各项：

- 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 二、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
- 三、通电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
- 四、吁请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
- 五、即日全市罢工、罢课、罢市；
- 六、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之绝对自由。

会后，继续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原规定路线是：沿前门大街进前门，经天安门、东长安街，转东单到外交部街；然后，由北城转到西城解散。但是，反动当局见示威队伍直奔前门，便赶紧把前门关闭了，又堆上沙袋，加派军警看守。这时，指挥部和军警谈判，要求进城。可是军警声称奉命不许学生全体列队进入内城。几经交涉，军警才表示可以分三批通过。指挥部立即警觉到这是“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充分考虑了对策以后，决定分三队入城：一队从正阳门进入；二队绕道宣武门入城；三队留守原地，等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第三队。示威队伍从前门一带出发，行进途中，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敌人摩托

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但是，爱国学生们毫无惧色，勇往直前。

第一队由黄敬同志带队，从正阳门入城后，通过棋盘街，冲向西长安街，又从西单牌楼转入宣武门内大街，在绒线胡同西口被反动军警保安队拦住去路。各学校的代表向他们宣传当时革命的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展开了说理斗争。但是，反动军警保安队坚持说“上边有命令”，始终不允许学生队伍向南行进。指挥部看到从绒线胡同到宣武门，完全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宋哲元的大刀队，如果硬往南冲，不但冲不过去，而且必然要引起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当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战友们已滴水不打牙地在冰天冻地里苦战了一整天，也应该转移阵地，从事休整。在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指挥部决定整队往北，一边继续示威游行，扩大宣传，一边分头回学校，胜利收兵。拦路的军警当局也答应了学生队伍回师北进。但是当学生队伍井然有序地转弯北进时，反动军警当局却突然一声命令，向爱国学生发动了猛袭。宋哲元的大刀队挥舞着白光闪闪鬼头大刀，向走在前列的女学生首先冲杀了过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重大伤亡，指挥部又决定化整为零，很快地组织了退却。

留在西车站广场的第三队，在军警的阻止下，未得进入正阳门，在城外绕了一圈之后，与第二队在宣武门外会师了。他们曾多次试图冲开城门和城里的战友会师，都被反动军警破坏和阻挠了。这时，示威队伍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城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

斗争在相持中。第二队又根据冲垮西便门的经验，数度冲击宣武门。由于城门内已经堆垒沙袋，冲击未获成功。这时，宣武门外几个站在队前的学生，发现城门的瓮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

他们心里惊喜起来：“从这儿爬进去，将城门打开！”立即，清华大学的女学生陆瑾同志，勇敢地将身子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她迅速地跳了起来，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但她还没有来得及将城门打开，就被赶来的军警抓住了。在广大学生的再三斗争下，军警才不得不把她放还，并答应开城门，让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返校。

当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离开宣武门以后，夜幕降临，路灯突然熄灭，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外开始了对示威游行队伍的血腥镇压。爱国学生们在同军警搏斗中，将队伍分散在两旁的胡同里。千百个爱国学生在黑夜、寒风、枪刺下英勇地抗击着，不少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皮鞭下受伤了，被捕了。在“一二·一六”一整天的斗争中，全市学生被捕的共有二、三十人，而受伤者将近四百人。

反动军警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市民群众的满腔义愤。宣武门内外的市民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很多市民自动地参加和支援了这场斗争。有一家豆腐坊把未作好豆腐的豆浆送给学生们喝，暖暖身体、充充饥。人力车工人主动地拉着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宣武门外一家诊疗所的医生和护士，都出来给受伤的学生包扎伤口。《北平晨报》报馆，打开大门，让一些学生进去躲避。这些热情生动的情景，给广大爱国学生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一二·一六”的全市爱国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闹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千万群众的英勇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卖国活动，使得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北平爱国学生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英勇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在这两次示威游行中，斯诺沿途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中国青年为拯救祖国和民族危亡，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也是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镇压人民抗日活动的历史见证。后来斯诺在追述这一伟大运动时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我们自豪地在这个队伍的领导者旁边，和他们并排走着。其他的记者中，特别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和《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都抱有同样的想法。”“北京的示威，被全世界报纸用大标题登出，而中国的许多报纸，也无视新闻检查官的禁令，刊出了报道示威的消息。中国正在苏醒过来。”①

十二月二十二日，学联收集了受伤同学的血衣五百多件，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血衣展览大会。这天参加大会的有各校学生代表两千多人和部分学生家长。会场上标着“血淋淋铁的事实”七个大字。很多受害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台上台下，声泪俱下，义愤填胸。当场决议对全国发布文告，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决议组织北平各界同胞，前赴协和医院、北平大学医学院等处慰问受伤学生。北平各界市民去医院慰问的络绎不绝。社会各界人士亲眼看到爱国青年学生惨遭摧残，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日益愤懑，对爱国青年

①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8月第一版，第58、59页。它是斯诺所著《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Part Two, To Blow the Fire, 7 Action）一书中的部分摘译。

学生深表同情。

“一二·一六”的斗争再一次用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学生：国民党政府是一贯执行卖国残民政策的。他们认识到：“在反帝过程中首先要反对不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统治者。”^①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在学生中极大地孤立了。学生们又从贫苦人民的热情支持中，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进步学生已开始觉悟到：“中国民族解放的重任需要全国下层群众的通力合作。”^②“如果不愿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苟安偷生，那么出路只有一条——深入民众，组织民众，武装保卫中国。”^③

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如何把运动引向深入、持久？就在“一二·一六”当天晚上的总结会上，北平学联党组织核心成员已初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是在彭涛同志家开的，有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同志参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二·一六”的行动是成功的；但需要进一步不断巩固运动的成果，不断把运动推向深入，以克服过去历次学生运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缺点。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下一步就应该搞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工作转向深入，到士兵中去做工作，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工作。还要深入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认为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学生的力量很快团结和组织起来，使其中的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在斗争中保存力量，才能使运动不断扩大和提高。他又请大家考虑：“今后光有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和扩大？”他说：“对这些问题必须找到正确的答案，否则群众运动有可能因敌人的破坏而消沉下去，或者因为领导不力而低落下去。”他沉吟半晌，然后提出：“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大家认为黄敬同志提

出的问题十分重要，但由于考虑还不成熟，一直讨论到深夜也没有结果。

“一二·一六”后不久，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派林枫同志来到北平，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与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加强了党对“一二·九”运动深入发展的领导。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抗日爱国示威运动，响应了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显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誓死保卫祖国、抗击日寇的坚强意志，吹响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

-
- ① 北平大学工学院编：《救亡》，《一二一六示威特刊》第1期第6页。
 - ② 民国大学编：《自由周刊》创刊号第4页。
 - ③ 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5期第2页。

三、掀起了全民抗日的大风暴

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如巨浪排空，奔泻千里，势不可挡；又如阵阵惊雷，震撼着祖国的大地，立即得到全国广泛的响应。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了。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消息，又很快地通过各学校的学生自治会、抗日救国会的电文，以及学生的信件和进步报刊传到了北平，有力地声援和鼓舞了北平的广大爱国学生。

海河在怒吼

华北局势的恶化，首当其冲的是天津。这里市内就有日本兵营，有大批日本武装特务、浪人、汉奸到处欺压中国人民。他们利用日本租界制造和推销毒品，开设烟馆和妓院，毒化中国人民。日本财阀在天津筹设十五万锭子的大纱厂、日本东亚烟草公司也在天津设厂；日商、汉奸和买办相互勾结，武装走私，运进日货，大量倾销。这里，还有宋哲元的左右手天津市长肖振瀛，各国租界住有北洋军阀、失意政客……。一小撮汉奸、白面客公开拥护“华北五省自治”，气焰很嚣张；南开大学附近有日军飞机场，日寇飞机经常在课堂屋顶上低飞而过；上课时，日本大将松

井，公然到课堂上来“听课”，监视有无抗日言论与行动……广大市民和学生身受其害，深感屈辱。天津，这一华北的重要港口，实际上已受到日寇的直接控制，成为它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之一。

在日寇直接威胁下的天津爱国学生，胸中早已憋着一股抗日救亡的怒火，一触即发。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第二天传到天津时，群情振奋。南开大学等校学生立即响应，宣布罢课，表示声援。“日本人退出华北！”“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日本退出华北五省！”等口号声，在各校回荡。各校爱国学生积极酝酿筹备举行抗日救国请愿示威游行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两支示威游行队伍。一支队伍由河北省法商学院、河北省工业学院、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天津商科职业学校和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等组成，在辰纬路公共体育场集合后，奔向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请愿，然后开始示威游行。队伍经经纬路出发时，北洋工学院等校加入，并组织了纠察队，沿途散发传单、呼口号、贴标语，进至金钢桥北边。另一支队伍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等校组成，经南马路、东南城角、东马路，到达金钢桥南边。两支游行队伍同时遭到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阻拦，密密地排成一条横线，挡住队伍的去路，不能汇合。这时，广大爱国学生愤怒万分，奋不顾身地向前冲，边冲边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爱国警士们和我们一致要求抗日！”经过数次冲锋，反复搏斗，不少学生被打伤，但是爱国学生们的士气越来越旺。在统一指挥下，两支队伍齐声呐喊，奋勇夺路，南北夹击，终于冲破了军警的阻拦和堵截而胜利会师了。

南北两支队伍会师后，立即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大示威。示威

群众斗志昂扬，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对内团结，对外抗战！”……沿途还向市民作抗日救国的宣传。下午一时许，游行示威队伍进入南开中学运动场集合，举行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会”。大会议决发表宣言、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派代表慰问北平学生，并决定十九日全市总罢课，以打击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当局所制造的“华北自治”。

当晚，南开中学高中部学生，坚决执行全校学生赴京请愿的决议，齐赴天津西站，要求乘火车到南京去请愿。但遭到铁路当局的阻挠。但是，“同学们意志非常坚定，谁也不肯回去。大家在车站上足足熬了一夜。火车只是在远处叫，不向近处来。同学们无不又恨又气。有的同学大骂铁路当局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们可以调出大量的车皮为日本帝国主义运兵到天津，却不肯让我们几百个爱国学生搭火车到南京请求抗日。”^①于是，大家在气愤之下，一致决定徒步南下，沿津浦路前进。一路上，他们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一直走到杨柳青镇。他们在镇上的小学校里受到了师生们的热情招待。大家把在车站上的冷遇和在小学校里的温暖，加以对比，认识到广大群众是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的。这时，请愿团的领导估计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将继续阻挠学生南下，而请愿团在行动之前又未作好充分准备，决定暂时同意前来劝他们回天津的几位南开中学教师的意见，先回天津，再筹划进一步的行动。

天津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冲破了国民党“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恐怖统治，把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支援了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的气焰，打击了亲日派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阴谋，提高了群众

的抗日觉悟，揭开了天津市广大人民群众抗日革命的新的—页。

抗日风暴席卷黄浦江

上海，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最大的城市。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在这里留下了一笔笔血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屡遭敌人的严重破坏。但是，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始终英勇地坚持斗争，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涌到黄浦江的时候，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即迅速地高涨起来。

十二月十二日，在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八大联”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马相伯等二百八十三人，鉴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迫，整个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热情支持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因为华北事件的教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的解放，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天经地义，而是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天经地义。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②同一天，复旦大学也发出通电，对北平

① 《天津“一二九”运动的一个侧面》，《中国青年》1953年第23期。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

爱国学生表示“万分同情，并以绝大决心，为诸君后盾，誓死反对任何破坏国家统一之企图。”^①上海蒙藏专科学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发出通电响应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十四日，各大学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爱国运动和爱国言论。十八日，上海八十多个中学，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接着有五十多个中学成立了救国联合会。

上海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没有忘记三年多以前“一·二八”的淞沪抗战，更不能忘记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与日本侵略者所签订的卖国的“淞沪协定”。现在大家又听到北平爱国学生为要求抗日，竟血染古城，胸中怒火更不可遏止，立即酝酿罢课声援和示威游行。

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揭开了上海声势浩大的学生救亡运动的序幕。十二月十九日，复旦大学爱国学生首先发难，并联合持志学院、同德学院和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在闸北一带举行了示威游行。当天晚上，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两江女子师范、麦伦中学、正风中学、爱国女中等学校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安和寺路时，在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曾仲鸣的住宅前，愤怒的学生紧握拳头，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杀死汉奸！”声震云霄，划破了静寂的黑夜。游行队伍到达江湾时，几乎全市大、中学校学生都聚集起来了。黎明后，大家汇集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门口，愤怒地呐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伪自治！”

“吴市长快出来！”

迫于群众的强大威力，上海市的反动头子吴铁城出来了。他

身旁一边站着教育局长潘公展，一边站着社会局长吴醒亚。吴铁城假惺惺地对大家加以“慰勉”，对游行学生提出的要求，只是支支吾吾地加以搪塞。在群众的压力下，吴铁城才不得不许下“绝对保护上海学生爱国运动和言论集会自由”的“诺言”。这时，群众才整队继续示威游行，直到天黑。这两天一夜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才仅仅是初战。

从上海市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回校后，部分学生提出到南京去请愿。党为了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的这一正义要求，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去南京请愿。

十二月二十三日，复旦大学近一千名爱国学生，举起“赴京请愿讨逆团”的旗帜，向上海火车站北站进发。当队伍走近驻有日本军队的天通庵时，上海反动当局慌忙派了“专使”来劝说，不让学生经过天通庵，以免引起“友邦”的误会。学生群众不顾沿途军警的阻挠，冲进了北站，登上了火车。但是，火车没有司机。去找站长的学生，被反动站长用手枪逼了回来。监视火车头的学生，也被特务拳打脚踢，从火车上推下来了。随后，火车头也被开走了。

夜已降临。车站被大批军警层层包围。车厢里、站台上、人潮汹涌着，救亡歌声不断。深夜，纠察队在月台上巡行。不久，东南医学院的学生突破了军警的阻击，连夜沿着铁路线赶来。

二十四日清晨，又有大夏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建国中学、复旦实验中学、武陵中学、光夏中学、正风文学院、同济职业补习学校、新亚中学等校学生，纷纷赶来，分别占据各节列车。到达车站的请愿学生，已有三千人左右。这时，上海的各

① 上海《申报》，1935年12月13日。

工会、文化团体、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代表，络绎不绝地前来车站慰问，还送来了许多面包、饼干和水果。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何香凝也来慰问了。当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在车站阻挠爱国学生去南京请愿，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坏人利用”时，何香凝当场就义正词严地指着潘公展说：“学生们要求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就是你！”各界爱国人士对请愿学生的慰问，极大地鼓舞着爱国学生，增强了斗争的决心。

经过斗争，国民党上海当局迫不得已，假意允许开车，但暗中却在青阳港埋伏军警，准备劫车。当火车驶抵青阳港时，从车窗往外看，只见在通往车站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着军警的大汽车滚滚而来。火车司机在学生的鼓励下，将车疾驰而过。到昆山时，列车才被迫停车，司机被混在学生中的特务，以“枪毙”相威胁而离车。但学生们不顾一切，自己冒险开车。国民党反动派又拆毁路轨，将铁轨抛入河中。学生就冒雪涉水，把铁轨打捞起来动手接好。沿途很多铁路工人也不顾反动派的阻挠，奋勇帮助学生修路。有一位老司机还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帮助学生开车。他一上车就热情地握住爱国学生们的手说：“你们为了抗日这样干，就是枪毙我，我也要帮助你们把车开到南京。”

二十六日车抵无锡，又遭满载国民党宪兵的列车拦住去路。学生前往交涉，再遭扣留。双方僵持到二十七日清晨五时，宪兵用武力劫持火车转朝上海方向疾驰。不久，车突然停下，学生被迫下车。这一千多人的请愿讨逆团，便继续在无锡大街上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无锡车站旁的工厂里，工人们也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报馆的印刷工人和记者，全体罢工一日，以示声援。无锡的三千多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经过爱国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和交涉，被捕

的学生终于获释归队。几天几夜的斗争，深深教育了群众，大家已经认识到向国民党卖国政府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抗日救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请愿团的领队考虑到经过斗争，大家觉悟提高了，也考虑到在冰天雪地里苦战了五天五夜，需要休整；为了进一步聚积力量，巩固战果，使斗争深入发展下去，决定不再去南京请愿。爱国学生们冒着寒风细雨，在宪兵的“保护”下，乘着铁篷车，回到了上海。

这期间，北平学联派了燕京大学的陈翰伯、清华大学的韦毓梅、陈元等三人，于十七日来到上海，扩大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经过《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同志的介绍，陈翰伯同志等认识了浙江兴业银行襄理、爱国人士章乃器先生。由他出面，邀约了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胡子婴等著名爱国人士，在功德林素菜馆同来自北国前线的爱国青年见面。他们对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不久，陈翰伯、韦毓梅又见到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该校学生陈明同志，并与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复旦大学、持志学院、暨南大学等校的爱国进步学生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二十三日，由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在先施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请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与上海爱国青年学生见面，以打麻将牌为掩护，由陈翰伯等向大家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北平和上海的战友们，相互支持，相互鼓舞，共同商量如何在上海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复旦大学“赴京请愿讨逆团”出发的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党又领导和组织了各大中学校留校学生和一部分工人、店员、妇女，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由中共江苏临委的王翰等同志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南京路的五芳斋面馆。

这一天，天刚刚亮，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顶着寒雾，迎着晨曦，分别奔向示威的第一集合点——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

九点钟刚敲过，从五芳斋面馆里，放出了“砰！砰！砰！”三响爆竹。大陆商场的楼顶上撒下了无数张红红绿绿的传单，在半空中翻飞。聚集在商场附近的示威群众，纷纷涌向商场门口和大马路上……这时候，潜伏在大陆商场里的一群英帝国主义巡捕，突然飞跑出来，杀气腾腾地向尚未集合好的爱国学生扑来。

顿时，人群沸腾起来。“冲呵！冲呵！”大家迎着警棍，赤手空拳地同巡捕搏斗。夹铅的警棍沉重地落在爱国学生们的头上、背上、臂上……有两个女青年学生被巡捕打倒在地，头发里冒出了鲜血。十年前的“五卅”运动，革命先烈的血迹染红了南京路；今天，又洒下了抗日爱国学生新的斑斑血痕。

英勇的上海爱国学生，不畏强暴，奋起抗争，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冲上来，终于在搏斗中，冲开了一个缺口。示威群众得到了指挥部传来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计划，奋勇地奔向北站广场集合。沿路口号声不断，一个人振臂高呼，千百个人立刻响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对外，一致抗日！”“欢迎市民自由参加示威运动！”“民众们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在队伍行进的过程中，有许多店员、工人、职员、市民不断参加进来。示威队伍来到北站广场，有力地声援了正在北站要求到南京请愿的爱国学生。当示威队伍转到宝山路时，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许多工人冲出厂门，和学生队伍汇合，并肩战斗。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们在“一·二八”时曾被日机轰炸的东方图书馆前召开了市民大会。爱国学生发表了演说，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

市民大会结束后，人们继续游行示威。当队伍进入北四川路转向白渡桥边时，又遭到埋伏在桥南脚下的帝国主义巡捕的袭击

和军警的阻击。为了避免损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指挥部下达了解散的命令。示威游行的群众只好抑制着仇恨的怒火，有秩序地散去。

这一次示威游行和其他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发扬了上海的光荣革命传统，向全上海人民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并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接着，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各校实行罢课。

二十七日下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了会员大会。到会三百多人，通过了大会章程，选出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邹韬奋、周建人、李公朴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迅速发展，敌人侵略的决无止境，中国民族已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牺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在当前严重的危机下，全国大众已经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的高潮，明显的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这一爱国运动正在开展中，钢铁般的民族阵线将由全国大众自动建立起来，形成不可侮的巨力。”^①

在党的领导下，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而兴起的上海爱国学生运动，始终是同上海各阶层人民、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继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等组织，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5、156页。

这时，刚从法国归来的冼星海同志，接过聂耳同志遗留下来的战斗任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许多著名的歌曲，如《我们要抵抗》、《救国军歌》等等。在无数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人们激昂地唱着 he 谱写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聂耳和冼星海创作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充分发挥了革命歌曲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威力，鼓舞着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勇敢地去战斗。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华民族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中国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给予了北方爱国学生以最热忱的关怀、爱护和支持。“一二·九”运动后不久，北平学联派邹鲁风同志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邹鲁风带上曹靖华送给鲁迅先生最喜欢吃的半面袋小米，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在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里，见到了一直坚韧地战斗在刀笔丛中、向着敌人英勇冲锋陷阵的鲁迅先生。当邹鲁风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后，鲁迅先生一边亲切地招呼邹鲁风坐在他身旁，一边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原来鲁迅先生为了避开站在书架前的一个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就带领着邹鲁风走出书店，来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向邹鲁风询问了北平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邹鲁风详细地向先生讲了两次示威的准备、街头上学生和军警的搏斗的情况以及当前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时，鲁迅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着纸烟。但是，在他那无言的沉默中，却饱含着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和比语言更为有力的安慰和鼓励。几天后，许广平受鲁迅先生的嘱咐来旅馆看望邹鲁风，并带来几十块钱，以备他拮据时之用。

由于“一二·九”运动后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新高涨，亟需加强党的领导；而这时的北方局与党中央已失去了联系。为此，十二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通过姚依林同志，派邹鲁风同志携带密信再次前往上海，请鲁迅先生设法转交给党中央，鲁迅先生当即欣然允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十九夜，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热情地赞扬了“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广大群众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同时指出了这次运动的必然性并寄以殷切的希望：“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①

正如鲁迅所预示的那样，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不屈斗争，抗日的火种，已日益燃成燎原之势了。

在席卷上海的规模巨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国际友人也积极地参加了活动。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热情地支持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她冲破国民党的禁令与封锁，常邀请青年学生到她居住的公寓，讲述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还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有马海德大夫、汉斯·希伯(Hans Shippe)^②、路易·艾黎，还有魏璐丝等人参加。他们收集和编印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展情况的报道。这些消息主要由陶行知和章乃器提供。这个小组还买了一台小型油印机，安放在魏璐丝(Ruth Weiss)家里，由他们自己印刷。编印好后，由史沫特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0页。

② 著名作家与记者，德国共产党党员，曾经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5年—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1932年再次来到中国，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9月，他从新四军来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沂蒙山区，11月英勇牺牲于大青山下五道沟的獐子沟附近。1944年移葬于临沂革命烈士陵园。

莱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或学生组织。后来这份油印材料由美国友人马克斯·葛兰涅区(Max Granich)和他的夫人格蕾丝(Grace)主编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抗日刊物《中国之声》(The Voice of China)所代替,继续报道有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

钟山之麓扑不灭的抗日怒火

南京,是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反动统治的中心。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雨花台英勇就义。雨花石里浸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从“九一八”以来,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在这里制定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是在这里批准的,遗臭万年的《邦交敦睦令》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也是从这里发出的,残酷镇压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密电还是从这里下达的……全国爱国的人民和青年,双目怒视着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

尽管国民党严密控制着南京,但是,广大爱国学生也奋然行动起来。钟山之麓,燃起了抗日怒火。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协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反对伪华北自治。

十七日晚,在国民党直接控制下的中央大学,各系学生代表六十多人,在一间会客室里开会。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狂热的运动已经在血的恐怖里复活了……我们伤了三十多位青年……我们是在敌人指挥下的军警面前用肉体去抵挡枪弹……援助我们……”一位学生代表情绪激动地宣读着一位“一·二九”战士从北平寄来的信,为了避免官方检查,这封信是用化学药品密写的。

“坚决援助北平同学！”学生代表们立即群起响应。

“有血气的诸位同学！”另一位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没有忘记敌人给我们兽性的杀戮、野蛮的劫掠。我们没有忘记北方危城里的同学。我们要组织，组织起来，用团体的力量来战斗！”

接着，大家纷纷表示：

“我们在压迫下面组织起来，我们去游行示威……。”

“就是在警察的枪弹下，只要有一个人没死，我们也要奋斗下去！”^①

在会议的进程中，代表们不顾反动校长罗家伦前来“劝阻”、“训话”；也不惧军事教官的恐吓和威胁。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并组织了纠察队，拟定了游行的口号。

当寒气侵蚀着石头城，东方只显出一线曙光时，中央大学的钟声响了，成千的爱国学生潮涌般地由宿舍奔向礼堂。他们把守礼堂，驱逐了军事教官；他们维持秩序，保护会场。

在礼堂里，当提出游行示威时，一千多只手一齐举了起来，齐声喊着：“附议！”“赞成！”

全体学生通过：“我们决定要求全南京大、中学生一同游行请愿，假若没有一个学校参加，我们就单独出动！”

“我们要求释放北平被捕的学生，我们要求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我们要求收复失地，制止‘自治’！……”

“我们要巩固自己的阵线，我们用纠察队来管理自己，用来监视外来破坏我们行动的痞棍！”^②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9、130页。

②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1、132页。

这是正义的要求，强烈的呼声。

大会随即派出二十多位代表，分赴各校进行联络。

十八日下午三时，在中央大学的操场上，汇集了女子政法讲习所、南京女一中、京华中学……，一队又一队地进来了。

游行请愿的队伍，排列整齐了。他们象迎战的军队，准备着敌人枪弹的射击、冰水的扫射，个个怀着高昂的斗志出发了。

队伍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进发，途中又有钟英中学、东方中学的学生队伍参加。队伍中的口号声、歌声连绵不断。抵达行政院时，参加人数已五千余人。

国民党行政院门前，戒备森严，长枪、刺刀林立。

徒手的爱国学生队伍怒吼了：

“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游行请愿队伍派出了学生代表前往陈述抗日救国的要求。时间过去了，未见代表出来；又推选第二批代表进去，但遭到军警的刺刀阻拦。

当代表出来时，说他们见到了秘书长，得到的答复却是一些空洞的名词：“调查”、“接受”、“等待”……这些空话立即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大家纷纷表示：“不睬这欺骗！”愤怒的群众高呼：我们游行示威去！在暮色苍茫中，数千人的队伍大踏步地前进，经国府路西街至太平路，再转白下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爱国学生发自内心的口号声，回响在南京的夜空。

这一次请愿示威游行，对于南京爱国学生是一次思想和意志的锻炼，他们不仅战胜了一昼夜的疲劳、饥渴；更重要的是“使

畏怯的变为勇猛，使衰弱的变成强健。除了前进，除了呼喊，去喊起中国大众的自卫战争，我们再没有第二个希望。”^①

十九日，南京学生两万多人，举行了第二次爱国示威游行。

这时，北平学联派了清华大学的刘毓珩(陈其五)、燕京大学的朱南华同志来到南京，与中央大学的后文瀚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得到了南京爱国学生的热情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申述了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并电慰北平各校学生，发表宣言，吁请各界一致声援。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先生，此时受杨虎城将军之托，担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兼新一军中总参议。他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忧国忧民、愤恨不已，便亲自到西安与杨虎城将军面谈后，前往南京呼吁抗日。续范亭先生在南京目睹蒋介石集团腠颜卖国、腐化堕落、无耻已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后，更变本加厉地反共反人民、镇压爱国群众。这些使他悲愤至极，痛不欲生，誓以一死震醒国人，激发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阴谋。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到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幸遇救。续范亭先生在忧国剖腹前所写五首绝命诗的第一首中写道：“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驱易自由。”在《哭陵》一诗中又写道：“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腠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表达了自己徒有爱国之心，却不能征战沙场、保国卫民的悲愤和痛楚。

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全国广泛的响应和声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5 页。

援，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全国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及抗日救国团体强烈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电文，如雪片似地飞往南京。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全国人民中极大地孤立起来了。

沃土中原撒下了抗日火种

正当国土沦丧、华北危急、全国人民争取抗日爱国自由的时候，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反动当局，却搞了一系列丑剧：什么“人民服役运动”、“卫生清洁运动”……企图转移人民群众的抗日视线，控制人民群众的抗日形势的发展。但是，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却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群众的心，激发起炽烈的抗日救国的热情。

武汉三镇的爱国学生行动起来，响应北平“一二·九”战友们的号召。十二月十二日，武汉中等以上四十余校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对华北时局表示了保卫祖国领土，反对伪自治的态度，致电北平学生“继续奋斗，誓与北平共存亡”，表示“武汉学生誓为后盾。”^①并电国民党政府务以不丧权、不失土地为外交原则。十七日，武汉中等以上五十三所学校组成救国联合会。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五十四个学校的学生，在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带领下，陆续集合在武昌湖北省政府的大门前，举行了示威集会。热烈的口号，震撼长空。

“反对华北自治！”

“讨伐叛逆殷汝耕！”

“反对媚敌外交！”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广大爱国学生终于喊出了多年来不敢喊出的口号，迸发出了多年来积压在胸中的抗日怒火。

早上十时，示威队伍向汉阳门出发，沿途口号声不断，标语贴在墙上，红绿传单在行人手中传递，广大市民也随着队伍行进。群情激奋，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反对亡国！

示威队伍到达汉阳门渡船口，准备渡江到汉口去示威。但是，反动当局早已“封江禁渡”了，不仅轮渡停航，连过江的小划子，也被水上公安局一齐赶走了。队伍直奔长街建设厅去请愿，要求恢复轮渡。建设厅派人答复时，却辱骂爱国学生“无理取闹”。群众被激怒了，把建设厅大礼堂的玻璃砸得粉碎。

群众立刻决议：我们今天不回去，他们不恢复轮渡交通，我们就不恢复长街的交通。长街是武昌最主要的交通要道。长街一堵，就会影响全城交通。从司门口公安局，到平阅路省政府，以及察院坡、青龙巷等处，都有爱国学生的队伍。严寒和饥渴，也动摇不了大家抗日救国的意志。夜幕降临，北风阵阵，大家仍坚持着，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江边露宿了一个通宵。附近商店的店员为学生爱国热情所感动，送来饼干和茶水慰劳。

第二天清晨，严霜未消，爱国学生们又在省政府门前集合，派代表进去要求恢复轮渡。代表又是久久未回。学生队伍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他们按捺不住心头怒火，齐声喊“冲！”但省政府门前的警卫立即关紧大门，剩下的四个空岗亭，被愤怒的学生砸得粉碎。直到下午三时，才由教育厅长出面答复：“一切要求都可以替诸位转送中央”、“轮渡明日恢复”。这样，示威群众才整队回校。

当天，湖北省教育学院百余学生，改乘民划赴汉口，参加了汉口四千人的示威游行。这支队伍走到法租界就被军警阻拦，

① 《武汉日报》1935年12月14日。

未能到达日租界。同时，汉阳也有一千多爱国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二十三日，武汉三镇爱国学生万余人在汉口召开了市民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各界的热情支援。

河南开封的爱国学生也积极地响应了北平“一二·九”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河南开封高中、河南大学、北仓女中、静宜女中、开封第一师范、两河中学、黎明中学、开封中学、明诚中学……等大中学校一万多学生，连日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提出严惩北平屠杀爱国学生的凶手，保护学生爱国运动等要求。

经过两天的酝酿，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前往省政府请愿。这次提出的要求是：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省政府同意学生派代表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爱国学生们聚集在省政府门前，派代表进去交涉。但是，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答复代表说：省府无此权限。这一下激怒了学生。“我们直接到南京去请愿！”“到火车站去！”“坐火车去南京！”省政府门前沸腾起来了。许多学校不约而同整队向南关火车站进发。这时，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大街，形成了游行示威的局面。

队伍到达火车站后，立即派人去找站长交涉，要求派车送学生去南京请愿。站长回答说要请示。这时，正值东去的火车尚未出站，许多学生蜂拥而上。另有一些学生则或坐、或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行。下午三时，又一列从洛阳开来的快车进站，一部分学生抢登上车。陇海路被阻，交通断绝。

车站里的候车室、月台上、路轨上挤满了爱国学生。男学生一堆，女学生一伙。原来互不相识的，现在已成了亲密的战友。省政府派人来和学生代表商谈，由于他们没有应允代表们提出的派

代表去南京请愿的要求，大家就坚持留在火车上、月台上，不肯离去。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气候也越发寒冷，大家却全不在意。夜间，有些女学生的妈妈来车站劝女儿回家，但女儿不愿做“逃兵”，坚持与战友们在一起，妈妈只好给女儿送来毛毯御寒。有的家长送来大衣、棉衣……。有的学校还在路轨上搭起帐篷过夜。为期四昼夜的开封爱国学生卧轨请愿的壮举开始了。

一万多请愿学生拥挤在车站里，但是秩序井然。各校组织的纠察队，承担了维持秩序的重任。车站上，有人讲演，有人唱歌，“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抗日救亡歌曲，此起彼伏，慷慨激昂的歌声进一步激起了爱国学生们的战斗豪情。

二十七、二十八日，省政府派人来“劝阻”学生。但学生代表反映广大爱国学生的要求：如不许学生去南京，则要求南京政府直接派代表来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否则绝不返校。

天寒露宿，虽然各校和家长每天送食物来，老师们更经常来看望，各界人士、甚至小学生也前来慰问，但毕竟吃不好、睡不好，有的学生开始生病了。二十八日晚，开始飘雪花了，寒气更加逼人。当晚和二十九日南京派来“中央大员”，一个是教育部秘书，另外两个自称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前来慰问。他们都表示可将各项条件负责带回南京。这种空洞的答复，当然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但学生代表们经过冷静周密的考虑，认为卧轨斗争持续四天，对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起到宣传、推动作用，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下次斗争，决定撤回学校。至此，断绝四天的陇海路交通才得以恢复。

四昼夜的卧轨斗争，点燃了爱国青年火热的心，唤醒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从课堂走向街头，从学校走进社会，从埋头读书走

上抗日救亡的征途，使大家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和提高。各校学生回去后，办起了油印的救亡刊物，与各地学校交流抗日救亡的情况和经验；办起了“救护训练班”，讲授战地救护包扎技术。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加强了爱国学生的团结，使他们在卧轨斗争的基础上，有了更明确的抗日救亡的目标。

十二月中旬到月底，如同上述各地一样，杭州、广州、西安、济南、青岛、南宁、长沙、安庆、厦门、梧州、南昌、成都、桂林、太原、扬州、徐州、保定、苏州、张家口、宁波、南通、重庆、芜湖、江宁、应城、焦作、信阳、宜昌、常州、香港……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从古城西安到岭南白云山下，祖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为响应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先后都举行了抗日救国的请愿示威游行。由北平点燃的抗日火炬，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发展为势不可挡的全国规模的伟大抗日革命运动了。

海内外的广泛声援

“一二·九”运动的迅猛发展，已越出了学生爱国运动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全民的抗日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了。广州六千多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工人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

十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致全国各业、各厂、各帮、各派的男女职工，号召他们在各地、各厂、各车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同时号召组织工人救国会、各

业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国各界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在《告工友书》中最后写道：“……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一致团结，只要目前汹涌开展的学生救国运动，能够得到我全国工人阶级的参加和领导，能够扩展到各农村和各城市中去，引导千万工人、农民、军警、学生、商人参加，使运动发展和扩大成为全民族抗日救国的伟大联合力量，这不但可以打倒一切卖国贼和汉奸，而且也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工友们！起来！恢复‘五卅’的英勇斗争，继续‘省港大罢工’的光荣传统，学习‘北伐’时的经验和教训，一致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①

上海总工会、上海文化界、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平妇女界救国会都先后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讨伐伪组织，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还越过海洋，传播到全世界。

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人，当获悉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消息时，他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欢庆。“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吴玉章同志等在巴黎主持的《救国时报》出版发行了。他们以兴奋之情，决心加紧工作，办好《救国时报》，希望它能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向国内发出了电文：“诸君奋起救国，闻讯感奋。望坚持到底，促进全国工农商学大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海外誓为后盾。”^②接着，《救国时报》刊载了大量的、由国内寄去的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通讯、文件、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2页。

② 巴黎《救国时报》第4期，1935年12月28日。

照片，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特别是获得欧洲各国革命人民和侨胞的同情和支持。随后又办起了《全民月刊》，宣传祖国的救亡运动。

远离祖国的侨胞在得悉“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太平洋彼岸的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要求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电文写道：“南京国民政府鉴：媚日卖国，九省沦亡，侨情激愤。请即开放政权，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① 东南亚各地的侨胞立刻组织了许多抗日救国会，有的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许多华侨青年受到“一二·九”运动的鼓舞，纷纷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学生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学生的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苏联、英国、美国、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各国青年学生组织或个人都纷纷打电报到中国来，积极支援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在牛津、剑桥、纽约、布斯堡、捷克斯洛伐克、布鲁塞尔、西班牙、埃及、印度、南美洲各国的每一个大学和中学里，学生们都热烈地一天一天地跟着你们反对日本侵略……跟着你们为中国独立而奋斗……我们以‘国际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十二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的努力，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这样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光荣。……”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怀着感激的心情，读着这封远方的来信。

四、南下扩大宣传团和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到农村去！”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妄想用大刀、水龙扑灭北平学生的抗日怒火，但“一二·九”运动播下的火种却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开始高涨的新形势面前，国民党反动政府使出了新的花招。这时，蒋介石突然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孔，召集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进京“聆训”。他表示“愿意听取学生意见”，诡称“政府愿与青年意志贯通，一德一心共同救国”^②，企图在青年学生中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决定提前放寒假，并限学生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一律离校，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学生运动丧失群众基础而陷于瘫痪。这时，一些学生家长耽心自己子弟的安全，纷纷写信催促他们从速回家，当时也确有一部分学生回家去了。但是，大部分学生仍留在学校里，日夜思虑着祖国的安危和学生运动的前途。因为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斗争已经从请愿发展到了示威。但

①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1）3545号。

②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高总登2字第17954号训令，见清华大学文书档案“教育部通令”第11宗。

示威以后又怎么办，怎样才能使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坚持并发展下去，成为当时广大爱国学生热烈争辩的中心问题。

他们中间有的人主张把学生运动的中心转向武装斗争，去袭击派出所，夺取枪枝，武装自己。有的提出打入地主武装“联庄会”，拿起武器，同日寇打游击。他们想依靠少数学生的力量去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作战。另外有少数人主张派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其中有些人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还有些人则想通过进京请愿，扩大抗日影响。更多的学生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

党和广大爱国群众的脉搏是跳动在一起的，心是相通的。学联领导核心成员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诡计，在复杂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唆使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反动教授杨立奎出面找北平学联的代表谈判。去不去谈判？学联领导核心经过讨论后，决定还是派出代表去同杨立奎见面。这样既可以摸清对方的底；又可以借此揭穿南京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诡计，促使学生群众提高政治觉悟。于是决定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三人作为学联代表前去谈判，并决定对对方提出的问题，由黄敬出面作答。杨立奎在西单东南拐角的黔阳饭馆请客吃饭。席间谈判时，杨立奎假惺惺地声称，南京当局是“关怀”北平学生运动的，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但甚望能听从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政府可以出经费援助，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云云。黄敬首先揭露了国民党所谓抗战的谎言，然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要求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同时还指出国民党政府光空口讲“支持”不行，学联要看行动；如果政府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战，我们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这次谈判无结果而散。

斗争很尖锐。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北平学联，宣布北平学联为非法组织，接着教育部宣布提前放寒假。同时南京政府还收买了一部分右翼学生，组织“南下聆训团”，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的“面谕”。

这时，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面临严重而又复杂的考验，处在抉择道路的关键时刻：运动向何处去？下一步怎么办？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北平学联党组织核心成员开会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同志。他们严肃认真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研究了如何引导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放寒假，很多学生就要回家了，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了学生群众的力量，而且易于孤立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使之随时有遭到逮捕的危险。如果听任学生到南京去“聆训”，会助长一部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阴谋，为了使大批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继续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学联党组织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黄敬同志说：过两天在燕京大学开一个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一下究竟是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南下农村去扩大宣传。他要求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同志设法保证在那个会上通过学联党团的意见。会议还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另留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再派代表奔赴津、沪、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两天后的夜晚，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女一中、汇文中学、镜湖中学等校代表八十多人，讨论今后行动计划。表决结果，出现了原来没有估计到的情况，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时有人提出刚才的表决方法不合理，应按

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付表决。执行主席郭明秋于是宣布暂时休会。这时黄敬、彭涛、孙敬文等同志在代表们中积极活动，引导大家接受学联党团的意见。北京大学代表刘江陵同志站起来发表演说，他从“五·四”运动的传统——民主与科学，讲到“九·一八”以来日寇侵略的痛史和“一二·九”运动的遭遇，历数国民党蒋介石只打内战不抗日的罪行，呼吁全国学生与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接着，按照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的規定，重新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通过了学联党团的决定。

十二月下旬，平津学联和各校学生抗日救国会，为发动南下扩大宣传，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联反对了学生中间的两种错误思想。首先，着重反对到南京去“聆训”的意见。他们并发动广大学生进行讨论，引导大家从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现实斗争中吸取教训，认识蒋介石卖国独裁的反动本性。学生们回忆起“九·一八”以后北平学生到南京去请愿的遭遇，其结果是被蒋介石抓一批、杀一批、收买一批。大家又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所受到的残酷镇压中，吸取了血的教训。于是，大家愤怒地喊道：“我们不到南京去，我们不再受骗了！”学联根据广大学生的意志发表了《为反对派代表进京聆训告民众书》^①，揭穿了蒋介石卑鄙的政治欺骗。蒋介石“聆训”的命令就这样破产了。与此同时，学联也反对了由学生单独搞武装的意见，指出：学生虽然是抗日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但它不是主力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是抗日的主力军，因此单靠学生的力量是薄弱的。这时，为了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能够巩固起来和坚持下去，并且加速向全国推进，扩大影响；为了把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并提高他们的觉悟，

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有效地进行斗争，党及时地指出：学生的斗争必须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结合起来。

“到农村去！”党的号召立即变成了革命青年的行动。

“北平南下，天津北上”，学生们积极行动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的总指挥是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北平师范大学的江明。宣传团的党团书记是彭涛，党团领导成员还有黄敬。另一部分学联党团领导成员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同志则留守北平。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分四个团。一、二团是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第一团指挥是北京大学的韩天石，第二团指挥是江明。第三团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指挥是燕京大学的黄华和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五百人左右。这时的华北，已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前哨阵地。因此，南下扩大宣传，实际就是深入华北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行学生和农民相结合。

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的行动计划是沿平汉路南下，先到固安会合，然后分头至保定集中。各团的具体行动路线是：第一、二团由北平出发，经南苑、黄村到固安；第三团由平西沿平汉路西南进，经芦沟桥、良乡、琉璃河，再东折固安；第四团由天津北上，经北仓、杨村、安次、永清，向固安集中。

① 北平《学联日报》，1936年1月18日。

一月初，正是北方最冷的日子。寒风怒吼，阴云密布，南下宣传各团先后出发。他们以战斗的姿态，巧妙地采用了散兵线的行军方式，避开了反动军警的阻拦，按计划路线前进。

三日傍晚时分，第一团、第二团为分散军警的注意力，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到阜成门外北平农学院集合。天黑时，这支队伍出发了。先遣队打头阵，大队分批走，总指挥部殿后，借着微弱的星光，直奔第一集合点——大井村。当大队进入大井村时，天已漆黑，老乡们热情地烧了开水，又让出热炕给学生们的取暖。夜间，大家轮流放哨和休息。次日，告别乡亲，队伍又分散出发了。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队伍绕过丰台、南苑，次日晌午过黄村，夜宿北宁线上的青云店。

一昼夜间，他们走了一百多里路，而且忍冻受饿，还要警惕地避开反动军警的阻拦，精神很紧张，因此身体十分疲劳。有的学生脚磨破了，仍然坚持前进不掉队。女学生更是头一次象这样“急行军”，到达青云店后，不少人的双腿肿得连炕也上不去了。当夜，由于百十来人一下子涌到青云店，住处一时难以解决，大家发挥了互助互让的精神，把炕让给女同学，男同学就背靠着背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打盹。在艰苦的生活里，战友之间的友爱，集体的关怀，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第二天，学生们在青云店作了第一次抗日宣传。七日上午又在礼贤镇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情况和华北危机。这次会开得很成功，学生们和农民群众的感情融汇在一起。一个青年农民跑上台说：“跟日本鬼子打仗，我傻小子就算双份儿！”同时南下宣传团在礼贤镇组织了儿童团，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给他们以抗日救国的启蒙教育。

第三团于一月四日拂晓，从西郊蓝靛厂出发。该团有三个大

队，共一百多人。各队还设立了宣传员、组织员、交通员、看护员、调查员、先遣员。先遣大队由各大队的先遣小队组成，任务是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清华大学的杨学诚、李昌、于光远等同志，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同志，都是先遣队队员。他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身，有的骑车，有的步行，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北方原野上。北国严冬，天寒地冻，但他们有说有笑，边走边做路标，引导大队前进。燕京大学的女先遣队员，也勇敢地和男先遣队员一齐行军，从不掉队。

三团队伍于下午五时到达芦沟桥，行程四十里。当晚住芦沟桥附近的简易师范学校，并向该校师生报告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听众情绪热烈。宣传团还帮助该校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第二天又在城内游行，向市民作宣传。十时许抵长辛店，经长营、过良乡后，再向琉璃河、马头镇进发。宣传团所到之处，都向当地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唱抗日歌曲，写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并帮助乡镇学校组织救国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撒下了抗日的种子。

一月八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四个团，先后达到了永定河南岸的固安城。

深刻的阶级教育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所经过的地方，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平、津、保定较近，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可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从来没有屈服过。有些年长的农民参加过“义和团”起义，有些中青年农民前些年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次参加过农民抢粮分

粮的斗争和著名的高蠡暴动和直南暴动。各校学生在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的过程中，也从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离开学校的第一天，生活就整个儿变了样。在学校里，一出校门，就可以坐电车和洋车；夜里有温暖的宿舍，有的学生还睡柔软的钢丝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汤菜俱全。而现在则吃着冻硬了的大饼和冰凉的咸菜。这便是他们在和工农群众结合的第一关遇到的生活上的严重考验。但是，这点生活上的艰苦哪比得上整个民族的痛苦，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甘愿裹风雪，冒严寒，到农村去，把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民运动。

夜越深，天气越冷。有的学生睡不着，对着窗外无边的黑夜，低声地哼着救亡歌曲。他们的思潮象海浪般地激荡着，想着战斗的明天：怎样去宣传呢？农民不识字，宣传会有效吗？

在南下宣传时，有的学校的学生就一致议决不穿皮鞋，一律穿蓝布大褂。但即使如此，他们刚在农村出现的时候，仍然引起了农民的惊讶。农民们望着这些足登胶鞋、头戴航空帽的“长袍先生”们和烫了头发的“小姐”们一路走一路唱歌，就说：“大冷天，吃教的还下乡来宣传，嘴里还唱着赞美诗哩！”他们讲演、唱歌、呼口号，老乡们也听不大懂。由于摸不清他们的来意，有的人见他们到来，就把大门关了，只从门缝里偷看他们。小孩子们则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你看他们吃大饼哩！”“他们穿着皮袍子哩！”

宣传团遇到了困难。有人感到苦恼：究竟能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呢？

党组织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感到学生们虽然怀有满腔抗日热情，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封建剥削，不懂得农民最关心的是：“王老太爷的租子收得太多了”。因此必须引导学生首先向农民学

习，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调查访问，认识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和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们白天进行调查访问，展开宣传活动；夜里在宣传团内讨论：农民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

当学生们走进农民的阴暗冰冷的小土房进行调查访问时，亲眼看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的情景。在这严寒的岁月里，一些学生穿着皮袍还冻得发抖，而有的农家小女孩却只围了一块单布片，一家五口只有一床破棉被，吃的是稀薄的糠菜粥。大家联想到自己下乡吃了几天大饼白菜汤，就感到苦得难以咽下，甚至要写通讯登报，表示自己很能吃苦了。有的学生看见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还拖着百十来斤的石碾进行着沉重的劳动，便不禁想起自己那个养尊处优的妈妈，活了四十多岁，连个纽扣也得女佣人钉。

一个农民告诉宣传团员，糠菜只能吃到阴历年底，过年便没吃的了；每年的收成“倒二八分粮”，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还能剩下几粒粮食呢？

一个佃户告诉学生，他以高利借来的二十块洋钱佃了三亩地，一场大水全淹掉了，没有收成，东家又来讨债，保长说，七天交不出，就不客气了！

有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孩子们哭着要东西吃。孩子的妈妈告诉学生，孩子他爹出去给地主打短工去了，要等他回来才有饭吃，什么时候回来，谁也不知道。

眼前农民的悲惨情景和农民们的血泪控诉，深深地震动着学生们的心。他们默默地走出一家家破旧的土房泥屋，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他们想道：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们穿的棉衣、皮袄是一阵风吹来的吗？不是，这些都是劳动人

民的血汗。我们在皇宫一样的大学里享受的一切，原来是建立在农民血汗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每天谈论着抗日，谈论着发动民众，如果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被压在封建剥削的大山之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怎么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呢？^①

通过调查访问和讨论，大家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才能取得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封建的革命必须结合起来。

学生懂得了农民的疾苦以后，宣传就变得有血有肉，进行得更活跃更有效了。学生们也从中进一步受到了教育。

三团在马头镇宣传的时候，宣传团员们充满感情地通俗地讲解农民兄弟饥饿贫困的根源，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而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者，就是蒋介石卖国政府。特别是，当他们讲到沦亡后的东北同胞如何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时，农民们忍不住流出了热泪，愤怒地喊出“干掉这些日本鬼子！”街头剧《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他们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去激愤地喊道：“大家要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日本鬼子来一个毙一个，来十个杀十个！”^②有的农民还问：“洋人能占北平吗？”“老蒋为什么不抗日？”流露出对国事的急切的关心。宣传团员们被群众的这种爱国热情深深激动了，眼里禁不住涌出了泪花。

农民开始把学生看成是自己人了。学生演讲时，有的农民给学生烧水送茶。有的老大娘把自己缸里仅有的一点咸菜，也拿出来给学生吃。农民们还热情地把他们让到家里，坐到热炕头上，问寒问暖，亲如家人；同时也向他们倾泻了一腔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的忿恨；有些人还向他们叙述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

不法官绅的斗争经历。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长了不少斗争知识。

这一切使学生们认识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深藏在工农群众中间。学生们认识到：过去以为农民愚昧、落后、觉悟低的想法是多么错误。有的学生又兴奋又惭愧地说：今天才认识了农民，才认识到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抗日的主力军，而自己是渺小的；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结合是不会有前途的。^③

入夜，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宣传团召开着生活检讨会。大家围坐在一起，辩论着、思索着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课题：知识分子要不要与工农结合？青年学生如何走向革命？

一位学生想起了自己的家庭。父亲是大资本家，叔父是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在他们的生活中，追求的是如何赚钱、如何享受，整天谈论着某人做了官，某人讨了姨太太。在他叔父的机关里，买一支铅笔也要层层揩油。爱国对他们只是装门面，在他们看来只有傻子才会为国家操心。这个学生愤怒地说：就是他们出卖了我们的祖国！就是他们把劳动人民投入了痛苦的深渊！我痛恨这个生我养我的阶级，它是腐朽的寄生的，它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我们的前途和希望。跟着工农走，尽管要抛掉优裕的生活，经受艰苦的考验，但我宁愿如此，这是一条唯一的光明大道。^④

① 参看《我为什么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参加革命》，《中国青年》1952年第11期；《归来后的感想》，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11期；《南下宣传归来后的追述》，《救亡日报》1936年1月20日。

② 《南下宣传日记》，《清华周刊》第45卷第10期。

③ 参看《扩大宣传后所得》，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11号；《更清楚的认识》，《大众生活》第1卷第12期；《扩大宣传归来》，燕京大学《十二九特刊》第11号。

④ 《我为什么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参加革命》，《中国青年》1952年第11期。

随着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逐步深入，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过去秘密阅读过的马克思、列宁的书籍是活生生的真理。有的共产党员向一部分学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英勇事迹。这些，很快地在团内传布开来。几天之内，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确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拯救国家于危亡之境。党的组织还及时引导大家正确地认识苏联，向大家宣传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剥削人，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大家还经常地哼唱着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时事打牙牌歌》，还有苏联《工人歌》。当唱起“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哎咳哟，关东起狼烟”的时候，他们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国命如丝的惨痛景象，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唱起“生活象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我们的心窝”的时候，他们又感到深沉的时代苦闷。人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要反抗，要革命，而首先就要打倒当前的民族大敌日本帝国主义。又每当唱起“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哎咳哎咳哟，人人都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前又展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灿烂前景，更坚定了他们参加斗争的决心。如果说，爱国学生们昨天在游行示威中，因为冲破多年的白色恐怖，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他们今天在华北的原野上毫无顾虑地高唱起《时事打牙牌歌》和苏联的《工人歌》，他们就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英勇战士而自豪了。

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大多数学生的思想觉悟迅

速地提高。也有人因为吃不了苦，中途跑回学校去了。但是，回到学校一看，校园里也是一片沸腾的救亡生活；有的到工厂去宣传，有的忙于支援南下的后勤工作。而且他们回到学校之后，都受到同学们热情的包围，请他们讲沿途见闻，讲如何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这些，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使他们感到应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终于又回到了南下宣传团。

当青年知识分子紧紧跟着党坚决走抗日救亡道路的时候，遭到了少数学生的反对。南下以后的第四天，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学生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唱共产党和苏联，要求宣传团放弃最受老乡欢迎的两个节目——街头剧《打回老家去》和《时事打牙牌歌》。这个提议被大多数学生所否决。第三团的负责人黄华同志为了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在大会后又单独召集燕大学生开会，在会上反复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作了必要的批评，但有的学生仍不接受，竟然在第二天清晨离队返校。他们回校以后，仍然受到留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并请他们介绍南下宣传的情况，这促进了他们思想的转变，他们又参加到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了。

战斗在平汉路沿线

从南下宣传团出发的时候起，就不断有便衣侦探跟踪着。在讲演会上，人群里常有人怪叫；演戏时，有人到后台去捣乱。这些，都受到群众的怒斥。随着宣传影响的不断扩大，反动派愈加恐慌，破坏活动也愈加频繁。一月八日前后，南下宣传团的四路大军兴冲冲地在固安城汇合时，伪县长却把城门关闭了，诬蔑学生是“土匪”，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大家义愤填膺，愤怒地质问伪县长：“你是不是中国

人？”

这时宣传团党组织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要对反动县长和守城的士兵区别对待。对前者要狠狠地揭露打击，对后者则应耐心的教育争取。于是宣传团组织了一批得力的宣传骨干，对荷枪实弹的守城士兵展开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攻势。东北学生以家乡父老同胞受到的亡国之痛，挥泪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暴罪行。话犹未了，城上的士兵和城下围观的农民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县城既进不去，宣传团只好在城外召开群众大会，并且演出话剧《打回老家去》。演毕，大家齐唱：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民族败类终究只是一小撮。一座城墙怎能挡得住抗日救亡的强大呼声！当南下宣传团到来的消息传遍全城时，城里展开了募捐运动，许多居民和学生把钱、粮、棉被用绳子传送给城墙，表示对他们的支援。固安县师范学校王雨珊校长冒着丢掉职业的危险，深夜越过墙来慰问宣传团员们，表达了民众的抗日决心。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给了学生们极大的鼓舞。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正当大家冻得双脚麻木时，东北四省流亡同胞组成的慰劳队到了固安，送来了三百双毛袜。学生们从这些饱受苦难的同胞手中接过这些毛袜时，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热泪夺眶而出。他们

激动地向东北同胞表示：我们一定勇往直前！我们要穿着这些毛袜，走遍全中国，唤醒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北平学联派出孙敬文等同志携款来到南下扩大宣传团驻地进行慰问。各校也派代表送来慰问信和食品。

在人民的有力支援下，学生们虽然一连数日被关在城外，饱受冻饿之苦，但大家宣传抗日救亡的情绪，却历久不衰。有的学生还乐融融地编了小曲唱道：“一路风霜到固安，城门关了整三天，……”北京大学的肖敏颂同志还给大家朗诵了英国诗人雪莱的意味深长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了。

在固安召开了全体宣传团员大会。在会上，总指挥董毓华同志作了工作报告，并提出了“当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策略问题，要大家展开讨论。这次讨论是党有意识地向宣传团员们进行抗日总方针的教育。在讨论会上，有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向大家阐明了当前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瓜分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应该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至于对待英美帝国主义，则要尽量利用和扩大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讨论毕，董毓华同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作出了正确的结论。通过讨论，许多宣传团员都进一步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大会也预料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宣传团必然有更大的迫害，要求大家严加戒备。接着宣传团又组织大家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生们通过学习和讨论，初步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些什么人，不应该包括些什么

人，以及怎样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等问题。党员们还秘密传阅了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顿觉眼界大开，长了许多知识，激动地说道：“几席座谈会，胜读十年书。”大家在思想和政治上变得成熟一些了。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整顿了组织。由于第四团人少，便将第四团与第一团的第三、四小队合并。原第一团的第一、二、五、六、七小队作为第二团。第三团不变。这样，就将原来的四个团改组为三个团。各团都分设宣传、先遣、生活管理等组织。同时，总指挥部又重新划分了各团的行动路线。第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去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与第一二团在保定会合。于是各团便又继续前进了。

一月十四日，第二团到达新城县的辛立庄镇。辛立庄完全小学老校长齐望溪在会见了先遣队员之后，立即为大队的到来着手安排。他马上停了课，叫学生们把教室腾出来，铺上干草和席子，烧好开水；并动员学生从家里匀出一些被子。当宣传团员们抵达之后，都为老校长的爱国热忱和盛情接待所感动。

十五日，正值辛立庄大集，宣传团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抗日宣传。但是，不出大家所料，反动当局是不会不来干涉的。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来一个“王委员”，要约同学去谈话。宣传团由师大的阎世臣和于刚同志出面打交道。这个委员扬言南下宣传有“背景”，劝大家赶快回学校。他们据理驳斥他的谬论，说明南下宣传是大家的爱国行动。他又提出要和同学们直接见面。显然，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指挥部立即作了应付的准备。第二天早晨，这个委员带着武装便衣，新城县陈县长带着保安队，分乘着几辆大卡车来到了辛立庄。这位王委员下车伊始，就说要给宣传团员们训话。他清了清嗓子，大言不惭地

说：“打日本一事，国家自有主张，大家要听宋哲元委员长的命令。风大天寒，宋委员长很关心大家的身体，这次要我带几包点心来慰问大家。”

一边是杀气腾腾的武装便衣和森然围立的保安队，一边是大包小裹油渍浸纸的各式点心。对这种威胁利诱，大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王委员话犹未了，一位师大的女学生就迎面斥责他说：“不要脸的东西，宋哲元给了你多少钱！我们冒着寒风大雪来宣传，为的是不当亡国奴，你今天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无非是搞破坏，无耻！无耻！”宣传团的曹国智即席发表演说，说明南下宣传抗日的道理，呼吁凡是中国人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讲得声泪俱下，激动人心。全体学生立即奋起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要宋哲元抗日，不要他的点心！”“打倒走狗！”怒吼声此起彼伏，吓得王委员面色如土，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宣传团员们这边正气凛然，保安队那边威风扫尽。全场空气异常严肃，四周围观的群众都点头称赞。

这时，站在一旁的伪县长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出来替王委员解围。他说：“诸位冷静一点，王委员讲得有道理。我家乡在冀东，现在沦陷了，亡国奴的滋味我是知道的。可是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年轻，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去吧。”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就群起质问：“你既然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为什么还甘心当亡国奴？”有的学生还嘲笑他说：“是不是怕丢掉了你那顶乌纱帽？”这位县长又窘又羞，欲辩无言。正僵持中，一个跟班的出来打圆场说：“好啦，快十二点了，该去吃饭了。”王委员和伪县长急忙转身灰溜溜地走掉了。

可是武装便衣和保安队并没有走，他们密密层层地把学生住所包围了起来。宣传团员们却很镇静，刚才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大

家的情绪。指挥部紧急研究对策，决定深夜突围，继续南下宣传，奔向新的集合地点——孔家码头。同时，决定派一人去一团，联系救援；并派董毓华和宋黎两同志连夜赶回北平，向学联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他们深夜出发，踏着积雪，仰望星空，寻找北斗，辨明方向，奔回北平。第二天早上，二团为了避免敌人的追击，便把队伍化整为零，并放出空气：“回家过年去啊！”于是便同从数十里外赶来支援的第一团部分团员一起，匆匆吃罢早饭便分散出发了。当晚到达雄县谷岗镇，再沿平汉路南下，向郑州、任邱前进。

二团到了任邱，又碰上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在街心架起机枪。学生们却毫无所惧，迎着枪口，昂首入城。进城之后，得悉城内还驻有三十二军的一个团。这个团当年曾经在冷口抵抗过日寇，士兵有抗日要求。当时因“何梅协定”之后，被迫交防给二十九军，即将撤至高邑以南。宣传团指挥部立即抓住时机，对该团开展统战工作，当即派出代表与该团团长相见，表示仰慕他们的抗日功绩，希望他能支持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团长为学生的至诚所感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并带了许多馒头和半头肥猪，亲赴宣传团，慰劳爱国学生。第二天，宣传团同三十二军的这个团并队向高阳进发。一路上，一个学生伴随一个士兵，畅谈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大家情绪高涨，歌声不断。

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宣传团第三团离开固安，十一时到达官村，该地小学校在墙上贴了许多欢迎的标语。午饭后，燕京大学“十二九剧团”在小学校外的戏台上演了救亡剧。午后经涿县，十三日抵达高碑店。在这里，三团遇阻了。高碑店的警察局长已预先作了布置，决心用武力处置宣传团。该地小学校长也表示爱莫能助，不再欢迎宣传团。于是三团只好暂且栖居小学校的空屋内，

各小队分别去附近小村进行宣传。

下午四点钟,大多数外出宣传的学生还没有回来,突然由公安局长带领的便衣队和警察二十多人,一下子拥进了三团的住所。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恶狠狠地逼迫学生出来。

“不出来!”大家愤怒地回答。

“谁是负责人?”警察便衣们问道。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

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学生被捕了。大家奋不顾身,一拥而上,把他夺了回来。大家胳膊挽着胳膊地紧靠在一起,并且齐声唱着《开路先锋歌》。

当外出宣传的学生回来以后,他们就移住到一个小店里。但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围起来,其中有两个彪形大汉和几个恶狠狠的打手强令宣传团员们分散居住,遭到学生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强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学生们也拾起砖头石头,操起桌腿凳脚,雨点般地向他们投掷过去。他们竟然将学生的住所放起火来,幸未成灾。然后他们又一齐拥上来用水浇学生。虽然学生们的棉衣被淋湿了,而且顿时结上了一层冰,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却,而是用胸膛顶住门,一个便衣警察也没能进得去。①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战斗中诞生

南下几天的战斗生活,使学生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只有组织起来共同斗争才能战无不胜。第三团在高碑店的斗争,更

① 参看《平津学生团抗战到底》,《读书生活》第3卷第7期;《北平学运的扩大》,《大众生活》第1卷第12期;《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宣传经过》,燕京大学《二十九特刊》第10号。

加巩固了这一认识。

一月十三日，第三团在高碑店遭到便衣警察的武力解散时，宣传团员们为了保持这个战斗的集体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手携着手地齐声说：“为了斗争，为了救亡，我们的集体决不能分散！”坚决要求全团一起返回北平。

宣传团员们在小店里举行了最后的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热烈地讨论了“抗日救亡工作是不是就此结束”的问题。为了不让门外的警察偷听，大家都用英语发言。与会者无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等同志在会上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建议，立刻得到全团一致的热烈的拥护。他们同便衣警察们进行了一番斗争之后，终因众寡悬殊，最后被强行押送回北平。但是这支队伍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回北平后，立即建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

第一团和第二团沿途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月二十一日到达了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跨进保定城，他们就在省政府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抗敌！”“打倒汉奸卖国贼！”然后就在街头巷尾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并与当地的青年学生举行了联欢会，随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后来，省政府当局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宣传团的活动难以继续开展。这时，大家都已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坚决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要永远团结在一起！”要求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把运动坚持下去。在第一、二团合并后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党组织通过进步学生提出了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议。这一建议一经提出，便立即获得了全体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拥护。①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二、三团在北平汇合后，党组织便着手研究如何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共青团组织，一则圈子太狭小，二则太红，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于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与黄敬、姚依林同志便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商量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会后，党采取了具体的步骤，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于二月一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并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正式成立。当时正式队员有三百人左右，分为二十六个分队。^②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引下建立的。由于原有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比较狭小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所以决定改变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青团组织。各地按照具体环境，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条件，创立以抗日民主为共同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以便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爱国青年群众，坚持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就是这样一个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其“工作纲要”中指出，每个队员对救亡工作的基本认识是：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讨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军事技术与理

① 《一二九教育了我》，《中国青年》1950年53、54合期。

② 《我们的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1937年3月编印，第7—9页。

论，并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斗争纲领”的要点是：（一）动员全国武装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三）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四）铲除汉奸卖国贼；（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产业充作抗日军费；（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七）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共谋解放。“规约”中规定：服从队员公意；服从各级队部的一切指示、决议，并严格执行；忠实于组织，不作破坏或诽谤组织的任何言论与行为；对上级的意见或批判须依组织系统提出；队员如违反规约时各级队部得斟酌情形，予以批评或警告，遇必要时总队部得撤销其队籍；按期缴纳队费。

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团结着广大先进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在战斗中，组织得更加严密，斗争得更加坚决英勇，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由民先队训练出来的许多平津学生，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后，全国各地学生也都先后发动了深入农村的扩大宣传活动。上海各大中学学生的扩大宣传团九十多人于一月二十日出发。他们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进行曲前进，每经过一个村落，便有一部分学生留下来进行宣传。有的在街头演讲，有的跑进茶馆借闲谈向茶客进行宣传，有的分发图画宣传品，有的领着一群儿童教给他们唱打倒日本的抗敌歌，有的还演爱国戏。一路之上，漫天飞雪，他们经过了许多荒村小镇，吃喝不上，住店没有，是常有的事，还要和军警的干涉进行斗争。但是，他们有一颗火热的抗日的心，把一切艰苦甚

至坐牢的危险，都完全置之度外。他们的演讲、演戏、唱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直至他们到达苏州后，才被反动军警和宪兵强迫送回上海。这天刚好是“一·二八”纪念日，大家便决议去闸北游行示威，以扩大抗日宣传。他们一下汽车便立刻整好队伍，高呼着纪念光荣的“一·二八”，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开始了游行示威。武汉各大中学学生在二月初也有大规模的深入农村的扩大宣传活动。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也都先后开展了同样的活动。在扩大宣传活动中，各地学生群众刻苦耐劳的生活和热情洋溢的宣传，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宣传队经过的一些村镇，都很快地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

知识青年深入农村扩大宣传、与工农结合，是“一二·九”运动在党领导下的深入发展，其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历史过程。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形势下，毅然放弃了舒适的书斋生活，踏上了漫天风雪、天寒地冻的征途。他们接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树立了改造自己成为革命者的良好愿望。在农村宣传过程中，他们亲眼看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痛苦，开始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和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认识了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群众，其中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他们还从农民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认识到了少数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痛苦的基础上，感到做剥削者的可耻。这些，都帮助他们决心和工农结合，使他们的思想开始了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的转变。民先队的成立，就是这种转变的集中表现。从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便作为革命集体中的一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为完成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中，把自己进一步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

五、英勇的反逮捕斗争和 “三·三一”游行

英勇的反逮捕斗争

从“一二·九”爱国学生举行总罢课到南下扩大宣传归来，已将近两个月了。在这暴风雨般的日子，学生们以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更教育和锻炼了自己。许多学生在这两个月里，获得了许多极宝贵的斗争经验和知识，迅速地成长起来。

南下扩大宣传回来后，一月底正式成立了学联党团。学联党团书记是姚依林，成员有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等同志。学联考虑到，抗日救亡的斗争是持久而艰苦的，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善于积蓄力量，不断充实自己，等待有利时机，开展规模更大的斗争。同时也考虑到，罢课时间过长，也不利于团结广大中间学生，不利于扩大和巩固革命阵线。因此，学联决定复课，并发表了《复课宣言》。《宣言》中指出：“我们罢课是为了扩大我们的阵线，我们复课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力量”，“复课决不是单纯的恢复以前的课程，在这种国难日深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完全同国难状况配合起来”^①。这个《宣言》反映了广大学生的意愿。

在这期间，北平各大学校长曾数次聚会，大肆宣传“读书救国”的论调，并号召学生回到教室去，企图引诱学生离开抗日救亡运动，回到读死书、死读书的老路上去。

北平学联及时地揭穿了他们的诡计，指出：我们的主张是救国不忘读书，我们的复课是有条件的复课，即争取实施非常时期教育。通过斗争，大部分学生都认识到决不能走回头路，只读书不问救亡。在这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刻，必须一边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边读书。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北平学联拟定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指出：“非常时期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并加强我们对于当前民族危机的认识，和积极地养成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必需的技能，以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②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意见。例如，学习自然科学的，应侧重国防科学和军事应用化学方面的研究；学习社会科学的，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在体育方面，要开展群众性的战术训练等等；在课外活动方面，应积极地加强自我教育工作，成立时事问题讨论会及其他学术研究会。

学联的《复课宣言》和《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学生们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一方面展开了争取实施非常时期教育的斗争；一方面积极地展开了各种课外活动，组织歌咏队、文学研究会，举办各种座谈会、讲演会，进行时事讨论、军事训练等活动。

随着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和广泛的开展，反动派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破坏。他们改变了策略，在武装镇压的同时，采取了更恶毒的办法——在学生内部搞阴谋分裂活动。

① 北平《学联日报》，1936年2月8日。

② 《北大旬刊》第2、3、4期合刊，第61页。

早在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乘大批进步学生不在学校，曾声称要拼凑一个平津保学联，来与北平学联对抗，企图公开分裂平津的学生运动，并发表了所谓《宣言》。在北平学联领导下，进步学生与他们展开了斗争，揭穿了他们原是一群领取国民党反动当局津贴的特务学生。所谓平津保学联还没有组织起来便已声名狼藉，为广大学生所唾弃。

反动派的另一阴谋便是蒋介石命令各校派代表“晋京聆训”。由于广大学生的坚决反对，晋京代表几乎都是学校当局暗中指定的，他们在学校当局的保护下偷偷地跑到南京。广大学生根本不承认这些“代表”的合法性，都称他们是伪代表。

一月底，这批伪代表到南京“聆训”之后，又偷偷地回到学校。《学联日报》马上发表了《谨防烟幕弹》一文，指出：各校当局代表和被指定的伪学生代表归来后，必然要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要学生们严加警惕。

各大学校长回来后马上发表宣言，表示“绝对拥护中央政府”，“制裁罢课和一切破坏纪律之举动”^①。反动的学生代表回校后，气势汹汹，为虎作伥，鼓吹要绝对信任政府，并要求政府严惩闹事学生。更有一些中学成批成批地开除爱国学生。这时，反动学生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他们甚至公开纠合反动组织，出版反动刊物，如《学生时报》、《清华评论》等。

广大学生对“代表”的“晋京聆训”已是非常愤恨，又看到他们回来后如此蛮横，有如火上加油，便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清华大学学生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则将他们驱逐出校。在反动学校当局的指使下，反动学生恶狠狠地殴打进步学生。进步学生出于义愤和自卫，对他们进行了回击。有些中学学生还殴打了反动的中学校长。学联分

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反动学生和伪代表的凶恶行径，确实是可恶的，决不能任其猖狂下去；但斗争要说理，要有节制，才能把广大中间群众团结在自己方面，进而获得胜利。这样互相殴打，不仅不能粉碎反动派破坏学运的阴谋，反而会丧失中间群众的同情，使自己陷于孤立。于是，学联立即纠正了这种作法，并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和他们开展说理斗争，在群众中揭露他们，孤立他们。

这时，师大反动教授杨立奎利用了这种情况，以“各校学生纠集闹事”为借口，诬蔑北平学联受共产党“操纵”，要求解散学联，制裁学生运动。杨立奎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言人，他的叫嚣便是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进行武力镇压的信号。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亡言论。接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宣布军事戒严，以武力钳制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于二月十九日密电天津、北平两市长肖振瀛、秦德纯，下令取缔平、津两地学联。密电称：“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明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②紧接着，又在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公开逮捕进步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北平学联于二月下旬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解散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它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领导着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逮捕，党立即指示各校，提高警惕，采取紧急措施，在学生中组织纠察队、情报队，展开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

二月一日，天津北洋工学院半夜被反动军警包围，学生穿着

① 《学生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全民月刊》第一卷第1.2期合刊。

② 《行政院政务处密函稿（2月19日）》，戕函第1278号。

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和军警进行了搏斗。结果被捕去七人，受伤者多人。二月二十四日，一千名反动军警包围和闯进了中国大学，捕去学生五十余人。不久，师范大学、东北大学都先后遭到反动军警搜捕，被捕数十人。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时，北平宪兵第五队队长盛宣中带领二十中队宪兵，会同公安局侦缉队、内六区署巡官长、警察等五十余人，闯入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学生宿舍，大肆搜查，抄走进步书刊、文件、相片等近二百件，逮捕了地质系、物理系学生三人，拘于宪兵第五队队部。在白色恐怖的二月，仅北平市被捕者就达二百余人。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逮捕、监禁和屠杀，并没有吓倒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他们反而愈斗愈坚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在学联和民先队的周围，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反逮捕斗争。

二月二十九日拂晓，四百四十名反动军警闯进了清华园，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实行严密封锁，甚至学生到食堂吃早饭也不许出去。一批一批的武装军警手持“黑名单”，冲进学生宿舍，进行搜捕。由于头一天就接到学联打来的电话，说明天将有“客人”来清华大学，要“好好招待”。因此清华园内的一批进步学生，包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学联和学生救国会的干部，早已有了准备，都隐蔽到其他同学的宿舍里去了。反动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

国民党反动当局用重兵包围学校和逮捕学生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连一些平时不过问政治的学生和教师也被触怒了。他们说：“堂堂最高学府，怎能容忍如此无理！”

为了团结广大学生和教师，粉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大搜捕，清华学生救国会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马上得到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拥护和支持。终于由民先队员带头和

同学们冲出宿舍，用石头、木棍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把反动军警打得狼狈不堪，败阵而去。出卖同学、给国民党反动当局送“黑名单”的特务分子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

这时，传来二院学生宿舍有同学被捕的消息。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立即汇成一股洪流，跑步赶到西校门口，发现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学生方左英和一位工友正被绳子捆着，准备用警车带走。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个同学一声高呼：“同学们！冲上去！夺回我们的人！”大家蜂拥而上，经过搏斗，奋力夺回了蒋南翔和方左英。刚从城内回校参加化学考试的姚依林同志被扣在校门，这时也乘机脱险。在与反动军警的搏斗中，学生们夺过军警带来的干粮作武器，向反动军警扔过去。机械系的一批学生，把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二十几辆汽车的重要零件，拆掉的拆掉，捣毁的捣毁。反动军警准备乘车逃跑时，汽车已经失灵，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

四百多名反动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而学生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却抓到了海淀伪警察所所长，把他扣留起来。反动军警不得不把捕去的工友放出，以换回他们的警察所长。

反动军警逃走後，蒋南翔同志考虑到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来报复，而且将更加疯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通知学生们暂时躲避起来，特别是上了“黑名单”的学生更要隐蔽起来，并立即组织同学进行隐蔽。蒋南翔同志还通知姚依林、黄诚同志去冯友兰教授家避一避。有的隐蔽在张申府、朱自清等教授家中。清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将大多数同学集中隐蔽在体育馆后馆里。

果然，这批反动军警回去后，便马上报告“清华园内有五百多名共产党暴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当天下午就派了两团军警，

五千多人，包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机枪连，以及保安队和警察，在反动透顶的北平市公安局督察长的亲自指挥下，再一次层层包围了清华园，并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但是清华园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大部分学生都不见了。

五千多反动军警从二月二十九日晚七时到三月一日晨五时，在清华园内整整搜了一夜。一直到天亮后，才发现学校体育馆屋顶上有人，便朝房顶乱开了几枪，用来威吓学生，逼迫他们下来。在反动军警进入体育馆后，才发现许多学生都藏在里面，便按“黑名单”捉人。但是，“黑名单”上有名字的，早已分散避开了，有的已到校外去了，有的躲在教授家里，有的隐蔽在工友房里，在体育馆内的也早已改名换姓了。反动军警威吓追问了许久，仍毫无结果。体育馆内学生那么多，抓谁呢？他们看到不顺眼的，刚要抓，一下子又混入人群中去了。于是他们就一个个检查，一个个往外赶，并且用枪托子毒打一些学生，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在抢救蒋南翔斗争中最勇敢的民先队员冯宝麟。

反动军警为了回去交差，便胡乱抓了二十几个学生，五花大绑捆着扔上警车。其中有个国民党学生极其颓丧地问警察道：“我是提名单的人，为什么反而抓我？”反动军警表面上看来气势汹汹，但是失道寡助，两眼漆黑，主要的干部和党员一个也没有抓到。

“二·二九”深夜，黄诚同志以坚毅的斗争决心和乐观的革命精神，挥笔作诗。他写道：“茫茫长夜欲何之？银河低垂曙尚迟。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迟疑。安危非复今所计，血泪拚将此地糜。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诗言志。这首诗不仅抒发了黄诚同志自己的革命情怀，而且也反映了广大爱国青年为献身革命，甘洒血泪，虽艰辛备尝，仍对光明前途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二九”后，三月一日、十二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救国会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抗议国民党非法取缔学联和逮捕爱国学生。

英勇的“二·二九”和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的反逮捕斗争，显示了中国青年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面前英勇、坚决的斗争精神。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进行肉搏，从反动军警手里夺回被捕的同志，把反动军警驱出学校，这是何等英勇的壮举！这次斗争的胜利，冲破了一个月来的白色恐怖，大大地鼓舞了各校学生反逮捕斗争的信心，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三·三一”游行——一次失策的行动

经过反逮捕的严重斗争后，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使学生运动中的领导干部转移了阵地。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同志先后调至天津、沧州工作。蒋南翔同志暂时离校去上海。这时，国民党御用教授又大肆鼓吹起“读书救国”，加上安逸的学院生活，对某些学校的一部分学生，甚至个别民先队员和民先队负责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们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的影响，自由散漫，恋爱第一，放弃工作。民先队组织也松懈起来了。为此，北平各校民先队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力量又很快充实、发展起来。但是，急躁的情绪却在暗中滋长，使民先队在进一步的斗争中，遭受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

白色恐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百多名爱国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三月九日，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郭清惨死狱中。

郭清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爱国的中学生，反动派企图威逼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承认自己是学生运动领袖，数次进行严刑拷打，但是反动派却没有从他嘴里问出半个字。他在临死时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救中国！”

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爱国学生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要求学联立即采取行动。北平学联反映了部分进步学生的激进情绪，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大会和抬棺游行，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要求爱国自由。由于当时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事前又有人提出了“准备流血”等错误口号，三月三十一日这天，参加追悼大会的只有一千三百多人，大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一般学生参加的很少。国民党反动派在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报告后，派出了大批反动军警和特务打手，重重包围了北大三院。到会的学生，热血沸腾，万分气愤，一致要求举行抬棺游行。北大三院的大门已为反动军警封锁，他们就从后墙挖开了一个缺口，杨学诚等同志将空棺材运到墙外，抬起来就走。清华和燕京学生打前锋，北大学生压后尾，沿北池子、南池子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保安队骑摩托车追上，拦住去路。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横冲乱打，队伍被打散，有五十四人被捕。

被捕学生深夜被抛入铁壳警车，驰往荒郊。车停后，才知已被送入陆军监狱。他们一进狱门就被套上了沉重的镣铐。这种野蛮行径激怒了被捕的全体学生。他们便以绝食进行抗议，反动派不得不免去了女学生的脚镣。这件事使大家懂得了：在狱中仍然要坚持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胜利。

监狱里房间很小，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晚上睡觉总要有两个

人睡在别人脚上，才能勉强挤下。在他们的东边，住着一批“老政治犯”，从“老政治犯”那里，被捕学生懂得了不少斗争知识，受到很大教育。许多学生都下定决心，要象他们那样顽强地生活和斗争下去。

他们在狱中每天吃的是带砂子的窝窝头和混浊的菜汤，再加上镣铐的折磨，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使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他们经常高声唱救亡歌曲和《国际歌》。歌声飞出了牢房，鼓舞着难友们勇敢地坚持斗争。

在狱里的斗争中，他们利用“土电报”传递消息；还利用手纸办了刊物，交流思想，彼此鼓舞斗志。这个刊物对大家狱中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直到出狱时，还有人把它带出，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在狱中，大家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被捕者中间有学联领导人，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威逼利诱，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他们互相关怀，互相鼓励，有人出狱了，就将自己的东西留给狱中的难友。

在他们被捕后，学联就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一直奔波了两个星期，才知道他们被关在陆军监狱。随后，便立即派人前往看望，送去衣服和食品，并把外面的情况用拉丁化新文字写在衣服的商标上，传给狱中的学生。这些简短有力的字句，极大地鼓舞了狱中学生的斗争。

经过学联多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陆续出狱。暗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并没有使他们消沉，反而把他们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出狱后，他们紧握着同学们的手，流着热泪，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为抗日救国而奋斗了！”

“三·三一”抬棺游行虽然是英勇的，但却是一次失策的行

动。这次斗争，没有清醒地估计形势：二月的白色恐怖刚刚过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击为时不久，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还没有恢复过来；而且“读书救国”的论调又使一些人埋头读书而忽略了抗日救亡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发动斗争的时机还很不成熟，因此，需要加强日常的群众工作，以便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有利时机；同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没有可能提出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政治口号。这是一次缺乏斗争经验，脱离广大群众而采取的冒险行动，因而遭到了敌人的镇压。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暴露了自己的骨干力量，使学生运动遭受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也使一般群众感到左派可敬而不可近，致使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脱离了广大群众。

六、爱国学生运动的巩固和壮大

加强领导 端正思想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三·三一”遭受严重打击之后，进入了异常艰苦的境地。民先队的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许多爱国学生被投入监狱和被学校开除学籍，还有不少学生受了伤。在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在白色恐怖中，一部分中间学生产生了害怕情绪，甚至少数曾经勇敢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以来各种斗争的积极分子，包括个别党员和民先队员，也动摇彷徨起来。一些反动政客和资产阶级右翼教授也乘机散布“读书救国”等花言巧语，欺骗广大学生。他们诬蔑学生运动是“空喊口号，贴贴标语，不特于救国无补，徒然扰乱抗日后方”，叫嚷在高等学府中“政治空气”与“学术空气”不能并存，主张学生只应阅读古今中外的“大本书”，不要读宣传革命道理的“小册子”，劝学生只须“表示一下”抗日，但不要“下水”（即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总之，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来腐蚀青年学生，诱使学生们离开革命的道路。这些谬论影响了一部分学生，他们开始由抗日救亡战线上退下来，转而不问政治，埋头于课堂和实验室了。

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面临着困难的斗争形势，运动暂时

处于低潮。但党清醒地看到：经过“一二·九”运动及南下扩大宣传的锻炼和考验，广大爱国学生在思想政治觉悟上大大提高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白色恐怖下仍然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因此，党及时地抓紧健全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在民先队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组织上将“一二·九”以来的成果加以巩固。但是，在斗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对运动的政治思想领导？又如何引导运动进一步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呢？这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以后，对于华北形势、河北省的工作以及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一一作了具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为了教育干部和党员，为了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得以切实地深入发展，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执行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虽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但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同志用KV署名于四月十日在北方局的党内秘密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著名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系统地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及其给

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正确地阐明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与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作风。刘少奇同志分析了形势之后，正确地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他在文章中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对于群众斗争的问题上，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爆发，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应该“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刘少奇同志指出，应当“教育我们同志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的让我们的党、同志和干部跑到广大的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①同时，他对“三·三一”采取抬棺游行形式，进行了批评教育，提出要吸取教训，总结经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68、69、71、73页。

验，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后来刘少奇同志又用仲篬、陶尚行、莫文华等笔名在《火线》以及《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所谓具体领导》、《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上、中、下篇）、《怎样做群众工作》、《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论左派》等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了要善于把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要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共同完成党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内教育，引导党员和干部从实际斗争中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他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登了一则《KV启事》，提倡在这个党内刊物上，讨论有关目前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他对白区工作中的方针、斗争策略、工作方式方法的指示和他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都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了传达、阅读和讨论。大家普遍表示拥护，深感端正了思想，增添了力量，工作有了方向。刘少奇同志到来后，极大地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了北方的党组织，充分发动了群众，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开了新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对于“一二·九”运动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着爱国学生抗日运动继续胜利前进。

团结群众 共同救亡

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的原则精神，北平党组织首先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加强了形势教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教育。其中，特别是提出了要开展各项活动，交朋友，团结群众，共同救亡。在“三·三一”以后，血的教训使得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不仅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而且开始懂得了：只依靠先锋，不团结广大群众，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斗争不仅要勇敢，还要讲究斗争策略。他们深深感到：在任何一项行动中，都必须把握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否则便不能成功。于是，在民先队员和许多学生中，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新风气。

五月四日，北平学联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的文件，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中的不当之处，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生救国运动，诚恳地请求师长的教导。文件反映了学联干部和民先队员干部的政策水平的提高，博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肯定。同时，各校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学生组织。学联还向各校学生会说明，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暂不宜开展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细致艰苦地作好学生的基层组织工作，进一步团结群众，只有把群众团结起来，我们才会得到工作的开展和胜利。在此期间，学联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一）营救被捕的同学；（二）帮助被捕同学解决学籍问题；（三）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四）建议各界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建议与天津学联共同成立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改北平学生联合会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这些都取得了广大师长和学生的支持。

五月十七日，民先队在师范大学召集了一次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战线”的口号。这天，北平的民先队三十多个代表，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他们一致认识到：争取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学生运动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开展各种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以达到“巩固和发展左派力量，团结中间群众，孤立右派分子”的目的。通过学习和整顿，民先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逐步克服了急躁、骄傲自满、与群众联系不够的缺点。一种革命的、民主的、踏实苦干的新作风大大地发扬起来。

这时，经过一段时期隐蔽在外地的一些党员，也回到了北平。蒋南翔等同志回到北平后，参加了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

六月间，党在北平创办了《长城》和稍后的《国防》、《人民之友》等刊物，都大力进行了当前斗争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以正确的理论和斗争策略指导着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北方局为了扩大宣传，争取群众，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在方式方法上严格区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办好党内秘密刊物《火线》。后来，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还办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公开刊物《华北烽火》。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还多次更换刊物的名称和封面。在北平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小书店以及不少学校的传达室，都是党和抗日救亡团体出版的公开书刊的发行点。尽管敌人多方限制和搜查，这些革命思想，不胫而走，激发人们奋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效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由于贯彻了党的谨慎的正确政策，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克服了暂时的困难，使“一二·九”运动所鼓舞起来的革命热情和通过斗争聚积起来的革命力量，终于巩固和发展起来了。有了党的正确

领导，爱国学生运动是摧不垮的。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们，在各校学生内部踏踏实实地进行了群众工作，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争取团结教育群众的活动。他们把抗日救亡的政治运动和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方式，通过已有的或新组织的群众性团体，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及生活福利工作。他们把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宗教信仰的广大学生，都团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使学生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发展。

要团结广大学生积极参加救亡运动，首先要在学生中不断清除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少数右派教授散播的“读书救国”谬论的影响，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党通过各校校刊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在广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读书与救国”的大辩论。辩论中，有力地批驳了“读书即救国”、“先读书后救国”、“学生只管读书，救国是政府的事”等等错误言论，使大家认识到“读书救国”实际上是诱使学生读死书，麻痹瓦解学生的爱国精神，听任蒋介石去卖国，坐视祖国沦亡。在学生写的许多文章中指出：祖国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再不能只埋头于书本，不问政治了，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都应挺身而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批判“读书救国”的同时，为了团结争取广大学生和教师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进一步密切进步学生与广大中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党组织也在学生中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特别要求党员、民先队员和热心救亡工作的进步学生，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要学好功课，通过学习上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团结大家。如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同志提出

了做好学生的口号。他要求党团员、民先队员在抗日救亡、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各方面都起表率作用。学校中的党员、团员和民先队员响应党的号召。他们不仅在救亡工作中担当先锋，而且在学习上大多数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不仅自己学好，还经常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们受到广大学生的拥戴和师长的赞赏，是大家所公认的好学生，成为团结广大学生的核心。

与此同时，各校学生还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种学术性的社团，举办一些和抗日救亡运动结合的学术活动。北平各大中学学生共同组织的学术团体“北平求知学会”发展很快，成立不久，会员人数就达到千人，在二十多个大中学校中设有分会。他们联络各学校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如“新哲学讲座”等活动，还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广大学生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识和道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另外，有些学校如师范大学还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等，把读书、科学探讨和抗日救亡工作结合起来。他们自己动手做防毒面具，研究国防化学。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平日不大关心政治，但对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团结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马赛曲》、《毕业歌》、《打麦歌》、《伏尔加船夫曲》、《保卫马德里》等等豪壮的抗日歌曲和外国革命歌曲声，淹没了《桃花江》、《毛毛雨》等靡靡之音。在斗争中诞生的清华“海燕歌咏团”，成立才几个月，团员就发展到近二百人，占全校人数的五分之一。歌咏团成立时，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国际歌》。在白区环境下唱这支歌是“犯法”的，但是他们巧妙地以演唱各国国歌为名，把《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的“合法”地

传播开来。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打回老家去》、《马赛曲》、《保卫马德里》等歌曲，印在明信片上，向国内外广为传播，销售达二十多万张。抗日救亡的歌声，使古老的北平城，增加了活力，显示了爱国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和勇敢战斗的时代风貌。

在文艺活动中，戏剧队伍也很活跃，差不多各校都有剧团的组织。一些爱好戏剧的学生积极地参加进来。爱国学生演出的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市民观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当剧中一群失去家乡的孩子哭诉他们流离失所，又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迫害时，观众们都感动得落了泪；当他们演到挺起胸膛找到光明时，广大观众又高兴地鼓起掌。师范大学学生剧团还在北平郊区集市庙会上，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的双簧、国难大鼓以及《察东之夜》、《打回老家去》等街头活报剧，演出时常常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同仇敌忾，全场随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致呼声。文艺宣传活动，鼓舞了群众，也教育了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

在这一时期，各校学生自治会和学生救国会，还注意了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举办了一些生活福利事业，博得了广大学生的拥护与信任。如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原来全由资本家投标承包，伙食费很贵，贫苦学生根本吃不起，只好到离校较远的小饭铺里去吃八分钱一碗的炒饼。学生会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一困难，就自己办了一个清寒食堂，派了杨学诚等同志担任这个食堂的管理员。他们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吃自办食堂，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同学们普遍的赞扬。其他学校也办了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为了加强广大学生对救亡运动的认识，使他们积极关心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北平学联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后来还出版了《北平学生》和《学联会报》等。民先队出版了不定期的机关报。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和固定的印刷场所，因而机关报的出版时断时续。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检查没收，先后用过《民族解放》、《一周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队伍》等名称。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也由许多人轮流担任。学联和民先队还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为了避免敌人的检查，采取了由民先队员分散寄发的方法，或者夹在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等刊物中邮寄。一般都可以发行出去，并且还寄到巴黎、里昂、东京等。这样就加强了全国各地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学生的联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抗日救亡的通讯网。各校学生在这一时期也都运用自己办的各种宣传工具，如《清华周刊》、《北大旬刊》、《燕京新闻》、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救亡》、东北大学的《东大周刊》等，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和宣传党的政策。《清华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宣传过革命理论和抗日主张；“一二·九”运动后，就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在运动中这个刊物对清华学生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学联、民先队的出版物和各校的校刊，都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和揭露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卖国阴谋的重要阵地。此外，各校还经常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以及“五四纪念会”等活动，团结了广大群众，这些集会都成为鼓舞斗志的抗日救亡的宣传与动员。

与此同时，党还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去受教育。这一时期各校办了许多民众夜校，成立了民众教育研究会，编写紧密结合形势的新课本。清华园附近的八家村、挂甲

屯、清河等村庄，都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救国会办的民众夜校。他们教工农群众识字，也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在城内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则经常与工人、人力车夫谈抗日时事。在和工农的接触中，大家看到工农群众的疾苦，看到农村的穷困状况以及工农群众的朴实情感和革命力量，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

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学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建立了友谊，促进了团结，抗日救亡工作得以顺利发展。

军事训练和夏令野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全民族武装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先队的主力处在华北国防前线，他们深感学习军事技术，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因此，民先队北平总队部设有武装部，组织民先队员开展军事演习活动。这一活动首先是在民先队员内部进行，后来也成了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很好方式。

最早的军事学习训练，是秘密进行的。党组织找到一位有游击经验的同志，由黄华同志借到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夏仁德家的客厅，开了一天训练班。参加者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只是纸上谈兵，而且秘密传授，参加的人也太少。于是，民先队就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先队西郊区队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个大队，八十余人，开始在西山举行军事训练和游击战演习。训练方式生动活泼，学习了军事知识、技术，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这虽然仅仅是个初步的尝试，但却是一个新的创造。接着，五月十七日，城内民先队第一、二、三

区队的二百多民先队员，联合在郊区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正值滂沱大雨，但大家情绪热烈、演习认真。虽然大雨湿透了全身，但也没有一个人退却，一直搞了六个小时。后来这种军事演习经常举行；而且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除了军事训练项目外，还有工作研究、时事问题讨论和文娱表演。清华大学的荣千祥（荣高棠）同志的拿手好戏国难大鼓，大家尤其爱听。参加军事演习的，还有队外的学生，每演习一次，就发展一批民先队员。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北平总队部，成功地联合举办了三次夏令野营和一次春游。

第一次夏令营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开始，为期七天，地点在西山大觉寺、樱桃沟一带。这次参加人数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十分之六是民先队员，加上对集体生活感到有兴趣的学生。不料当天下午大雨倾盆，但大家仍兴致勃勃。他们在西山脚下，搭起帐篷，燃起篝火。这几天，大家聚在一起，学习讨论革命理论与政策，举办政治讲座，请了一些进步人士作抗日救亡专题讲演。还进行了打靶、劈刺、冲锋等基本军事动作的练习和游击战术的演习。

夏令营的生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雨过天晴了，雄伟的西山，幽静的老虎洞，潺潺的流水，血红的野花，都在欢迎着集体生活的运动者。于是山上是人们，山谷里是歌声，白天里是行军，演习野战，黑夜里是各种问题的论战。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主义毁灭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亲爱，而且共同学习。……最令人不忘的还是一个天黑如漆的夜袭，当在荆棘窝里匍匐前进时，忽然发现了‘敌人’，想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就要对准开枪了（拍手代替），心虽然强烈的跳动着，还是警惕自己，不要太过于兴奋。”④

第二次、第三次夏令营的组织工作，一次比一次完满，内容也一次比一次丰富多采。第二、第三次夏令营，除了军事演习、政治讲座外，还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救亡路线讨论会、新文字研究会、国防文学研究会等。讲演会上的主讲人有爱国教授、同情抗日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少数爱国的二十九军的军官等。特别是组织了歌咏队、舞蹈队、管弦乐队和爬山队等，举办了一些适合青年兴趣的文艺体育活动，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原来不打算参加的也闻讯赶来了。第二次参加人数有二百三十多人，第三次多达二千余人。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学生累计达三千人左右。在夏令营中，学生们自己打柴、挑水、采购、做饭。生活上互相帮助，行动上遵守纪律，受到了集体生活的锻炼。

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是民先队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遇到的新问题也日益增多和日趋复杂，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对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兴趣也愈浓厚。民先队总部就不断推荐一些书目，如《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萍踪寄语》、《母亲》、《铁流》、《毁灭》等革命文学作品。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写的文章，只在内部传阅。有些学校还办有流动读书室。学习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收效最大的是组织大家结合实际工作，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书，从而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

就这样，经过这一时期各学校的党员和民先队员艰苦、深入

① 《我们的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1937年3月编印，第20页。

的群众工作，通过上述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进一步团结教育了广大学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获得了大家的拥护，党的影响在群众中进一步增长。这时，民先队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三六年暑期，民先队员已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同一时期，各学校的党支部也吸收了一批经过斗争锻炼与考验的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为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在党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在许多学校都逐步占居优势，北平学生运动有了新的蓬蓬勃勃的发展。

为进一步争取爱国自由而斗争

在学生运动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北平学联便联合各界，准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总会。一九三六年四月，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在中共江苏省临委王翰、胡乔木等同志帮助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相继在上海成立。北平学联先后派了刘江陵、刘导生、陆瑾、段君毅等同志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和建立工作。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已成为抗日救国学生运动的组织核心，威信很高，因而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阵地。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发展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就必须进一步争取公开活动，首先需要解决学联活动地点的问题。因为过去学联经常转移，不是长久之计。为此，北平学联执行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认为比较固定在中国大学办公为适宜。因为，这时中国大学的党员比较多一点，民先队员力量也大，地处西单以北，交通方便，

易与城内外各学校联系。中国大学当局也是十分反动的，对学生爱国活动限制很严。为了进一步争取爱国自由，为了学联活动建立新据点，不斗倒反动的学校当局，是没有出路的。北平学联和中国大学党支部，根据北平市委和西城区委的指示精神，立即作出打倒反动校长王正廷和他的爪牙齐大鹏的决定。经过两个月的曲折斗争和复杂的工作，终于赶走了王正廷和他的大小爪牙。又得到著名爱国教授杨秀峰、黄松龄等同志的帮助支持，该校董事会决定由常务董事长何其巩来担任校长，并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学校当局不得干涉学生爱国活动、军警不得进入学校等项条件。而爱国学生则可利用何其巩曾做过北平市长、冯玉祥的秘书长以及他与冀察当局宋哲元有老关系等条件，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样，北平学联就设在中国大学，成为北平爱国学生活动的中心。学联的经费，除各校摊派一点外，还取得一些进步教授的捐款和邀请一些爱国的艺人举行义演。

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得到了世界各国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召开的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上，苏联等三十二个国家的三百多名青年代表，一致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国际学联还规定四月二日到九日为世界青年援助中国学生周，号召全世界的大学召开全体大会，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

世界青年的支援，给中国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大家深深感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青年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响应世界青年的斗争，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运动宣传周。八月二十五日，国际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全国学联派出陶行知、钱俊瑞等参加了大会，并报告了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九月二十日，在

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学联代表陆瑾同志在大会上向海外侨胞介绍了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向全欧华侨保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我们学生一定站在最前线，战斗得最英勇。但是，没有疑问的，单靠我们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她诚恳地希望“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友人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挽起手来，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①一九三八年五月，国际学联代表应中国学联的邀请来中国，加强了中国学生与世界学生的联系。

^① 巴黎《救国时报》第59期，1936年10月5日。

七、“六·一三”——“一二·一二”

“六·一三”大示威

一九三六年夏天，形势又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五月六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退至河北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等。紧接着，日寇将其华北驻兵由八千人骤增至二万多人，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并公然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成了日寇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华北即将完全沦为“第二满洲国”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寇屠杀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营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抛入海河，河面不断出现浮尸。亡国灭种的惨痛，进一步逼到中国人民头上，又一次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同时，日寇大量地掠夺华北的铁、煤、粮、棉，并进一步向华中、华东扩展，使得英美在华北的铁道、矿山、工厂和其他企业，处处受到日本的打击和排挤。日寇的武装走私，已发展成为公开的强盗活动，日货充斥市场，其结果不仅民族工商业沦于破产，而且也使英美货物受到排挤。一九三六年四月，英美货物对中国的人口额竟然减少了五分之二。本来，英美帝国主义纵容日

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希望日本占领东北后，能够向苏联发动进攻，并帮助蒋介石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或者让中国同日本打一下，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但是，日寇的步步进逼，并向华中和长江流域侵入，却严重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日益尖锐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五月，英驻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就其对华走私问题提出了抗议，英美报纸不断责骂日本是“国际强盗”、“黠武国家”。日寇猖狂的走私活动，使得作为国民党政府财政主要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遭到严重损失，这就损害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的利益，并使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更加困难。此外，日寇占领东北后，不仅野蛮地屠杀劳动人民，而且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没收了。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仅采取圈地移民等办法就已经武装占地十多万垧（一垧合十亩）。日本还公布了“移民计划”，预计在二十年内，要占地一千万町步（合一万万六千万亩）^①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比东北全部已耕地还超过许多。日寇又以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将许多中国资本家的工商业“收归国有”。日寇的这种贪婪的掠夺，引起了关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惊恐。

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出：在日本加紧进攻的形势下，由于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日益增强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压力，以及英美和日本在中国利益冲突的新发展，这时基本上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有改变其对日本的态度之可能。因此，党中央适时地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这时的华北，宋哲元从自身的利害出发，千方百计要保存他在华北和平津的地盘。虽然宋哲元已经向日寇作了很多让步，日

寇却一步步地缩小他的地盘，最后竟要完全占领和统治华北，而把他从冀察和平津挤出去。南京国民党蒋介石对宋哲元，则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蒋介石一方面要控制宋哲元，并想消灭他，便于自己“批发卖国”，所以派出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宋哲元进行监视，防范他投靠日本；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宋哲元手下六、七万人的军队和平津地盘，便于自己向日本进行讨价还价，特别是利用宋哲元之手来镇压蓬勃发展的平津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因此，日、宋、蒋之间的矛盾有了发展和扩大。宋哲元处在日、蒋矛盾之间，他所采取的对策则是：日紧靠蒋，蒋紧靠日，日蒋均紧就靠学生，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特别是在华北和平津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抗日风暴一再掀起，二十九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宋哲元虽然对爱国学生运动一贯加以镇压，但这时却表现出某些动摇。

这个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天津。他在缜密地分析和研究了当前日寇增兵天津，企图进一步侵吞华北这个严重形势发展之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他指示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林枫同志去同天津市委其他同志商量对策。为了打击日寇侵略气焰，他建议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由于蒋介石多次命令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犹豫不决。刘少奇同志就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哲元看。宋哲元看后，认为很好。他并且没有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撤退命令。但这时北平爱国学生还在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刘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① 《抗战时期的经济》，时事问题研究会1940年编印，第13、14页。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委立即作出决定，组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行动。为了深入动员各阶层群众，在举行游行示威之前，先发动了一个扩大宣传周。各学校都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散发抗日传单，涂写粉笔标语。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出敌不意地将原定于五月三十日的游行示威，提前改在五月二十八日举行了。天津，这是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但是，就在这里，爱国学生们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抗日大旗，走上了街头。他们把华北危亡的形势和海河浮尸这一亡国惨状，向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作了有力的宣传。示威本来只发动数千人，然而一经队伍的呼喊，迅速地集合到一万多人。不仅有广大学生，而且有一部分教职员。成批的工人，甚至连一些盲人也参加了。悲壮的怒吼，显示了民族的觉醒。这次游行示威运动是成功的。

“五·二八”游行示威刚过不久，日寇便唆使天津反动当局，调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几个主要学校，搜捕进步学生。各校以民先队员为核心，立即组织纠察队，严阵以待，同前来的军警对峙了一天多时间。经过上下内外的配合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营救了被捕学生，保护了大家的安全。这次斗争使大家深深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斗争才能胜利。

接着，六月十三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举行了第四次抗日救国的大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等口号。

在这一次大示威中，虽然受到军警的驱逐和阻拦，但民先队员和学生们将初步学习到的军事知识，运用到示威游行中来了。队伍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迂回前进的“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当先头队伍遇阻，即改变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进；再

遇到阻击时，阵势一变，新的先头队伍，又变成后卫。这样，经历了七聚七散，使军警无法阻拦。同时，在游行示威中，已有不少军警不愿再象“一二·九”、“一二·一六”时那样毒打爱国学生，因为他们同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爱国学生们的英勇抗日斗争，开始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鉴于二十九军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党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提出了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在“六·一三”大示威中，爱国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这些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以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逐步转到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大示威后，学生示威队伍在鼓楼召开了市民大会。市民、工人，而且工商界也派了代表参加。会上议决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武力保卫华北”等议案。在炎热的盛夏，当学生在会场上讲演时，市民们纷纷为汗流浹背的学生送上凉开水，卖冷食的小孩也慷慨地把冷食送到学生的手中。这一次大示威和市民大会，成功地将工农兵学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

天津的“五·二八”和北平的“六·一三”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示威行动，再一次迅速地传遍全国。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市民纷纷起来响应，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这个运动唤醒了更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显示了抗日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华北的气焰。同时，北平“六·一三”示威的成功，也是学联和民先队在

“三·三一”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原则，努力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的丰硕成果，是北平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涨的鲜明标志。

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日本再一次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抗议；蒋介石南京政府以“违反校规，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当局开除大批爱国学生，并解聘了一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教授。

学联对日寇和反动统治当局的这种狼狈为奸的迫害，早有估计，便积极地领导各校广大学生开展反迫害的斗争。开始时，学联曾决议各校无限期罢课，但后来又考虑到长期罢课，一是分散了学生的力量，对斗争不利；二是不利于团结教授、教师共同搞好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学联又立即召开会议，取消了无限期罢课的决议，恢复上课。同时，学联和民先队等团体分别声明今后将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些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当爱国学生被开除时，各校纷纷组织“被处分同学后援会”，四处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和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黄诚同志也被开除了，他为抗议被开除写道：“我的被开除，”只因为“我是救国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们被开除，并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救亡运动的一个障碍，并且对社会、对教育、对民族解放都有关联的一个事件。”^① 敌人的迫害，丝毫动摇不了被开除的爱国学生的革命意志，他们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黄诚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经过组织的帮助，他又转入中国大学，并继续担任北平学联主席。

由于在斗争中，学联注意团结群众、师生合作和争取社会人

士的同情，结果，反动政府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各校爱国正直的教授、教师对学校表示不满，社会人士也指责学校不应开除学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继续向前发展。

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

随着工作的开展，北平民先队扩大了内部民主，更加健全了组织生活，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了民主选举，李昌同志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总队部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孙传文（孙陶林）、顾德欢等同志。原来主要负责人敖白枫同志（高锦明）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了。不久，北平市委派黄敬同志领导民先队总队部工作，还派了杨维、李明等同志到民先队，加强这方面工作。天津民先队由李哲人和张骁同志负责。经过平津民先队员的平时通信和个别联系，特别是经过暑假中返家活动，全国很多城市都发展和建立了民先队组织。据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的统计，共有三十一个城市有民先队队员。计有：北平、天津、西安、济南、唐山、长辛店、开封、束鹿、康庄、烟台、武昌、汉口、苏州、南京、成都、洛阳、保定、青岛、广州、徐州、上海、太原、宣化、杭州、贵阳、南昌、长沙等地区，以及国外的巴黎、里昂和东京。北平民先队总队部还派出黄超显（黄秋耘）同志去香港开展工作。他经广州地下党负责人章汉夫同志介绍，与香港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连贯同志见面，建立

① 《从学校开除学生说到殖民地的教育》，《清华暑期周刊》第11卷第7、8期合刊。

了联系；并在香港发展了民先队员，其中多数为华侨中学生。同时，香港抗日救国会给北平民先队总队部捐赠了一百元港币；在不附加条件之下，在香港的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等也捐助了一千元港币，作为民先队总队经费。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北平学生中有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转移到西安，参加了张学良的学兵队。还有一些则到山西太原，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另外一些到陕北苏区，最早进入苏区的有黄华、邓力群等同志。民先队除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外，在工农中也发展了民先队员。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学联分别召开了扩大干部会和代表大会。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抗日救亡工作，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十月四日，民先队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干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参加会议的一百二十五位民先队干部一致认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以最大的努力，促成联合战线的广泛开展和深入。”会议规定了当前工作是：

(一)促成各学校的学生会，以奠定学联的群众基础，在执行此项决议时必须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争取师生合作；

(二)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成立，运用新的方式组织群众，扶助及推动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

(三)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扩大工作的领域，作为统一战线广泛开展的基础；

(四)支持学联准备群众行动以答复敌人的进攻。^①

接着，北平学联在十月十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学联工作的四项原则：(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拥护政府抗日；(三)师生合作；(四)救亡不忘求学。

在这时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党在教师中进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工作。党团结了一批爱国教授和学者，在文化教育界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大学的吴承仕先生是章太炎的高足，年近花甲，思想进步，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党的领导下，他曾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写了许多鼓吹民族解放的文章。他以最大的热情资助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经费，上课时经常向学生分析当前的时局和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特务分子对他百般威吓与迫害，他毫不畏惧。当吴承仕先生接到国民党特务学生写的匿名信时，他在课堂上激动地怒斥说：“我已经六十岁的人了，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有血气。真想不到竟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让人用了几个钱收买了，干着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出卖祖先的勾当。大家想想这种人还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吗？”他始终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和学生一同过着艰苦的生活，站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他积极热情地参加北平文化界救亡团体的各项活动，经常在学生们举行的抗日救亡的会上出现。他还参加主持《盍旦》等进步刊物。他是进步学生们最敬爱的教授之一。平津沦陷后，他留在天津继续指导和护送青年学生开展敌后斗争。后来，吴承仕先生被日寇逮捕入狱，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敌人的极刑下英勇不屈地牺牲了，表现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②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在加强学生内部思想教育的同时，各校学生救亡团体在“师生合作”的口号下，展开了进一步团结师长的的工作，先后召集了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在这些活动中，由学生救亡团体负责人介绍了

① 《我们的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1937年8月编印，第23、28页。

② 《悼蔡元培吴承仕两先生》，《解放》周刊第102期社论。

自己组织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解释学生对抗日救亡、读书、考试等问题的态度与主张，并阐明了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诚恳地表示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虚心地接受爱国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此后，在开展各项救亡活动中都邀请爱国教师参加指导，除聘请杨秀峰、吴承仕、黄松龄、齐燕铭等进步教授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学术界知名人士作各种学术讲演，《燕大周刊》等学生刊物还开展了“如何团结师生一致救亡”的专题讨论。

由于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由于党的教育和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的感染，许多教师提高了民族觉悟，参加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也有些过去认为学生游行示威是“青年人血气方刚做事太冲动”的教授，这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较正确的了解，开始转向同情与支持。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清华学生开展争取非常时期教育的斗争，未得到教授们的支持；而十月间，在全国人民抗日义愤日益高涨的推动下，北平各大学朱自清等六十六位教授就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提出了“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等八项要求^①。北平学联马上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积极支持教授们的声明。各校教师和学生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并肩战斗。

在争取师生合作的同时，学联和民先队还进行了许多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沦陷东北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行野蛮的剥夺，由于它在关内加紧经济侵略和武装走私，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民族工商业者也渐渐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为了争取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共同抗日救亡，一九

三六年五月间，学联召开了一次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服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通电发出后，全国广泛响应，都开展了服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六·一三”后，除继续开展“服用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外，学生还通过家庭、亲友等私人关系，开展了深入到户的抗日救亡宣传。民族工商业者对学联发起的这一运动普遍表示拥护，感到它是对日寇的经济侵略的回击，维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许多人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转向同情与支持。

学联和民先队还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开展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工作。二十九军中的许多士兵出身于农民，家中遭到饥饿的威胁，家在东北的全家老少正受着日寇的蹂躏，家在华北和其他各地的，也不愿遭到东北同胞那种的国亡家破的命运。因此他们有着抗日的情绪和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和士兵接近，一些民先队员去担任士兵的球类教练员、音乐教员，经常去和他们举行球赛、联欢，交朋友，并向他们讲述日寇在东北和华北的暴行，更加激发起了士兵们的抗日情绪，特别是当喊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时，士兵们很受感动。士兵的觉悟提高了，他们开始同情学生的救亡运动，感到学生、士兵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从十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连续大演习。骑兵和重炮所到之处，庄稼被践踏，房屋被拆毁，农民被逐出。北平学生都愤怒地要求对日寇的演习和野蛮的暴行有一个总的表示。这一天，许多学校的师生都举行了悲痛的纪念，有的学校的师生举手宣誓，要以生命保卫祖国。民先队第六区第一分队还印了《为日军演习敬

① 《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2期第38页。

告父老兄弟》的通俗抗日传单，用顺口溜的形式控诉日寇的暴行，呼吁：工农商学兵和将，大家都是中国人，一齐打倒日本鬼，我们才能享太平。同时，党还通过进步的报刊，提出以武装示威来回答日军的侵略演习，并且向二十九军的官兵进行了宣传鼓动。“以演习回答演习”，很快地成为群众的共同强烈要求，许多觉悟了的爱国士兵也坚决向长官要求实弹演习。各界的一致呼声和爱国士兵的愤怒情绪，促使了宋哲元不得不决定在远离北平城，远离日本驻军的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军事演习。各校学生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兴奋，决定到演习现场进行慰问，鼓舞二十九军爱国官兵的斗志。十一月七日和十二日，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了军事演习。各校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的组织下，长途跋涉，分赴演习地区。

在演习开始时，战士们高声宣读了由学联代为拟定的誓词：“……我们以百姓血汗换来子弹，须诚心竭力，期望命中，歼灭仇敌——日本鬼子。……我们要准备战死在疆场……。”^①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演习时，许多学生也和士兵一起参加了冲锋。大家都从内心里感到，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拿起武器来。爱国士兵们同学生交谈时说：喜峰口杀得日本鬼子尸横遍野，“中国人是不怕矮子兵的！”这种共同的抗日情绪，在军民之间是多年来少见的。学生们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英勇杀敌！”爱国士兵们先是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就同爱国学生一起高呼：“全国民众一致联合起来抗日！”这时，宋哲元趁着中外记者都不在场的时候，也出来向学生表示了一番谢意，并说了一通“个人绝对维护领土完整”等等，但他未敢明确提到“抗日”二字。对于宋哲元的这种转变，爱国学生也表示了欢迎。学生代表在讲话中，热情地希望爱国官兵保持喜峰口抗战的光荣，誓守华北，

并表示学生愿与士兵携起手来，为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在演习结束时，学生们还赠给二十九军一面写着“国家干城”四字的锦旗。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二十九军举行实弹演习，起了回击日寇的作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不久，日寇进攻绥远和察东，当地爱国驻军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奋起抗战，一举击溃日本侵略者和蒙奸德王的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到北平、天津和各地，全国振奋。北平的青年学生特别兴奋，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抗战局面，实行全民抗战。学联决定大力支持绥远抗战，组织了几千名学生进行街头宣传和募集慰劳物品，并发起了捐献万件皮衣运动。各校学生为抗战前线战士赶制衣裤，许多平时不拿针线的女学生及教授们的妻子，这时也参加缝纫。她们在衣物上还巧绣了“冲锋杀敌”四个字。她们边缝边唱道，“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东战士穿着杀敌冲锋。”各校组织了绥远前线服务团，冒着风寒前往前线进行慰问活动。

全国人民对绥远抗战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各界爱国的志士仁人、学者名流、爱国青年学生，纷纷赶赴百灵庙慰问英雄的抗日军民，送往的慰劳物品堆积如山。鲁迅先生的好友刘半农、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以及谢冰心、雷洁琼等均前往慰问。北平师范大学丁发善（丁秀）同志等六人组织了慰问团，并帮助绥远地区组织民先队。清华大学有郭见恩（郭建）、魏东明同志等十四人组成了“赴绥前线服务团”，带了许多慰问品，如棉背心、医药用品等，差不多装了半个车厢。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周游等先后两次赴绥远慰问，并进行采访实习。第二次由

① 《清华同学参观二十九军杀敌演习》，《清华副刊》第45卷第3期。

周游、柯华等同志陪同由陈波儿和崔嵬同志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赴绥远慰问，这个慰问团，实际上变成了平津沪慰问团，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均有代表参加。全国各地派人慰问，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在战斗中检阅我们的队伍

然而，形势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

看到全国人民和爱国士兵奋起救亡抗战，爱国学生们欢欣鼓舞，渴望乘胜前进，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仍然对日寇屈辱投降。绥远前线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的胜利之后，蒋介石对绥远驻军威胁利诱并派汤恩伯率军进驻绥远，对抗战军民进行监视，企图与日军谋求妥协，使局部抗战告终。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

上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其残酷压榨，先后爆发了反日大罢工。十二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乘机进军青岛，捣毁国民党党部，逮捕国民党官员。国民党政府不但忍辱，不反抗，反而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包括保证日厂秩序、不再发生罢工，等等。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全民抗日运动则严厉镇压。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被捕入狱。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愤懑，纷纷通电，要求释放。

消息传来，愤怒的北平学生急切地要求行动起来。

学联发出了紧急的战斗号召：

“我们只有一个总的行动来回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爆发了第五次抗日救国的大示威。游行示威指挥部由黄敬、李昌等同志负责。

在游行的前一天，学联便安排好了全城的交通网，设立一个游行示威总指挥站，下设三个分站，有通讯员传递消息。示威队伍共分三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分别领队。集合地点和时间都做了统一规定。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游击战术，集合、分散、再集合。清华、燕京两校头天晚上派了八十多名先遣队员进城，住在东北大学南校。城内各校学生也不是在学校集合，以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而是在好几个指定地点分别集合，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

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北平的早晨和往常大不相同。天还没亮，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军警，四处巡逻，企图发现学生队伍的踪迹，但直到太阳已出来时，大街上只见一般市民行走。突然，无数的青年学生仿佛从天而降似地，分散的学生转瞬间聚成了示威队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分别带领下，三路大军汇合在东皇城根，开始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许多零散的小部队不断地向它汇集，人数愈来愈多。人们挽紧了同伴的手臂，在这人的巨流里，走着，跑着，喊着，看不见队伍的首尾。

这一次示威中呼喊的口号有：“庆祝收复大庙”、“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反对青岛屈服协定”、“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这些口号集中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着的抗日救国的斗争内容，显示着在抗日大前提下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

在示威中，学生们随处向市民群众进行宣传，张贴标语。许多市民从家中奔出，先是站在一旁观看，继之也踊跃地参加了示

威的行列，他们也和学生们一起高喊：“收复失地！”

在人群中，常常出现一辆缓缓地驶过来的华丽的小汽车，清华大学的杨述坐在这辆小汽车里，负责在游行队伍旁边忽前忽后散发传单。军警以为小汽车里面坐的一定是什么达官贵人，突然从汽车里抛出来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立刻由交通联络员分送到各个示威队伍中去。转眼间，汽车又不见了。军警一时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在一个咖啡馆里坐着两个“客人”，人们川流不息地找他们谈话，有的甚至茶也不喝，谈几句，便匆匆地走了。过了很久，密探们才发现这里原来是示威的指挥所。当它们要打电话叫人来捉时，两个“客人”已经不见了，指挥所又转移到新的地点了。

当军警的摩托车开向示威队伍时，学生们迅速地分散开来，但转眼间分散的人群，又集合了起来，示威队伍仍继续前进。当军警企图再来阻挠时，队伍又分散到街头巷尾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去了。

队伍在东华门前遇到宋哲元的汽车，学生群众围着汽车，要求宋哲元接见学生，并答复学生所提出的抗日要求。宋哲元迟疑不答，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等口号，不放汽车通行。宋哲元不得不答应下午在景山和学生见面。

下午一时，各路示威队伍在北大一院集合，共有三十个大中学校，约五、六千人。在大会上，主席宣布了这次示威行动的目标：（一）要求中日绝交；（二）反对日军青岛暴行；（三）保障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四）扩大绥远战局，实行全国抗战；（五）要求冀察当局出兵冀东，收复察北^①。随即，又组织游行示威。

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全国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以及日寇的加紧压迫，冀察当局也渐渐转向

抗日方面。当示威队伍集中到景山后，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出来讲话，含含糊糊地表示了愿意抗日。当他说到“五年前政府丧失东北是因为准备不充分”时，五、六千人异口同声怒吼，“不对！是政府不抵抗。”后来，全体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等口号，高举旗帜，整队出景山，进行示威游行，沿途呼口号、散传单，继续了很久之后，才分别返校。大家都为这一次示威游行的胜利感到骄傲。一天的斗争使学生们更深刻地懂得了：统一战线不是“叩头战线”，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才能推动别人抗日。谁不了解这个真理，便不配做一个民族解放战士。

“一二·一二”大示威是成功的。由于行动中正确地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由于计划周密，指挥灵活、集合与分散，都达到了异常熟练的程度。因此，广大的爱国学生在反动统治当局面前，勇于和善于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而且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这次斗争中检阅了自己的队伍，证明了：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广大爱国学生一道，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斗争经验也不断丰富起来。

在这一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仅北平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发展，而且在整个白区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员已经散播全国，成为革命运动中的骨干，在全民的抗日救亡工作中作出了贡献。这一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全国各阶层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抗日救国而奋起抗争的胜利。

① 《一二一二北平学生抗日大示威》，《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期合刊。

八、“西安事变”——“七·七”事变

国民党分裂学生运动新阴谋的破产

正当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时候，在西安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毅然地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投降卖国、对内镇压抗日的反动政策，从“哭谏”到“兵谏”，活捉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是长期以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推动的必然结果。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张学良就派人来北平慰问“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受伤的爱国学生，并曾先后三次来电，“请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东北大学救亡委员会决定推选宋黎等三人前往。经党组织同意，宋黎同志于一月下旬去西安，作东北军工作。宋黎见到张学良时，向他介绍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东北人民在日寇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讲得激昂慷慨，乃至声泪俱下。张学良听后大受感动，立即向宋黎表示，他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

亲手收回。当时，张学良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宋黎同志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作了不少公开和秘密的抗日工作。后来，党又派了一批民先队员到西安，参加了张学良的学兵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救亡总会”，在西安发动了万余人的大请愿大示威游行，这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北平“一二·一二”大示威的第二天，学生们清晨起来，正要写通讯、编特刊，向各界报道昨天斗争的胜利，忽然从报纸上看到用特号字排出的西安事变的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抓起来了。顿时，群情鼎沸，议论纷纷，许多人主张杀掉这个卖国集团的总头子。进步学生更是大喜若狂，奔走相告。

在反动教授和右派学生中，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或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或破口大骂，以至变态似地发狂，四处寻衅。师大讲授国民党党义的教授熊梦飞在讲台上哭丧着脸，对学生说什么蒋介石如何“忧国忧民”、“劳苦功高”，如今“不幸蒙难”云云。堂下学生则做着鬼脸，嗤之以鼻。熊梦飞还和该校另一反动教授杨立奎纠集了一小批右派学生，在师大成立所谓“武力清共团”，殴打和辱骂进步学生。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制止他们的暴行。

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青年人一下还很难判断整个形势将如何发展。这时，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要求林枫同志，对于西安事变这件大事，要好好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几天后，林枫同志向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大家认为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搞卖国，镇压抗日，这次抓住了，如果不杀掉，实在不解恨。他并反映了党内和党外未看见北方局表态，很不满意，一些老的共产党员，对这一点也有意见。刘少奇同志冷静而耐心

地听完汇报，郑重地说：“我们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了好。我们还是要等党中央的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上、舆论上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的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妥。”^①

不久，党中央给北方局来电指示，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北平和天津的学联根据党的指示，向全国通电指出：张杨在西安事变中提出来的八项要求，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示，蒋介石应该接受；同时，又着重揭露了汉奸亲日派想乘机挑起内战的阴谋和反动学生无理取闹的事实，呼吁国内和平，停止一切内战和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下，经过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了蒋介石。消息传来，学生们一时大惑不解：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好不容易把他抓了起来，为什么又放走了呢？时局如此迅速曲折地变化，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思想还一下转变不过来，心情突然变得沉闷和不安起来。

刘少奇同志充分估计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他在《火线》上写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用为全国大局好转之关键。”“全国革命势力的开展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抗日战争的开展，西安事变为之奠定了基础。”^②针对群众的思想，刘少奇同志要求平津的党员去说服各方面的人士，使他们拥护党的主张，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此，党通过民先队和学联在各校组织了许多讨论会和座谈会，引导大家讨论“蒋介石该杀还是

该放”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杀了蒋介石，徒为亲日派制造内战作借口，有利于日寇的侵略；放了蒋介石，则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早日实现，从而逐步了解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正确性。党的正确方针获得了群众的拥护，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蒋介石虽然在西安被迫表示接受八项要求，却仍然没有改变其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他对这一时期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极端仇视，在全国进行了新的迫害活动。北平国民党当局和各校的反动分子也乘蒋介石被释的机会，组织了疯狂的反扑，进一步迫害学生运动，使学生运动一时又陷入了十分艰苦的境地。

在蒋介石被释放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即拼凑了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非常嚣张。在一部分学校里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的事件。二十五日晚上，清华大学的一些右派学生冲到救国会办公室捣乱。他们叫嚷说“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口号“不通”，声言“政府还要讨伐”。接着就翻箱倒柜，抢劫救国会文件；又搜查救国会负责人和民先队员的寝室。然后，把文件、《清华周刊》和其他救亡书报，搬运到操场上，付之一炬，一时火焰冲天。这些右派学生大呼反动口号，疯狂嚣张。这时，民先队员以党支部为核心，闻讯后，在被搜查过的救国会前集合，由杨学诚同志带头，跑步赶到操场，一场搏斗，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而去。学校当局却借口双方斗殴，把一些进步学生开除学籍，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通过这次斗争，学生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右派学生遭到很大孤立。

① 《红旗飘飘》第20集，《永存的记忆》，1980年3月北京第1版第84页。

② 《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火线》第69期。

二十六日早晨，北平伪社会局又命令各中学放假一天，要全体学生参加游行。但是那天参加御用游行的人数却很少，大部分是国民党特务学生和右派学生，还有一些是学校当局命令参加的年幼学生，他们有气无力地呼着口号。在杨立奎等指使下，在天安门前通过了“继续讨伐张学良”、“要求政府枪毙沈钧儒等七人”的反动议案，并组成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当时报纸称这个组织为新学联，但它为北平广大学生所唾弃，称之为伪学联。参加这个伪学联的，只有反动当局严密控制的志成中学等少数学校。

伪学联的成立，反映了国民党阴谋从学生内部来分裂学生运动、夺取运动的领导权。

伪学联成立后，反动当局对学联的压迫更加紧了。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学校当局明令解散。《清华周刊》也在寒假以“内容荒谬”的罪名勒令停刊。清华剧团准备演出《汉奸子孙》，又为学校当局所禁止。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遭到了封闭。北平大学女生院和医、工、农、法、商各院的学生自治会被停止活动。在师范大学，杨立奎和熊梦飞更公开在大会上鼓动特务学生进行武装寻衅，出布告不准学生加入民先队，扬言要开除全体民先队员学籍等等。杨立奎还诬蔑学联是“靠卢布过活”。他们在学生中还进行分裂活动，出钱收买落后和受蒙蔽的学生组织小集团，兴风作浪。人们称这个小集团为“饭团”。对于这些人，大家在背后都指指点点地说：“是饭团的！”十分不齿。

在重重困难中，学联首先决定再次争取自己的公开合法地位，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开学时，经过与反动当局的斗争，各校学生自治会才重新恢复选举。在各校选举的过程中，学联与伪学联也有着严重的斗争。伪学联

利用金钱贿赂、请客吃饭、看电影听戏等办法进行拉拢，凡接受贿赂的，都要将选举证留下，由反动学生填写被选举人。但接受这种贿赂的人很少，反动学生在选举中都遭失败。二月中旬，华北学联和华北各界救国会也在北平宣告成立。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国民党从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方向的初步转变。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此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政策也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告诉大家，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并没有表示它的政策有明确和彻底的转变，全国人民要更大地发展抗日民主运动，来迫使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①这样，在统一战线内部，要求实现“抗日民主”、反对“独裁抗日”的斗争，便成为最主要的斗争。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便于领导，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北方局由天津搬到了北平。刘少奇、彭真等同志住在砖塔胡同四眼井。

二月四日至九日，在北方局彭真同志的领导下，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共有队员六千人。到会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个地方队部（海外民先队部未能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有：（一）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6页。

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在工作方式上要争取公开合法；（二）要把救亡运动发展到广泛的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去；北平学生运动对全国有重大影响，也应加强，要使各阶层群众的救亡运动适当地配合起来；（三）大规模武装已迫近，要加强学习军事，并用各种方式建立群众的武装力量；（四）开展国防文化运动；（五）积极发展民先队。^①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选举了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同志为全国总队部负责人。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民先队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北平学联发起组织了包括北平、天津、保定、青岛等地的华北学生献旗团，到南京敦促蒋介石抗日，并联络南方的学生，扩大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当献旗团到达南京时，却遭到软禁。而伪学联组织的献剑团，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盛情招待。

二月二十八日，在华北各界救国会和华北学联的主持下，在中国大学召开了庆祝和平统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二千多人，除了学生外，还有很多市民，有的老太太也赶来参加。大会表示庆祝和平统一的成功，并要求大家跟着新的政治形势行动，在抗日的大旗下，力谋各方面的统一与团结。

争取民主的斗争反映到学生运动中，就是为争取学联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粉碎国民党操纵的伪学联的分裂和破坏活动而斗争。学联一面通过庆祝和平统一大会，表示拥护和平统一；一面又提出了两个学联统一的问题，以争取在伪学联控制下的一部分群众。学联发表了呼吁学运统一的宣言，并不断派代表与伪学联谈判。有一次，学联代表跟伪学联的负责人辩论了一个上午。伪学联的人最后说：“你们有你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你们

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学联代表就问他“你们的主张是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他却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又有一次，学联派代表跟杨立奎讲合作抗日的道理，杨立奎被诘问得理屈词穷。学联及时把这些情况向各校学生作了传达，有力地揭露了伪学联主持者的反动面目。不久学联又向伪学联提出了在接受爱国师长指导和民主选举代表的条件下，双方合作。民主选举的提出，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但是陷于孤立的伪学联，怎么也不敢接受民主选举。这样，伪学联的嘴脸就在学生中暴露无遗了。

学联和伪学联的斗争，发展到一九三七年的“五四”，更趋于表面化。这一天，学联原定在师范大学举行纪念大会。后来，知道伪学联也要开纪念会，于是就和他们商定在师范大学联合举行。这种为抗日而谋求学运统一的诚意，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赞扬和同情。但是，伪学联却存心制造殴打事件。会前，他们不让学联代表参加主席团。会议开始，伪学联的司仪叫唱国民党党歌，可是没几个人唱，声音有气无力，象唱挽歌。进步学生接着就唱救亡歌曲，声如洪钟，威势大振，伪学联的人气急败坏。这时，早有准备的反动的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带着一群童子军赶到，他们手拿木棍，准备打人。在反动教授杨立奎、熊梦飞、陶希圣等人鼓动下，反动学生立即发出一片喊打声，顿时，台上的桌椅板凳一齐往下砸；志成中学的童子军也一拥而上。进步学生对那些伪代表也展开了还击；但对志成中学的童子军，见他们年幼，不便还手。这次斗争，事先缺乏足够的警惕，进步学生当场有二十余人受伤。接着，学联领导下的学生撤到法商学院，继续开会。一部分进步教授在会上讲了话，支持学生与伪学联的斗争。会后学

① 《我们的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1937年3月编印。

联出版了小册子，揭发反动教授和伪学联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只有利于日寇的继续侵略。学联还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向法院起诉，进一步在社会上揭露伪学联的可耻行径。这些斗争使伪学联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反动教授参与五月四日那天殴打爱国学生的事件，本已引起了教育界和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但反动教授杨立奎仍以保护旧礼教自命，通电攻击进步教授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是蛊惑青年，这更激起了文化教育界的义愤。反对反动教授与反对反动学生之声合而为一。在广大群众中，这一小撮反动学生和教授的名声已经狼藉不堪。由于广大学生认清了伪学联的面目，这个反动组织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特别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一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学生运动中，由于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工作也获得了极大的开展。但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致北方青年》等一系列文章。他们主张抗日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不容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种以上的军队”，将学生运动称作是“浮动”，劝学生“不要为那五彩缤纷标语口号所迷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正竭力向北方青年施加影响，企图把他们从斗争的前线拉回后方。

早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在党内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就出现了以徐芸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一致抗日，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所坚持执行的卖国、独

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但是，徐芸书等在西安事变前后，却大呼统一，把所谓“争取国家统一”作为主要任务，并提出了“无条件的统一”的口号。他说：“我们应该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求无条件的统一，我们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他批评反对这一口号的人，说：“他们是不了解惟有无条件始可统一，也是不了解统一为目前最高原则，欲谈统一则不容任何疑问。”这种无条件统一的思想，完全取消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他们为了所谓“统一”，甚至不惜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党所领导的经过各校民主选举的北平学联。他们主张广大学生参加国民党御用的一小撮右派学生所组成的伪学联；诬蔑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就是“有党派的狭隘的色彩”，就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就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的产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徐芸书、黄刊等人甚至在当时资产阶级刊物——《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的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反动文章。他们恶毒地攻击党的路线和政策，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积极给以“回响”；他们把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武装要求抗日的义举，也称为是有碍“国民政府的统一或纲纪”。他们从党内出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向党进攻。

徐芸书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和民先队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蒋弗华等人一唱一和，他们先后出版了《联合》、《学生与国家》等刊物。一九三六年十月，正当学联召开代表会议总结工作、明确方针的时候，徐芸书等就向学联公开挑战，诽谤学生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在《联合》的发刊词上，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作为青年行动的方针。当时还是民先队员的蒋弗华，也极力反对党的领导，大量散播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思想影响。他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公开主张青年走第三条道路，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感情支配”。他把“一二·九”运动说成是“青年人朴茂倔强的生命、泼辣果敢的精神”的爆发，他再三告诫人们“切莫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些左派或者右派”；“莫再傍人门墙，好回到自己的天真，认清自己的愿望，树立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知识救国论”，说进步青年“空知有救亡知识，而不知知识可以救亡。”

这个《宣言》一发表，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高兴，大加赞扬，资产阶级报刊也加以转载。当时资产阶级杂志《月报》在“好文章”评奖时，就将该《宣言》列入前三名。有的人认为是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还有一些右派学生也乘机出场与之唱彼和，发表什么《青年人权独立宣言》之类的东西。

徐芸书、蒋弗华等人的反动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刊物的竭力捧场，曾经使少数自命清高、脱离政治的人一时也迷惑起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徐芸书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所谓“不左不右”的“共产主义者”，而大肆诽谤和攻击党的正确领导和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

徐芸书等一小撮人掀起的一股逆流，完全不能阻挡“一二·九”运动的巨浪奔腾前进。党及时地察觉了这股逆流。一九三六年九月间，北方局彭真同志对北平学生运动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彭真同志还到清华大学住了三天，找了有关党员干部谈形势，讲政策，分析党同徐芸书等人分歧的实质。彭真同志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了北方局。

由于“一二·九”运动以后发展的党员，百分之八十分布在北平各大、中学里，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平津学生运动的指示精神，

为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北方局彭真同志和北平市委领导下，于十月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蒋南翔同志担任学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初，党指出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左派与右派、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党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是依靠国民党抗日，取消党的领导权。党特别指出了徐芸书等人的主张，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当时也就是国民党的道路。党及时地教育了党内外青年正确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必须自觉依靠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扩大左派力量；必须依靠群众，统一战线决不能把群众的力量给统掉。党又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在学生运动中，必须大大发展学联和民先队的力量，加强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给以游击战争的训练。

在反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徐芸书等人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终被开除出党。

反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和巩固了党的队伍，使右倾投降主义在刚一露头、还没有发生更大危害的时候，就得到了克服。党内外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紧紧按照党所指引的道路，胜利地日益深入地向前发展。

时刻准备迎击敌人

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动国民党当局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变了它的策略。日本帝国主义在表面上暂时采取和缓的姿态，企图以“和平”烟幕掩盖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日本外相佐藤高唱“和平外交”，提出“经济提携”和“文化提携”。佐藤公开出面拉拢蒋介石，诡称要改变过去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所发表的对外交政策的演说中说：“中日问题只有吾侪改变方法，另从新的起点着手，方可解决。”“吾人应将过去一切付诸东流，而从新的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当时，一部分学生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以为今后日本将放弃军事进攻，改用经济侵略。于是出现了“中日矛盾下降论”、“华北苟安论”等错误论调。同时，一些学生不了解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一面表示与共产党合作，一面又镇压民众运动，因而很觉苦闷。

在这种情况下，党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学生运动中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加强了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形势任务的教育。当时在民先队员中普遍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问题，讨论了“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胜利会师后的形势”、“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当前学生运动的任务和存在的问题”、“佐藤外交和中日关系”等题目，在会上和会下争论得很热烈。

这个时候，正如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所指示那样：“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①在国内政治形势的讨论中，党反复分析了抗日和民主的关系，帮助民先队员们认识到，对于抗日任务，民主是最本质的东西，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批判和澄清了那些认为只要抗日，不要争取民主的错误思想。为了从理

论上武装学生的思想，还引导与组织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举办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讲座，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当时在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内的书摊上都可以买到一些进步的革命的书刊。为了躲过反动派的查禁，这些书刊都加上了《红楼梦》、《清宫秘史》的封皮，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帝国主义论》的学习，帮助学生们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和佐藤外交的实质。这些学习和讨论，为广大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在后来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思想上作了一定的准备。

同时，党又进一步领导学联和民先队，进行了多方面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党通过民先队和学联，对一般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各校曾多次举办政治报告会、时事讨论会，会上学生们热烈争论，情绪非常活跃。民先队和学联还经常介绍进步书籍和左派刊物，让大家阅读。许多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认识。当时还为学生放映了苏联电影，在真光电影院一连三天放映《今日之苏联》，向学生介绍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工业、农业发展情况及人民的幸福生活。燕京大学的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曾先后集会，请斯诺讲述陕北见闻。讲演人介绍了陕北概况及红军大学学生生活和军事演习的实况，会后放映了介绍陕北情况和红军长征的幻灯片三百余张。这次活动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参加者达三百余人，不少外校学生也赶来参加。事实使学生们明白了陕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7页。

北确实是抗日民主的坚强阵地，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民先队和学联也注意通过各种纪念日的纪念活动教育和团结群众。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北平大学女院和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女学生四百余人，联合组织纪念活动。她们来到圆明园，眼看着七十多年前被帝国主义强盗焚毁的断壁残垣，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学联组织了四、五百学生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衣冠塚去举行了公祭，并请老同盟会会员李锡九先生讲演。当场全体学生还一致通过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一九三七年春天，学联组织了两次规模很大的、包括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春季旅行活动。第一次在香山，参加的有三千余人，并邀请了很多歌唱家和戏剧家来进行演出。崔嵬同志和张瑞芳同志合演了《放下你的鞭子》。这次演出很成功，场内场外的人都感动得哭了。观众中有一个东北籍的警察，买了两瓶石榴水，送给崔嵬和张瑞芳同志喝，还说他流亡到关内后，没有办法才干这个差事的。从此以后，崔嵬同志总是提着装了化妆品的只藤箱到处演出。每次演完《放下你的鞭子》后，许多观众都把钱一把一把地扔进藤箱里来，连洋钱也扔进来，给他们这两位东北流亡来的“卖艺的父女”。每次演出后，崔嵬的藤箱子里的钱总是装得满满的。他们马上把这些钱捐给了学联。

第二次在温泉，参加的有五千余人。这一次活动中除组织歌咏外，还临时决定演出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审判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人士罪行的话剧《开庭》。当时，根本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和导演，也没有道具。临时就因陋就简地借温泉浴池路旁一家小糖果店，作为后台。掌柜的一对老夫妻很热情，帮助借了衣服和各种道具。黄敬同志担任导演兼化妆，李昌同志担任编剧和台

词讲授。王文彬同志扮演沈钧儒，……。紧张地准备了一个钟头后，立即演出。由于仓猝登场，加以“演员”们都是外行，演出中闹了一些笑话。如扮演“法警”的别出心裁，要“沈钧儒”向法官鞠躬，而“沈老”不肯，眼看戏要演“砸锅”了，担任导演的黄敬同志在场外急得直跺脚。还是扮演“沈老”的王文彬同志急中生智，怒斥“法警”道：“我是保障人权的大律师，研究法律已经几十年了，你们六法全书我都可以背诵，从来没有受审判的人要向法官鞠躬这一条。你们是破坏人权，破坏我的人格，也破坏了你们自己定的法律。我抗议你们这种非法的审判和非法的行为”。这样一骂，不但把戏接下去了，而效果很好，受到广大春游参加者的欢迎。最后，观众们还一致提出通电全国，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救国会领袖和释放一切政治犯等。

每年四、五月间，西郊妙峰山有庙会。有看热闹的，更多的是一批又一批烧香还愿的善男信女。清华民先队也借此时机，前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民先队和学联团结了广大学生，不断地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从而扩大和加强了抗日救亡的阵容。

这时期，民先队和学联还特别注意对广大学生进行军事教育。党派来老红军袁也烈同志和朱明同志担任军事教官，帮助学生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学联武装部组织了游击训练班，印发游击战术纲要，领导学生学习游击战的理论。在游击战演习中，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不拔的毅力。在北风凛冽的严冬，学生们举行了红山口雪地旅行；在炎热的夏天，到西山举行野营。

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清华党支部杨学诚、师范大学党支部林一

山、北平民先队总队部李昌等同志前往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化装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集合去延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来看白区代表团。大家席地而坐，毛泽东同志还向代表介绍了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杨学诚和李昌同志在大会上也发了言。在发言中，他们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接着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出了正确和详细的解答。

这次会议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在新的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日战争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朱德同志还特意嘱咐王震同志带领北平代表到桥儿沟附近山里练习打枪。黄敬、杨学诚、林一山、李昌四位同志带着老一辈同志的殷切期望，肩负着发动千百万群众迎接抗日战争的重任，满怀信心地离开了延安。

他们从延安回归北平途中，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住了几天。受到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同志热情欢迎和亲切的会见。关向应同志还叫黄敬和李昌同志同他睡在一个炕上，谈白区各阶层的动态、“一二·九”运动和民先队情况，一直谈到深夜。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领着他们与部队战士们见面。黄敬和李昌在部队大会上讲了话，诉说了北平进步青年学生们当听到红军北上抗日和东渡黄河胜利消息时，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并表达了他们看到自己的人民武装时的兴奋心情。他们说：过去我们

受人家枪杆子压迫，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枪杆子了；我们的武装越壮大，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就越有保证。他们向广大红军将士表示：爱国学生和民先队员们一定和红军打成一片。红军将士对北平代表的热烈欢迎，也就是对“一二·九”运动和白区的救亡运动的最大支持和爱护。

在“七·七”事变前夕，形势已是十分紧急，旦夕之间，日寇即可大举进行军事进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控制各地学生的抗日救亡的活动，指定高中和大学学生在暑假期间集中进行所谓“军事训练”，由国民党政府所指派的“军事教官”主持一切。但是，在冀察地区，是二十九军主持，北平地区学生训练队的军官由二十九军的下级军官来充任。学联立即利用了这个广泛接触二十九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好机会，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党员、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西苑的训练。在“军训”开学那天，学联还派了史立德和杨述二同志为代表参加了开学典礼的检阅。在训练中，学生们不断向二十九军的爱国官兵们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高了士兵们的抗日救国情绪。二十九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对学生们的吃苦耐劳，认真学习军事技术和遵守纪律的精神都很佩服。与此同时，学联还组织了另一部分学生到南苑参加学兵队，准备战斗。在女学生中成立了护士训练班，训练了大批护士。七月初，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清华大学五校在西山举行联合夏令营。学生们清晨鸣号即起，自己动手做饭，饭后便整装出发，翻山越岭，有的人脚走肿了，有的人衣服刺破了，但是没人叫苦。他们以红军为榜样，决心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学生们在山岗上作军事演习，练习迂回包围，喊杀冲锋。晚上借着月光，练习游击战，用铁桶代替大炮，用鞭炮代替枪声。

还举办了讲演会、形势座谈会，内容有“和平与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问题”、“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时局问题”等等。这次暑期生活虽然为时很短，但对每一个参加者来说，却是一次战斗的冶炼。党的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也逐渐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这些活动为以后由城市转向农村参加游击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在芦沟桥的炮声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军炮轰芦沟桥，以武力大举向中国进攻。守桥的二十九军士兵们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爆发了。

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芦沟桥的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武装保卫全中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

芦沟桥抗日的炮声，振奋了“一二·九”的青年：“我们盼望的抗日这一天可来了！”他们想到了两年前的北平，谁也不能谈抗日。“一二·九”那天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后，不断地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两年来，这些青年学生冒着大刀、水龙和坐牢的危险，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首先是为了彻底实现抗日救国这一目标。如今抗战爆发了，大家的心里十分激动。正在妙峰山演习夜间打游击的学生，听到炮声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赶回北平参加抗日工作。正在西苑参加军训的学生也纷纷请缨杀敌，要求到前线去和士兵们并肩作战。

战火在燃烧，北平沸腾了。北平的一百五十万人民，立即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行动起来。七月十一日，民先队、学联、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在七月十三日发表了市民拥护二十九军抗战宣言：（一）誓死反对日本武装侵略华北；（二）拥护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保卫平津；（三）立即驱逐日驻屯军出境；（四）反对签订一切屈辱条约。学联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运动，学生、市民都踊跃响应，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校园里麻袋很快就堆积如山。接着学联又在学生中发起为官兵捐献一万件背心运动；茶商也发起为将士捐献一万包茶叶运动；儿童们则发起为救亡捐献“一大枚”（铜元）运动；妇女界特别出版了《妇女抗战》杂志，专门宣传抗日救亡工作。

“一二·九”青年在民先队和学联的组织下，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前线。各校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下设救护、宣传、劳军等专门工作机构。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组织了联合救护队，并将北京大学三院改成伤兵医院，很多女学生经过了短时期训练之后，都成了伤兵医院的“护士”。她们成天伴随着伤员，煮汤换药，送茶送饭。有的人经常彻夜地工作着。负责宣传的学生，整天携带着各式各样内容生动的宣传品，活跃在大街上。一面宣传，一面募捐。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从东安市场一直到西单、天桥，都有学生在向市民宣传抗战已经开始的新形势，说明日寇已经向我国大举进攻，北平危在旦夕，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

学生们还组织了劳军大队，扛着大旗，带着用募捐来的钱买的水果、饼干、背心和其他日用品，在长辛店、门头沟、宛平等

战斗前线进行慰劳活动。他们每到一处，就请士兵和下级军官讲述战斗情况，同时向他们献慰劳品和表达后方人民的期望和支持。二十九军的战士们都很受感动，有的含着眼泪紧握着学生的手说：“万分感谢你们……我们一定为民族争光……誓死收复失地……。”

在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二十九军官兵曾给进犯的日寇很大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又使用了和平欺骗的伎俩，它声称：“只要签订和约，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日军永远不进北平城。”汉奸亲日派便随声附和，企图麻痹人民，削弱抗日救国、支援抗战前线的力量，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针对着当时的局势，民先队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刊物《情报》，向市民揭露了日寇的阴谋。指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动员人民积极奋战，以抵抗日寇的军事进攻。学联并曾计划组织市民群众，配合部队和日寇作进一步的斗争。

但是，宋哲元在七月十九日由天津返回北平后，即下令拆毁城内全部防御工事，二十九军慌忙地作着迁往保定的准备。七月二十八日夜，宋哲元弃城逃走。

这时，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深夜还在加紧支援前线的工作，一早醒来，街上已布满日军岗哨了。城里的人如潮水般往外涌，城外的人又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向城里冲。慌忙紊乱，有如一锅滚沸的开水！当天，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李昌、黄诚、王文彬等同志，布置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蒋南翔、李昌等同志从城内赶回清华园，和杨学诚、于光远等同志汇合起来，还把校警的枪也背上，原拟从模式口渡河去保定，但途中发现永定河沿线日军已经布防，除了于光远等少数

人冒险突过封锁线外，队伍只好折回，分散入城，待机行动。后来黄敬同志又把大家找到他在西城的家中碰了一次头，根据平津已经通车的情况，决定化装坐车到天津，再继续撤退。蒋南翔和杨学诚同志在宣武门外的黄陂县会馆里，继续积极筹划和组织北平流亡学生的撤退工作。他们两人在离开北平前两天，又设法通过西直门、海淀、清华园三重敌人的岗哨，一同回到清华大学，分头将分藏在几个地方的秘密文件烧毁。这时原来风景如画的清华园，不到两周时间，已经变得满目荒芜，马路上和网球场上，都已长上了杂草。杨学诚同志感慨地说：“我们再来北平，不知清华园成什么样子了！”

不久，蒋南翔、李昌同志和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些同志来到天津。他们利用叶方同志的社会关系，借用天津一个资本家的房子，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这里环境比较安全，等着搭海轮南下，时间也比较充裕。会上，对撤退的方针计划进行了充分讨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一起打游击；一是“南下”，发动群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讨论的结果：北上是最重要的，南下也需要。于是平津学生分批撤离了日军的占领区。有的乘海轮经烟台、青岛到了济南；有的奔赴华北斗争前线；有的到后方传播抗日救亡种子。

北平沦陷了。“一二·九”运动的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投入了为全民族解放而战斗的新阶段。

九、奔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遍全国

在平津沦陷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芦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随后，毛泽东同志又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华北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为保卫华北和祖国而斗争。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作了紧急部署：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参加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凡平时担任公开工作，并且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立即设法向内地撤退；凡平时隐蔽较好，并且有社会职业或有条件就业的，应该深入隐蔽下来，准备作长期地下

斗争。同时，党向广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伟大号召：与工农群众结合，与革命武装结合。“到前线去”的口号激动着千百万青年的心。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大举进攻的时刻，面临着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党员和广大的华北爱国青年，特别是经过初步锻炼的数千民先队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都积极地行动起来，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这时，党的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同志都在太原。太原是华北抗战的中心。

七月底，北方局彭真同志在保定接见了民先队总队部负责人，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民先队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在一张纸上画出抗日游击区、根据地以及将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地图后说：民先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学会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开展各项抗日活动。

八月初，彭真同志在太原第二次接见了民先队总队部的同志，又指示民先队要动员和组织革命青年到延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临汾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学习。

这个时候，党中央的周恩来、贺龙同志途经太原，也向民先队员和青年作了讲演。他们向青年们指出：全国人民面临的日寇是手拿杀人武器的凶恶敌人，我们革命青年也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

党的这些宝贵的指示，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行动的指针。

民先队总队部，遵循着党的指示，将一部分民先队员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坚持斗争；相当多的人奔赴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山东、中原、华南各抗日根据地，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在河北，有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同志率领的由一部分平津和保定流亡学生组成的一支

抗日游击队，艰苦地转战在太行山上。在山西，许多人参加了薄一波同志领导的新军和牺盟会；来到太原的宋尔纯（宋应）、饶斌、康世恩同志等踊跃地参加了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民先总队的杨雨民、杨克冰等同志到了敌后；李哲人同志到晋南开辟根据地去了。在山东，一部分南下的民先队刘居英、林一山、孙传文和史伟同志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和济南学生组成一支山东纵队，活跃在泰山一带，后来和八路军东进部队会合，建立了鲁西北根据地。在广东一带的一批“一二·九”青年，深入农村与农民武装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开辟了东江根据地。

同时，民先队总队部又组织另一部分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转移至济南、太原、南京、武汉等地，并设立了平津同学会或华北同学会，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遍全中国。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太原正式成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并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在临汾和济南也举办了短期训练班，学习形势、游击战战术，以及如何作农村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先后创办了许多报纸刊物，如《解放之路》、《动员报》、《战斗青年五日报》和出版抗日救亡小册子；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亡运动的联系，在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并且成立青年救国团。在国外也有抗日救亡的青年组织。

十一月，太原沦陷，民先总队部随北方局和刘少奇同志撤退到临汾。在这里，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这时，阎锡山的部队一溃千里，晋南人心惶惶。临汾城里，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看不到一个老百姓。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周恩来同志在临汾作了一次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公开讲演。各界人士和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的军官，听后都很振奋，认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华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们当场自动捐款，要求广泛印发周恩来同志的讲稿。平津同学会在地方党的协助下，由蒋南翔同志负责编辑了一份油印报纸。刻腊纸的是一位姓蔡的华侨学生。这份两个人办起来的报纸，登载抗战消息，阐明当前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它对稳定人心，鼓舞抗日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北方局杨尚昆同志还为这个油印报纸写过社论。在临汾，民先队总队部由李昌、陆平、顾大川、丁浩川、夏英喆等同志负责，继续为各方面输送干部，开展战地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这时的临汾，又成了华北抗战的中心。因此，各地以至国外回来的青年和民先队员，纷纷来到这里。刚从法国归来的吴子牧同志到临汾后不久，即奔赴华北抗战前线；李伟同志直接参加了炮兵团。为了坚持抗战，在临汾还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打击托派张慕陶破坏抗战的运动。

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又告失守。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民先队总队部撤至西安。民先队总队部争取在西安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但遭到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的百般阻挠和迫害。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和宣侠父同志的保护下，李昌同志才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坐火车到武汉。民先总队部撤到武汉后，由李昌同志任总队长，于光远同志任宣传部长，宋一平同志任组织部长。六、七月间，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公开下令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十三个救亡团体，并且逮捕了民先队西北队长李连璧、民先队西安队长于志远等西安五青年。党便派丁秀同志从延安到西安担任民先队西北队长和党团书记。

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还召开了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在长江局领导下，蒋南翔、宋一平、李昌、杨学诚、黄华、于光远等同志参加了武汉地区的青年工作。

这时，武汉的抗日救亡活动蓬蓬勃勃地发展。全国青年救国团正向鄂、豫、皖、湘、赣、川、粤、桂等地区迅速发展。从上海流亡来的职业青年组织蚁社，也很活跃。民先队总队部在武汉的办事处设在刚从法国回来的民先队员夏农苔同志家中。这个期间，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武汉等城市。两位法国留学生，一位是陈柱天同志，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曾任中国学联出席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代表；另一位是曹承宪同志，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曾任民先队出席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敌机炸死。对两位战友的牺牲，大家感到无限的悲痛，更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

民先队员和抗日青年学生，深入工农和青年学生中，把爱国青年组织起来。如在西安就有一百多个农村工作团，分别深入关中五十多个县和陕南地区，向农民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并建立了一支七八百人的民先队。到一九三八年春这支队伍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四月成立了民先队西北队部，并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在海外的华侨青年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马来亚的华侨学生组织了三千多人的“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会”。从国内到国外，从前方到后方，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二·九”青年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广泛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促进了全民抗日战争的新高涨。

全国各大城市的平津同学会，积极帮助流亡同学解决衣食住行等等切身困难，组织他们开展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对他们进行种种防范和破坏。由蒋南翔、段君毅等同志率领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让他们参加抗战工作，相反，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老搞制式训练，企图把他们束缚住。同时，南京的平津同学会竟受到无理查封，负责人被扣留了三、四个星期之久。在济南、开封、西安等地的平津同学会也有同样的遭遇。在

济南的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和张瑞芳等同志组织了平津学生移动剧团，所演出的救亡戏剧，影响很大。在徐州，由王文彬、武衡和张震寰等同志团结一批平津学生，与当地青年结合在一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极端腐败，军队节节败退，日寇侵入华中，长沙也处在日机的滥炸之下。面对这种新的危机，进步的青年学生的心情沉重而激愤。正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党派徐特立同志到了长沙临大，给学生们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介绍了八路军与延安的情况。最后强调指出，青年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必须拿起枪杆，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徐老的讲话给学生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因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延安与八路军象磁石一样地吸引着学生。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临大学生中的一部分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到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去；留校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又组织了各种社团，创办《火线下》等刊物，扩大学生救亡工作。

在全国，党所领导的以民先队为骨干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到一九三八年六月，全国民先队员已有五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日战争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影响日益深远，更加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视和严重的摧残。国民党反动派对民先队总部所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大肆造谣和中伤，以“破坏抗日”、“与八路军同流”的严重“罪名”强加在革命青年头上。在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公开取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十三团体，查禁民先队出版的刊物和宣传小册子，驱逐民先队员，甚至公开迫害民先队总队部负责人；在贵阳，民先队队长张益珊等五同志，惨遭杀害。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白区的民先队终于被国民

党政府强迫解散。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政府迫害民先队，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与此同时，党又进一步领导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坚持斗争，以民先队员为核心，采取了各种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更广泛地团结了抗日革命青年，如组织了“青年自强读书会”、“青年职业互助会”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开展青年运动。如湖北的民先队部，在省委的领导下，由姜纪常、孙世实和韦君宜等同志负责，继续在学生和工人、农民中发展，积极准备打游击。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紧密配合，后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北平沦陷后，中共北平市委留下李常青和刘杰同志，负责组织转移工作。他们根据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迅速地作了重要布置：凡有条件搞武装的应想尽一切办法，成立游击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这时候，党领导党员和民先队员立即行动起来，积极进行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的工作。不久，从农民那里获悉，在西郊一带有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壮大抗日力量，党决定争取这支武装力量，一致抗日，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北方局在华北组织武装斗争的负责人之一张玺尧同志，给东北大学董学礼同志和东北中山中学徐明、阎铁同志交代了这项任务。经过联系和了解，得悉这支游击队，除个别人当过旧军官或当过土匪，参加游击队是为个人发财的目的外，大部分是二十九军和冀东保安队的散兵，他们多数是农民出身，是真心抗日的。于是，

党派了汪智力、史进谦、张如山等同志，带领一批党员干部和抗日青年学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去，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其中党的力量占主要地位。

由于敌我力量暂时的悬殊，平津大城市及铁道沿线重要据点日军均有重兵把守，显然不宜于进攻这些地方。但是，为了扩大抗日斗争的影响，这支游击队的党支部决定攻打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当时，党派吴靖宇同志带领几个同志先行前往侦察，得知日寇尚未接收这个监狱，里面押着几十名政治犯和几百名刑事犯。狱中有五十多名职员和看守，四十多枝枪。这个监狱，地处偏僻，便于夜袭，又有青纱帐掩护，既便于攻击，也便于退却。如奇袭成功，既能营救狱中的共产党员，也能补充武器。一九三七年九月初，游击队分为三小队，每小队约十七、八人，在一个深夜来到德胜门外监狱。先由一个会说日语的队员乔装成日军，假装通过翻译虚张声势地喊到：“日本皇军来看监狱了，快开门！”又喊道：“你们不快开门，等日本皇军一到非揍你们不可！”吓得看守们乖乖地打开了大门。吴靖宇同志一个箭步上去，手枪对准开门的看守胸口，大喝一声：“不许动！我们是抗日军！”顿时，四面埋伏的游击队员，一拥而进。霎时整个监狱大乱。游击队员说道：“我们是抗日军，是游击队，解放你们来了！”首先打开了洪字号监房，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冲出来了，与游击队员热烈拥抱欢呼。随后，游击队指挥部下令：“砸开所有监门，内外一齐动手！”仅一个多小时，整个战斗全部结束。拂晓前，游击队率领着大家离开监狱，来到德胜门外十余里的地方。在这里整编了队伍，除了年老体弱的外，越狱的几百人都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当场编了三个大队。在几十名政治犯里，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为游击队增加了新的力量。这次奇袭获得了巨大胜利，不仅给日寇一个警告，特别是给

北平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党的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十分关心这支部队，不断派来党员干部、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并经常给以经济上的支持。在党的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在宛平七区地下党的支援下，这支部队日益壮大和巩固，并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清洗了少数土匪、坏分子，纯洁了队伍，后来部队扩大到两千多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北方局派人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取得联系，将这支部队改编为第一军分区第五支队，担负着开辟平西根据地的任务。

这支游击队组织了许多爆破组、狙击队，经常活跃在香山、万寿山、门头沟一带。在一九三八年“七·七”周年前夕的一次夜袭中，炸毁了石景山发电厂，使北平城顿成一片黑暗。由于游击队神出鬼没，日寇胆战心惊，后来连西郊清华大学都不敢驻兵了。曾经有一个时期，日寇把北平城内一千多名警察的枪枝也收回去了，后来敌人又担心无法维持治安，才又发还六百枝枪。这支游击队一面坚持游击战，一面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在各个村落集镇宣传抗日，组织救国会，武装群众。队伍不断扩大，抗日民主政权也不断扩大和巩固，形成了强大的平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北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了一把锋利的尖刀。

在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同时，党不断地组织广大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去。

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灯塔，它吸引着千千万万颗炽烈的、要求抗日的心。

在通向陕北的路上，无数工人、农民、学生，风餐露宿，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在络绎不绝的人群里，很多就是来自全国各地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革命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进一步看到了民族危机的深重，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监禁

与迫害，在现实生活的严酷教育下逐渐找到了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与工农结合才有出路。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经受更严格的革命锻炼，就成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心愿。

从华北到延安去，这是一个艰苦斗争的历程。在途中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和迫害，其中许多人被投入国民党设立在西安的集中营。但是，抗日救国和革命理想给他们以坚强的信念和无限的力量，任何迫害或监禁也吓不倒“一二·九”青年，他们仍然不顾险阻，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

“一二·九”革命青年一投身延安，就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以及革命长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切教导来到延安的大批革命男女青年：“一要坚定的政治路线，二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②毛泽东同志号召来到延安的青年们，“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③朱德同志还赠送给青年们三件宝贝：第一是锄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勉励他们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建设边区；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化知识。在参观了延安的工业区、文化区，特别是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亲眼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和朱德同志种的菜园后，革命领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深深教育了他们。延安的一切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23日。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3、556、557页。

都是新鲜的，生活在这里，他们感到骄傲和幸福。

“一二·九”的革命青年带着参加革命与锻炼的决心，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学习。开始，有的学校甚至还没有校址，他们就自己动手，兴修校舍。譬如在陇东开办抗大七分校时，大家就在陇东高原上没有人烟的豹子川、平定川、大风川等地，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一排排的窑洞和瓦房，有了自己的礼堂、教室、会议室、操场、俱乐部、商店、邮局等。

当时延安在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包围下，生活是艰苦的，一切东西全要靠自己动手。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响应了党的号召，自己动手，开垦荒地，并就地取材，制造了许多生产工具，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在第一天的劳动中，许多人双手打满了血泡，累得腰痠腿痛，有的人甚至情绪有些低落。但是，一想到革命长辈的亲切教导，想到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而且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浑身劲头又涌了上来。他们唱道：“炒小米烧山药蛋，肚子饱了加劲干，今天咱们吃点苦，明天荒地变良田，国民党的封锁梦，给它敲个稀巴烂！”大家常常是三三两两，一边开荒，一边抓紧时间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或者口头互相测验时事。当时，延安青年除了开荒外，自己还用土法因陋就简地建立起造纸、肥皂、火柴、毛巾等小型工厂。在这里，大家吃的是自己生产的小米、蔬菜；穿的是用自己纺的纱织成的土布，然后又自己做衣服和鞋袜；上课是在自己盖的教室里，坐在自己制作的凳子上……，这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硕果。

在劳动中，大家不仅学会生产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感情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真正懂得了劳动的意义，逐步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了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最聪明。譬如打窑洞，上

级派了一个学土木建筑的大学生设计。他用仪器测量了窑洞的曲线，做出了精确的设计图。但是在一场大雨后，按他设计打的窑洞坍塌了，而农民群众用土法挖的地洞却完整无损。农民群众打一个窑洞不过用十七八个工，而他设计的却要一百多个工。活生生的事实使这个大学生深受教育。通过劳动的实践，使大家初步感到自己过去想象的和工农相结合，就是教育工农、领导工农的想法多么幼稚可笑；希望在延安能平静地学习，然后“轰轰烈烈地干一场”等想法也是不对的；认识到要革命，要把自己造就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放下架子，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

这样，在延安的广大青年学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一边又学习军事知识，不断地把自己锻炼成会劳动、能打仗、又有科学文化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实际生活中，大家深深地受到了阶级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懂得了劳动人民最伟大，懂得了自己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的真理。

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无数的革命青年在这里得到党的熏陶和冶炼，被培养成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奔赴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有的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到各根据地或游击区，同日寇以及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在沦陷区或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千万个革命青年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上。

遍布各个游击区和根据地里的广大“一二·九”革命青年，在革命长辈的教导下和老一辈的工农革命战士的帮助下，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和艰苦的日子里，眼看到敌人的烧光、抢光、杀光的残酷罪行，胸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他们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往冲杀，心里想的只是多杀死一个日寇，就多为一个死

难的同胞报仇。他们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行军中，冒着寒风大雪，翻山越岭，强行百十里路。太行山闹灾荒，就吃树皮；晋西北缺粮，就吃糠；没有灯光，就借着月光学习文件。所有这些，使得许多青年学生战士们，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磨炼得更坚强了。

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一二·九”革命青年一边战斗，一边宣传和组织群众。在犬牙交错的游击区里，当党派来了干部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他们张罗着食宿；当敌人来搜查时，群众常常以生命来掩护他们；为了要了解敌情，群众又及时又准确地反映情况。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每一个革命青年，认识到日益觉悟了的人民群众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在根据地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参军支前的热潮，保卫人民政权。在这里工作的革命青年，认识到党所以有着崇高的威信，是由于党代表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的正确和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切，使无数的“一二·九”革命青年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逐渐地认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才能做到真正的革命化和群众化，也只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得到锤炼，对人民作出贡献。

“一二·九”运动在城市开了花，在农村结了果，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创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与工农相结合、与革命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经验。

灿烂的花，丰硕的果

“一二·九”运动的革命青年，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将抗日爱国热情化为终生为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决心，逐步锻炼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二·九”运动的革命青年，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象种子一样撒播在全国各地，在祖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为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一二·九”运动中被认为是一员虎将的中国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白乙化同志，在抗日游击队里，成了优秀的指挥员，他领导着一支游击队转战在平西、平北一带。在他英勇牺牲后的很长时间内，平西一带的老乡们还到处流传着他“打东洋鬼子”的故事。

“一二·九”后的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民先队大队长李光汉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成为人民爱戴的中共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在他逝世时，群众说：“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二·九”时代的北平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黄诚同志，担任了新四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一直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着，战斗着。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在上饶集中营，虽经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仍忠贞不屈，最后从容就义。还有象董毓华、杨学诚、王文彬、蒋弼、孙世实、刘亚生、纪毓秀、史伟、凌则之、李林、高万章、姜纪常、董学礼、雷塞、吕世隆等等同志也都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知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①

“一二·九”一代革命青年所走的道路，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6页。

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无数“一二·九”革命青年中，杨学诚同志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光辉的典型。

杨学诚同志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以前，他还是一个埋头读书、对政治并无兴趣的人。那时他总是夹着书本，按时到图书馆学习；平时沉默寡言，也很少参加课外活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一二·九”前夕，时代的风暴使他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他开始关心时局问题，每天都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杨学诚同志热情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里，担任了先遣队的工作，每天打前站，不辞辛劳地为宣传团解决食宿问题。当时，他在学生运动中是一个活跃的“少壮派”，具有单纯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情，每次遇到国民党特务学生向进步学生挑衅和破坏学生运动时，他总是高高跳起，挺身而出和他们搏斗。这个时候，杨学诚同志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如此积极勇敢地参加救亡运动，可以说是完全是出自满腔沸腾的爱国热情。一个温良谦逊的青年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犹如猛然惊醒的睡狮怒吼起来了，这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青年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气概。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杨学诚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从此，他在党的教育下，逐渐善于思索，明辨是非，以智取胜，以理服人。特别是努力领会和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他被选为党在北平学生运动中的代表，随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到延安参加五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返平后，参加了中共北平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学诚同志负责组织了平津救亡学生会的工作。在武汉时，他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青委书记，创立和领导了青年救国团，开展了青年群众工作。武汉失守前夜，党分配他立即去鄂中农村，开辟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他在接受党的任务时，对于究竟怎样去开展游击战争，怎样创立根据地，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同时，那个地区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既有国民党顽固派，又有土匪；不仅有散兵游勇，还有反动的会道门武装。要在这种条件下发展革命力量，建设根据地，是极其艰难的。但是，在这个艰巨而又生疏的任务面前，杨学诚同志坚决听党的话，当革命形势需要他拿起武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而且全神贯注地执行党的任务，脱下学生装，深入农村。他坚决贯彻了党的路线，与当地农民群众在一起，正确而又灵活地应付了复杂的环境。在鄂中开始建立武装，是由八条破烂的步枪起家的。他当时对这八条枪，爱惜如命，朝夕不离。在党的领导下，他很快地学会了开展根据地各项工作，并发展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创造了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杨学诚同志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刻苦钻研，兢兢业业；表现了坚持党的原则性与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依靠群众；对革命事业总是识大体，朝气蓬勃，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精神。他先后担任了中共鄂中特委书记、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等职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战斗任务。他一直是生活在前线，战斗在前线。由于积劳过度，他患了严重的肺病，但仍坚持斗争。最后在转战的途中，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前线病逝。

以杨学诚同志为代表的道路，正是广大的“一二·九”革命青

年所走过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对革命作出了很好的贡献，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特别比别人高，或者单凭个人的热情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听党的话，和工农群众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斗争里、在群众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二·九”革命青年投入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历程，就是一个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从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从一个阶级转化为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过程。“一二·九”运动所撒播的革命种子，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是也有一些当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拒绝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的革命热情象昙花一现之后，就把自己禁锢在“象牙之塔”里，结果有的飘零，有的堕落，还有一些依附于反动阶级，终于被历史所唾弃，与草木同朽。

刘少奇同志说：“‘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①

“一二·九”运动培育了一代革命青年，不仅为抗日战争准备了无数干部，而且使他们成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二·九”一代革命青年所走的正确道路：知识分子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这是一个光辉

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和学生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它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千百万青年，永远沿着“一二·九”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

①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人民日报》1950年12月9日

十、结 语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它继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革命运动，宣告了民族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成为一次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动员运动。刘少奇同志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并指出“一二·九”运动“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①。

“一二·九”运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和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首先是由于这个运动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前进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正确的方针有力地动员和团结了国内抗日爱国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孤立了当时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为发展革命和壮大人民力量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两个口号正确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最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使“一二·九”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不只是先进青年，而且多数中间分子都参加了运动；不只是广大青年学生，而且各阶层爱国人民也热烈响应，使“一二·九”运动迅速扩大成为全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中，具体地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执行了灵活、谨慎的斗争策略。在严重白色恐怖的城市中，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使运动坚持下去，采取了把秘密、非法的斗争方式和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的策略，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学联、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更好地联系和教育群众，又隐蔽和积蓄了革命力量，避免了敌人的破坏。在群众斗争中，从“一二·九”的请愿到“一二·一六”的示威，再到南下宣传和工农结合，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号召和组织先进青年与工农武装结合，走上抗日最前线。整个运动是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和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各个阶段的鲜明口号和具体要求，引导群众在斗争中逐步提高觉悟，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斗争中也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注意了尽量争取在反动派影响下的群众。

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曾经不断反对和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残余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一二·九”运动始终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使运动在当时反动统治下得到扩大、深入、持久的发展，直到最后胜利，使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得以保存、积聚、壮大，为以后的

①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人民日报》1950年12月9日

抗日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

“一二·九”运动的整个历史证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整套斗争策略的正确性，证明了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线。青年运动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反对一切“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才能取得胜利。

“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是因为它体现了历史发展中已经成熟的革命要求。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进行了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妄图把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爱国青年学生“剿尽杀绝”。毛泽东同志指出：“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①“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由此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的大风暴，为党中央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准备了群众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②这决不是偶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实行抗日救国，是广大人民群众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要求。而共产党，而且只有共产党，在那黑暗的年月里，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希望，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正是因为这样，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用尽一切残酷手段镇压共产党，并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但人民还是逐渐团结到了共产党的周围。当时不少青年学生，正是通过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而开始认识了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表现了中国青年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他们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临危奋起，不为威武所屈，不为谎言所骗，在日寇的铁骑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刀水龙面前，赤手空拳，擎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终于冲破了白色恐怖。从“一二·九”到“七·七”，他们每一步都是在斗争中前进的。许多先进青年在敌人的威吓、逮捕、监禁、杀害以及欺骗、软化、利诱各种手段兼施之下，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们更和工农武装结合，向敌人展开了武装斗争，进一步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是战胜帝国主义、战胜一切反动派、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精神条件。另一方面，“一二·九”的先进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学会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策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相结合，才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以至于胜利。

“一二·九”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运动的方向，这就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中国的知识青年，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有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在中国革命中起着某种先锋作用。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是革命的一个方面军。他们只有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一二·九”运动没有停留在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运动的狭小范围内，而是按照党的指示，走上了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特别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学生运动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有了新的广阔的天地，“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37页。

二·九”运动中的大批先进青年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革命的武装斗争相结合。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对完成“一二·九”所提出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在南下宣传中，许多先进青年从工农群众那里吸取了革命的动力，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改造自己的决心。在革命根据地，他们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下，和老红军、广大工农群众并肩作战，在实践斗争中学习工农群众的优秀品质，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一二·九”的先进青年表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们自愿离开温暖的家庭和书室，在严寒的冬天，去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抗日的游击战争中，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饥耐劳，艰苦奋斗。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自觉地和劳动人民共患难，共命运，这是知识青年坚持革命、实现与工农结合的条件之一，也是思想改造的标志之一。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论断的正确性。

总之，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②。“一二·九”的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战斗行动写下了壮丽的划时代的史诗。“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过的光辉的革命道路永远值得后辈青年们学习。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青年一代学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就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新时期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以及肩负的重担。在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就应该比“一二·九”时代的青年有更高的革命觉悟，有更远大的理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了更好地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任务，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与广大工人、农民，同呼吸、共甘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的青年一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用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来浇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谱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6页。

②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人民日报》1950年12月9日。